新闻界

2025 年第 10 期

10

2025

总第 391 期

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资助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ISSN 1007-2438

9 771007 243257 10>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新闻界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川观新闻
—看四川，观天下—

新闻界 宣

欢迎订阅

《新闻界》杂志

思想影响传播　媒介推动文明

240元/年（12期）

《新闻界》近年荣誉

-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
- 201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2016年、2017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8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19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20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21年、2022年四川新闻奖一等奖
- 2022年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7-2438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51-1046/G2
编辑部电话：(028)86968603　(028)86968876
发行部电话：(028)86969774
刊期：月刊（每月10日出版）
投稿渠道：www.ixinwenjie.com
电子邮箱：xinwenjie66@163.com

目 录

前沿视点 • 作为青年媒介文化的收藏

P4 物质性补偿仪式：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的物 – 人纠缠及收藏时钟的嵌入
文 | 陈龙 经羽伦

P15 记忆之所中的“失恋”：基于“场所作为装配体”的个案研究
文 | 黄顺铭 王周霖欣

新闻学研究

P28 数字新闻的形制：从封面逻辑出发的实践现象学阐释
文 | 骆世查 陈园

传播学研究

P38 从共生到进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文化的非对称演化机理
文 | 战迪 方杰云

编委会主任 谭江琦
编委会副主任 徐文礼
总编辑 段吉平
副总编辑 杨国庆
执行副主编 孙尚如
编辑 李韵奕 徐秋染
编委 王炎龙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张志安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刘海龙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常 江 /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曹 晋 /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冯建三 /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教授
李天铎 / 昆山科技大学文化创意产业讲座教授
李金铨 /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教授
Christian Huchs / 希腊雅典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Graham Murdock / 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Jlises Mejias /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传播政治经济学副教授
栏目主持 常江：前沿视点 蒋晓丽：博士生新论
学术顾问 尹 鸿 李良荣 陈力丹 杜骏飞 郑保卫 童 兵 喻国明 蒋晓丽
前沿视点栏目支持 全媒体技术与传播认知实验室（四川日报社）

P48 具身智能何以具身：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实践与现象学考释
——探访一种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
文 | 吕清远

传播与社会

P59 职业需求与技术器用的适配和内化：“接触－感知”因素影响下传媒从业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研究
文 | 邓秀军　赵悦言

新闻传播史

P76 尽报界天职：中国首批外派记者与思想界的除旧布新
文 | 张振亭　蔡宜静

博士生新论

P87 弗卢塞尔论媒介：一种媒介批判路径
文 | 李慧敏

编辑出版　《新闻界》编辑部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 号
电话　（028）86968603　（028）86968876
投稿渠道　Http:// www.ixinwenjie.com
电子邮箱　xinwenjie66@163.com
邮编　610012
刊名题写　甘惜分
封面图片　C 视觉影像数据库 | 杨建强
刊号　ISSN 1007-2438　CN 51-1046/G2
发地　国内外公开发行
订阅　全国各邮局（所）
邮发代码　62-334
发行部电话　（028）86969774
广告许可证　川工商广字 002 号

印刷　成都鑫达彩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25 年 10 月 10 日
定价　20 元 / 期
法律顾问　曾兴圣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028）85350935]

版权声明

凡本刊所刊登稿件，即视为作者授权本刊拥有网络传播、图书出版等再使用权，本刊有权决定是否以某种纸质出版或互联网出版形式进行二次出版。作者对此有异议者，须在来稿时特别注明；未经本刊允许，其他刊物或网络不得转载本刊作品；获本刊允许转载者，须注明转自《新闻界》。

物质性补偿仪式：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的物－人纠缠及收藏时钟的嵌入 1)

陈龙　经羽伦

摘要　本文基于伊恩·霍德的纠缠理论，通过深度访谈与物质文化分析，探究亚文化收藏实践中复杂的物－人关系，为理解当代青年亚文化消费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并非简单的占有与被占有关系，而是通过“依赖”与“依附”形成深度纠缠的辩证关系。亚文化藏品具有“情感补偿与主体性召唤”的功能，与青年玩家形成依赖关系；“收藏时钟”概念揭示了如何利用物的时间性（生命时钟）、操作链时序（项目时钟）及平台算法节奏（平台时钟）共同精密调控青年收藏实践，使其陷入经济、时空与情感等多重依附困境之中，最终这种辩证关系固化为一种“物质性补偿仪式”。

关键词　青年玩家；亚文化藏品；物－人纠缠；收藏时钟；物质性补偿仪式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陈龙，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江苏苏州 215123；经羽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引言

在当下的社交媒体平台中，一些青年博主以近乎机械的规律发布各式各样的亚文化藏品，如数以百计的 jellycat、POP Mart、动漫手办和票夹等。这些亚文化藏品的陈列，构筑出一个个广袤的物品和文化空间。不仅展示着私人的审美空间，而且也折射出青年玩家丰富的情感表达和精神世界。此种现象不禁使我们思考：青年玩家为何如此迷恋亚文化藏品？诚然，既往研究已对这个问题做出部分回答，如有学者从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恋物癖理论”出发，将青年收集藏品的原因归结为“藏品或多或少存在情感投射和意义建构，以及消费主义构建出一整套符号系统使之沉迷”[1]；还有学者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和萨拉·桑顿（Sarah Thornton）“亚文化资本”出发，认为藏品是以趣味为基础货币，构筑起一个充满流动的、包罗万象的网络亚文化的趣味圈层[2]；亦有学者认为，藏品消费体现青年“我驾驭物”而不是“物驾驭我”的态度，“悦己”取代“悦人”成为消费的最终目的[3]。以上研究均采用“物－人”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遵循“人类中心主义”的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技术背景下算法传播的中国本土理论体系建构研究”（23&ZD214）；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2506100052）。

基本立场，将研究重点放在人对物的情感，或人借助藏品实现交往等层面，藏品被视为一种“静态客体”，忽视物作为积极实体的循环方式，其中包含促进、鼓励、禁止和否认人类的行为[4]。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超越传统“物－人”二元框架，重思“物－人关系”，旨在探讨作为具有约束性与反向依附力的亚文化藏品如何深度参与、塑造青年玩家的收藏实践。本文的首要观点是：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并非简单的占有与被占有、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双向的纠缠关系。对此，本文将借助伊恩·霍德（Ian Hodder）的“纠缠理论”（entanglement），为经验材料建立起可行的分析框架，包含“依赖”（dependence）和“依附”（dependency）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纠缠理论中提及的“时间性”问题，提出“收藏时钟”（collection clock）的概念，用以阐释物、资本、平台与算法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时间节律，精密调控青年的收藏实践。最后，借用“物质性”和“仪式”的概念，本文将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表现出的情感性、关系性和纠缠性等特征，以及青年围绕亚文化藏品展开的一系列实践所生成的亚文化景观，概括为“物质性补偿仪式”——一种基于物的占有、迷恋和崇拜的仪式化实践。

一、文献回顾与关键理论

（一）对“物”的理论预设：从“新物质主义”到“纠缠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以及其他一系列当代观点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物质转向”（materialist turn），旨在挑战和质疑传统社会学的激进主张。其中，在反对“重人轻物”的思潮中，“新物质主义”（又称新唯物论，neomaterialism或new materialism）成为物质转向的代表路径之一。新物质主义最为重要的主张便是声称：看似静止的、缺乏活力的物，其实和人类一样具有能动性（agency），能根据自身逻辑来影响社会实践和行动走向[5]。由此，新物质主义主张“扁平本体论”，以此挑战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将“能动性”或“代理”的能力——产生社会世界的行为——延伸到非人类和无生命的领域[6]，物包含涉入并将其转变为社会实践与行动的能力[7]。同时，新物质主义坚持“物质－文化”的连续性，“自然”和“文化”不应被视为不同领域，而是作为物质连续体的一部分，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物质和社会都具有物质效应[8][9]。从物自身的物质特性及其同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10]，坚定地强调社会生产而非社会建构，即并非通过结构、系统或机制阐释人类、社会和文化如何运作。

在“新物质主义”思潮的启发下，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Ian Hodder）以长期的考古实践为基础，延续其“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并提出“纠缠理论”，他将物的重要性放在核心位置上，致力于探索物－人关系的复杂性。诚然，在纠缠理论中，新物质主义的观点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其是构成纠缠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但面对新物质主义将“能动性”视为“物”本体论来源的理论预设，他同样予以明确拒绝。对此，霍德的基本立场是，“物”固然和人具有关系性、约束性，但物的力量不在于其拥有与人同等的意图或意向性[11]，物的力量恰恰源自社会场域中诸如威望、权力、爱和恨等各种不断变化的力量，“诸如威望等力量在物的身上得到体现……物作为连接通道输送着威望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改变了这种力量”[12]。换言之，物并不具有能动性[13]，物具有鲜活的“灵性”，其作为承载意向性的媒介反作用于人和其他物。由此，不同于“只着重关注人与物之间物质关联”的新物质主义者，霍德的纠缠理论并未排除符号、思想、观念等抽象事物在纠缠网络中的作用，他认为这些抽象事物本身就是在纠缠网络中产生的[14]。总体而言，霍德的纠缠理论是关于“人与物之间是如何相互构建彼此的”一种物质性理论[15]，关注物－人纠缠关系之间的复杂性、异质性、关系性、偶然性，且尤为注重物在关系网络中对人产生的约束、限制和引发依附的能力。

正是由于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新物质主义

色彩，纠缠理论为理解青年亚文化藏品的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一方面，借助纠缠理论对物的基本立场与理论预设，本文系统考察作为物的亚文化藏品，将其物质性视为涉入并影响青年玩家行动的关键，即关注亚文化藏品本身所构建起的无形网络以及之于人类文化实践的影响。事实上，亚文化藏品作为物的身份是显而易见的，但在相关研究上，亚文化藏品却更多地被视为一种静止的、可供赏玩的物存在[16]。另一方面，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纠缠理论在强调物具有鲜活灵性的同时，也承认符号系统、意义价值和文化资本等抽象事物，“穿过物的身体、在物中循环流通的通常依然是某种力量，如礼物之灵（hua）”[17]。以上，纠缠理论给予物重要位置的同时，并未将抽象物质与人的关系排除在外，观念、自然亦可以转化为物的力量，并与人造物产生复杂的纠缠关系，这为洞察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提供了极为适配的理论基础。为更好地揭示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将深入介绍关键概念——“纠缠”，并以此为经验分析建立起一个基础的理论框架。

（二）纠缠理论：“物－人”原初关系的探析

在《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一书中，霍德把物－人之间的源初关系定义为“纠缠”，并认为人通过不断创设和使用物来拓展、深化探索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即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通过创设和使用各种物来实现的，物－人关系也就日趋紧密且相互“纠缠”[18]。在《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一书的最新修订版中，霍德纠缠理论确立了两个根本的哲学前提：“自在之物”和“纯粹的当下”均不存在。首先，自在之物不存在，主要指世界并非由稳定的、孤立的、边界清晰的实体物质构成，我们看到的诸如房屋等物的稳定性实际上就是一个幻象[19]。借助“忒休斯木船”的隐喻，霍德认为，物的本质是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下暂时的、不稳定的“聚合体”，一个具有异质性的捆绑结构，以此形成各种各样的排列布局[20]。一言以蔽之，存在于世的不是实体的物，而只有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21]。其次，纯粹的当下不存在，主要指“当下并不存在，正如过去终将流向未来”[22]。时间不是由一个个当下组成。我们无法抓住当下，正如我们无法抓住稳定的物。基于这两个前提，霍德认为，“稳定的当下即物一成不变”的观点是错误的。任何理论都必须从“过程”和“流动”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实体”和“稳定”的视角出发。

两个哲学的基本观点成为“纠缠”概念的理论基石。在霍德那里，纠缠的概念本身亦是逐步拓宽、逐渐变化的。霍德对纠缠的初始定义是“人与物之间四种类型关系的总和，人对物的依赖（HT）、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依赖（TT）、物对人的依赖（TH）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HH）。因此，纠缠 =（HT）+（TT）+（TH）+（HH）”[23]。人与物是以彼此相关联的方式产生的[24]。这个概念指出了纠缠的广泛性，并将物和人放在对称的位置上，但并未体现出纠缠的动力机制。随后，霍德又指出，物人之间的动态纠缠又产生一组双向的辩证关系：依赖和依附，其中，依赖关系通常指能催生其他事物的发生，意味着人通过创设或使用物来获得某些特定的能力[25]。人依赖或者指望物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体现的是纠缠关系中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一面，即人们使用工具和符号去形成自身的主体性、构建社会并适应环境[26]。如搭建房屋遮风挡雨。与之相反，依附关系则往往限制事物的发生，使人越来越陷入物的罗网中不可自拔[27]，它体现为人与物任何一方脱离另一方都不能独立存在，因此，人与物相互依附、相互约束、相互限制[28]，如不停地修缮房屋。于此，纠缠又被定义为“人与物之间由依赖关系和依附关系所组成的辩证关系”[29]。

但是，霍德又指出，将纠缠视为一组辩证关系还不够彻底。因为该定义仅回答“纠缠是什么”的问题，而未触及“纠缠如何发生、如何存在”的问题。辩证关系仍存在本体论层面的局限，还停留在对“静态关系”的描述，而未完全触及哲学层面更根本的现实——世界本质

是“流”而非“物”。对此，霍德引入“混杂性与矛盾”，试图打破辩证关系中的依赖和依附一分为二的静态视角，正是纠缠关系中“关联着的各种纠葛的、矛盾的、冲突的和异质的关系”，即另一种阴暗面[30]，才使得物－人纠缠得以不断深化、永不终止。相比于依赖关系，霍德更想强调依附关系中的约束和限制，“包括疏离（alienation，又译作“异化”）在内的纠缠内部具有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虽然那些塑造人与物并赋予其生命力的流动通常是相互促进的，但它们往往也相互矛盾”[31]。人类解决物－人之间矛盾的行为，往往导致两者更深的纠缠。最终，在综合过程观和辩证观之后，为了从整体角度和更为宏观的哲学层面把握纠缠关系，霍德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出发，认为纠缠更令人满意的定义指向一种隐喻，它试图厘清由物质的正向流动与逆向流动构成的具有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messiness），而这些正向与逆向的流动产生、束缚和包含各种物体（人、动物、事物、观念、社会组织机构）[32][33][34]。该定义在识别出人与物的产生方式及人与物发生作用、彼此区分的方式的同时，也认识到事物持续存在的变化或流动。

基于以上对霍德纠缠理论的回顾与梳理，我们可以推导出在纠缠理论下，青年收藏实践中有关物人关系的基本预设：其一，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缠关系，具有能动性的青年玩家和具有约束性、反向依附力的亚文化藏品，互构彼此，两者的纠缠关系存在辩证关系，即依赖和依附；其二，“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是推动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逐渐深化的关键，需要给予更深刻的描摹与观照；其三，虽然霍德认为用依赖和依附的辩证关系概括纠缠理论不够彻底，但这组辩证关系却也成为霍德分析纠缠理论有效的工具，它恰恰是纠缠关系不可逾越的分析框架，是通向其更宏大的“流”本体论视野的必经之路。因此，本文同样沿用依赖和依附的分析框架，对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展开考察，并尝试触及作为隐喻概念的纠缠。

（三）时间性：物－人纠缠的深化与路径依赖的生成

在物－人纠缠中，时间性亦是霍德考察物－人关系至关重要的维度。事实上，纠缠依赖时间。纠缠理论亦试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物之间的纠缠数量持续增长或呈指数型增长的动力机制是如何发生的，该动力机制是构成人类经验的核心[35]。首先，时间性表现为“物的生命节律与人的被动卷入”。人会陷入物的生命与时间性、让人难以捉摸的兴衰更替及贪得无厌的需求之中[36]。如人类陷入植物的节律、生长和成熟季节以及动物的生命周期之中，最终被这些时间所左右[37]。由此，物的生命节律与不确定性，又会产生维护性的路径依赖。房屋会旧，工具会坏，但衰败的时间并不确定，霍德将此种不确定性称为“人们无法驾驭的‘物’的野性”[38]，物的野性迫使人类社会为了应付物的时间性，建立起一套可持续、周期性维护与再生产体系，如每年农修、定期祭祷。

其次，物－人纠缠受操作链、行为链等时序先后的约束，“纠缠关系中存在某种时间性，即不同的纠缠过程需要按照某种时间次序依次发生”[39]。霍德明确表示累积、等待等时间性在物－人纠缠过程中的重要性，“操作链中不同步骤的一个关键要素就在于一些事件必须‘等在’另一些事件之后发生。因此，另一种理解纠缠的方式是将其视为多种事物的汇集：一系列事件流彼此汇合。能量随时间流动：寻找石料、制作、使用、遗弃，这种事件流又与其他事件流交织在一起”[40]。由此，时间性体现为不可逆的、带有约束性的序列，在日复一日中，操作链和行为链被固化为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一旦某种序列被广泛接受，改变便不会轻易发生，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产生结构性的路径依赖。

显而易见，霍德所揭示的物－人纠缠之间的时间性——纠缠关系通过物的时间性、时间的累积、等待与操作链或事件汇流而得以深化、复杂化的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维护性与结构性路径依赖，为理解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提供

关键透视。在青年玩家的收藏实践中，作为物的亚文化藏品具有时间性，包括物之生命历程、被控制的周期循环等时间结构，将原本可能自然、随机发生的“操作链”或“事件流”，如消费、把玩、陈列、分享等，塑造成可操纵、可循环的标准化流程，并产生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正是物的这套精密的时间结构，才能促使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的纠缠关系愈加复杂，从而形成玩家与藏品之间依赖关系，并以特定方式汇集为依附关系。因此，在青年玩家与藏品的物－人纠缠之间，加入时间维度的考量，将有助于洞悉其动态的互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从“物－人纠缠”的理论视角出发，作为具有约束性与反向依附力的物，亚文化藏品如何与青年玩家在纠缠中生成“依赖”和“依附”两种关系？

RQ2：“时间性”以怎样的形式介入青年玩家的收藏实践之中？如何深化“青年与亚文化藏品”的纠缠关系？

RQ3：最终，青年玩家和亚文化藏品的纠缠关系走向何处？产生怎样的文化结果？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

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本文遵循以下几个标准：首先，本文将亚文化藏品界定为具有明显圈层性、趣味性、小众风格等特征的物质对象，由于亚文化圈层种类繁多，无法穷尽，故本文仅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亚文化圈层和藏品（表 1）。其次，访谈对象的选择。在我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政策文件中，青年的年龄范围被设定为 15—34 岁，涵盖青春期至成年早期的过渡阶段[41]，因此，本文访谈对象的年龄严格限定在 15—34 岁之间，以保证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青年；访谈对象必须对某个或多个亚文化藏品具有收藏习惯，且收藏实践至少持续半年，考虑到部分青年玩家可能存在偶发的、短暂的收藏行为，对藏品整体的运作规则较为陌生，藏品本身在其生命历程中并未形成连续的收藏行为，故不予作为研究对象考虑。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针对青年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在抽样阶段，联系与笔者们密切交流的 3 位青年亚文化藏品玩家；为兼顾研究样本的广延性和深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滚雪球抽样和社交媒体平台寻找的方式，借助上述 3 位受访者的帮助，在联系符合研究要求的访谈对象的同时，笔者们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主动联系青年玩家。以便对研究问题进行更深刻追踪访问，直到访谈资料相对充足，达到信息饱和，停止招募。最终一共招募 14 位被访者（表 1）。正式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以面谈和腾讯会议视频两种形式展开，每次访谈时间 30 ~ 90 分钟，访谈问题主要涉及受访者收藏动机、收藏实践中的情感体验和社会联系、私人领域或社交媒体中的收藏陈列和分享等。

同时，为进一步考察亚文化藏品的物质性线索，本文又通过考古学物质文化分析的方法，对亚文化藏品的物品属性、符号与象征意义、社会关系与互动等层面，展开细致观察、描摹。物质文化分析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如何通过物质创造、表达文化，揭示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物质如何塑造身份认同、社会秩序和文化记忆，这便于本文搜集亚文化藏品的生命史，追踪“青年－藏品”纠缠的操作链。此外，访谈对象均会按照个人审美陈列亚文化藏品。笔者以亲自进入陈列空间或受访者线上提供照片的方式，获取藏品具体的空间展示；部分访谈对象还有使用社交媒体分享亚文化藏品的习惯，因此，本文同样截取访谈对象的小红书、微博或微信朋友圈页面，并对其展开分析。社交媒体的考察维度依旧涉及平台规则体系和算法机制等，对此，本文亦通过搜集公开资料的方式，获取相关线索。通过搜集多元证据，本文力求揭示亚文化藏品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史”和“关系网”，以及青年与藏品间的物－人关系。

三、“依赖”关系：亚文化藏品与青年纠缠网络的生成

青年与亚文化藏品的纠缠网络由四种物－

表 1 访谈对象情况一览表

编码	年龄	性别	职业	藏龄	所属领域	亚文化藏品	是否使用社交媒体分享藏品
X01	28	女	国企员工	5 年	娃圈、潮玩	Jellycat、POP Mart、迪士尼	是，小红书
X02	29	女	博士研究生	1 年	潮玩	POP Mart	是，小红书、微博
X03	28	男	博士研究生	2 年	动漫、二次元	徽章、手办、挂件、立牌	是，小红书
X04	29	女	文化宣传	4 年	娃圈、同人	棉花娃娃、天官赐福	是，小红书、微博
X05	30	男	自媒体博主	3 年	复古收藏	唱片、黑胶	是，小红书
X06	26	女	博士研究生	5 年	动漫、潮玩	手办、POP Mart	否
X07	25	女	研究员	2 年	娃圈、潮玩	Jellycat、POP Mart	是
X08	25	女	硕士研究生	3 年	娃圈	Jellycat、迪士尼	是，微信群
X09	24	女	设计师	2 年	娃圈	三丽鸥、迪士尼、Jellycat	是，微信朋友圈、小红书
X10	27	女	产品经理	3 年	二次元、同人	魔道祖师、间谍过家家	否
X11	25	女	硕士研究生	2 年	复古收藏	唱片、黑胶	是，小红书
X12	21	男	本科生	1 年	动漫、二次元	卡片、立牌、手办	否
X13	24	女	国企员工	6 年	娃圈、潮玩	Jellycat、POP Mart	否
X14	26	女	新闻记者	4 年	同人、耽美	博君一肖、天官赐福	是，小红书、微博

人关系组成，包括人对物的依赖（HT）、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依赖（TT）、物对人的依赖（TH）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HH）。其中，人对物的依赖（HT）是青年与亚文化藏品发生纠缠的起点。收藏首先是一个关于占有的故事，以一种以持续的、累积的方式拥有物品，而将所有收藏家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是，无论他们的收藏品有多么多样化，他们都渴望占有[42]。收藏将占有推向最激烈的极致。那么，青年玩家对亚文化藏品的“渴望占有”从何而来？诚然，渴望占有是一种复杂的个体情感，而这种情感来源指向“亚文化藏品的物质性”。在霍德纠缠理论的观点下，物质性指的已经不再是物质材料本身，而是用来说明人对物质材料的理解方式[43]。此处的物质性，不再只强调由身体触觉被体验的物理属性（physicality），更牵涉被作为隐喻使用的物质性[44]，涉及物的特质与其社会文化影响之间的关联。

聚焦青年玩家的收藏实践，他们对亚文化藏品物质材料的理解方式，主要包含两个层面：情感代偿和主体性召唤。首先是情感代偿。诚然，藏品拥有自己的“身体”，包括触感、质感、颜值形象等外在形态，它们的物理属性为青年玩家提供感官愉悦。有被访者说道，“我最喜欢的藏品是这只小羊，它的触感非常软，我都不敢经常摸它”（X08）；“我买 jellycat 就是因为它的手感非常好，把这些娃娃拿出来摸一摸、梳一梳，我就会很放松”（X13）。在感官愉悦体验之上，更深层次的“陪伴感”和“解压感”开始生成：“我经常一个人带着我的娃娃一起去吃饭，它在旁边看着我吃，就会有种陪伴感”（X01）；“有时候跟别人沟通，他们根本不理解我，我也懒得解释，但对娃娃我不需要说什么，我的娃娃都会懂我的想法，我和它们形成闭环的精神世界”（X08）。在此，亚文化藏品的物质性中介或疏解青年玩家的孤独感、焦虑感、不确定性和压力等负面情绪。我们会对熟悉的物产生认同感，我们会在心里认可它们，最后拥有它们，在我们经历悲痛与失意后，物可以抚慰我们的心灵[45]。由此，情感代偿使得青年依赖亚文化藏品。

相比于情感代偿，更深层次的主体性召唤构成青年玩家独一无二的存在方式。在动漫、二次元和同人等亚文化圈层中，他们收藏的并非藏品的物理特质，而是藏品的灵性，即作为媒介承

载的意向性。“我从小就很喜欢灰原哀，我一直喜欢和别人不一样，灰原哀就很特立独行，她身上有我很欣赏的性格和特质，所以会买灰原哀的周边”（X06）；“这个卡套上的人物是《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的兰格雷，她的性格坚强独立，比较吸引我”（X03）。通过占有亚文化藏品的灵性，青年玩家试图弥合“理想主体”与“现实主体”间的差距，“另一个更理想的自己，这种更理想的我并不会存在，真实的自己没有那么完美”（X06）。“通过将它们定位在所有者身上，将事物暂时聚集到一个点……从而产生一种身份”[46]，一种更完整、更理想的主体被建构出来了。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一件物品的特定品质，它的交换价值来自文化和社会领域，它的绝对独特性，相反地，则来自被拥有——可以使我在它身上认识到，我是一个绝对独一无二的存有。”[47]最终，收藏将占有推向极致，而在物的持续占有中，青年玩家依赖或指望藏品的物质性去形成自身的主体性，构建社会并适应环境。

在人依赖物的基础上，作为物的亚文化藏品并非孤立存在，否则它将无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收藏体系。事实上，广袤藏品宇宙的构成正是基于“物对物的依赖（TT）”。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物不断流动，物与物之间不断发生关系，不断改变自身，也不断被改变[48]。霍德认为，物与物之间的依赖涉及生产与再生产、交换、使用、消耗、废弃和后堆积等环节[49]。同样，在亚文化收藏实践中，物与物的依赖（TT）贯穿于藏品的整个生命历程之中，形成环环相扣的动态依赖链。其一，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亚文化藏品的生产依赖于此前存在的、作为原型的物，比如动漫、同人等亚文化藏品，都极其依赖此前藏品所构建的意向性，同时，收藏还是“系列游戏”，如 POP Mart 的“Labubu”一代、二代、三代等，新物与旧物以“家族分支”的形式，共同构建专属的藏品体系。其二，交换环节涉及藏品的价值体系。在二手交易市场、玩家社群内部的流通中，藏品之间建立起复杂的价值关联，如稀有款、隐藏款、限定款和绝版的稀缺性和高价值，正是在与其他普通款的对照中获得的，物与物在交换网络中相互定义、相互依赖。其三，使用与消耗环节，因为物总是被人使用、消耗、利用，所以物总是依赖其他物获得存续。庞大的收藏体系超越藏品本身，延伸至展示柜、收纳箱、定制架等物体系，藏品在使用与消耗过程中不断地与其他物发生关联。其四，废弃和后堆积环节，那些被暂时收纳或冷落的藏品，其存续状态也依旧紧密地依赖于整个收藏体系的规模与管理逻辑。

只有人对物的依赖、物对物的依赖，还不足以构成复杂的纠缠网络。物也同样反向依赖着人（TH）。物依赖那些生产、使用、修理、废弃它们的人，在整个行为链的各个阶段及整个使用阶段，物都依赖于人[50]。事实上，正是青年玩家赋予亚文化藏品“物之社会生命”。青年玩家的收藏实践成为物的聚合行动，亚文化藏品的物质性得以放大，物由此获得社会性，同时，青年玩家对亚文化藏品所表现出的独特情感，又成为激活并延续物之生命的动能。借助于此，亚文化藏品实现从“被占有”到“存在”的生命跃升。

最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HH），亚文化收藏实践是具有圈层的，藏品正是一种社交货币或文化资本，以此建立人与人的交往。“我认为娃娃是我的社交桥梁，在小红书发我的娃娃可以获得很多的关注，这既满足我的虚荣心，又能让我收获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X01）；“在漫展上我会背上我的痛包①，这会吸引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别人夸奖、评价我的痛包，是非常自豪和开心的事，我获得大家的赞赏与认同”（X12）。亚文化藏品中介着玩家间的社交方式，基于共同趣味的社群圈层就此建立。青年玩家通过藏品呈现其个人审美体系、情感投入与生活方式，从而触发圈层内部的身份确认、文化认同与意义共鸣。

概言之，人对物的依赖、物与物的依赖、

① 笔者注：痛包，网络流行语，指挂满动漫角色徽章、玩偶等周边的包包，因外观夸张醒目得名（日语中“痛”有“怪异”之意）。该形式被用作粉丝群体表达对角色的喜爱，徽章数量往往象征热爱程度，承载“与喜爱角色同行”的情感意义。

物对人的依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共同构成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间的纠缠关系。其中，青年玩家通过情感代偿和主体性召唤依赖着藏品；藏品间通过生产、交换、使用、堆积等环节相互依赖，构成广袤的收藏体系；藏品的“物之社会生命”依赖于青年实践；作为媒介的亚文化藏品，促进玩家间的社群交往与身份认同。在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中，这四种依赖关系相互罗织、彼此强化，缔造出依赖关系的丰富面向，也为更深层次的依附关系的形成埋下伏笔。

四、“依附”关系：收藏时钟的嵌入与纠缠的消极深化

相比于积极的依赖关系，霍德更想强调的是矛盾的、混杂状态的依附关系，任何物－人关系终将走向依附的困境。在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中，建立在依赖关系之上，随着物的时间性开始左右人的操作和行动序列，青年玩家会逐渐陷入难以捉摸的兴衰更替及贪得无厌的需求之中，收藏成为一种循环往复的游戏，进而催生出青年玩家非理性的过度消费，最终，此种行为使得青年收藏实践中的物－人关系走向一个极端，即霍德所说的依附关系。对此，本文提出“收藏时钟”的概念，用以揭示物的时间性对人的时间性的征用与控制，以此考察时间的累积、操作链和行动链等时间序列如何促使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由充满建设性的依赖关系走向充满束缚的依附关系。

所谓收藏时钟，并非一个单一的计时器，而是指内嵌于物－人纠缠关系之中，由物的时间性、操作链时序及平台算法节奏，共同塑造的一套时间秩序或时间结构，它精确地调控着青年玩家收藏实践的节奏，具体包括生命时钟、项目时钟和平台时钟。其一，生命时钟是指亚文化藏品的时间性。首先亚文化藏品以系列、限定、绝版等形式进行周期性的循环更迭，对应着霍德所言的“物的生命节律与人的被动卷入”——正如农民被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所左右，亚文化藏品的生命周期也主宰着物人之间的关系，系列、限定、联名和隐藏等周期性，驱使青年不断追逐其中。同时，物具有野性，即亚文化藏品亦会进入衰败期，它们会落灰、变色、老化，甚至不断侵占玩家的生活空间，这对应霍德所说的“物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维护需求”，青年玩家需要不断地打理与收纳亚文化藏品，并做出空间让渡，亚文化藏品的物理特质及其衰败的不确定性，迫使青年个体建立起一套“可持续、周期性维护与再生产体系”，至此，亚文化藏品与青年玩家之间的纠缠被不断深化，并产生维护性的依附关系。

其二，项目时钟是指青年玩家收藏实践的操作链、行为链所形成的时序结构。收藏，绝非简单的购买与收集，其更像是一种标准化、重复化和仪式化的项目管理：搜寻信息→购买 / 抽选→等待物流→拆箱→打理 / 收纳→陈列 / 分享，序列中每一个步骤都要等在上一个步骤之后。在此过程中，青年玩家以项目管理的方式，设定收藏目标与进度，“给亚文化藏品拍照”不再是随性的分享，而涉及布景、打光、修图等一系列标准化操作；“为娃娃制作或购买娃衣”则演变为设计、采购、比价、制作的项目；“亚文化藏品的摆放、陈列”要展现个人审美，故而需要精心地设计、搭配和管理。收藏实践的操作链和行为链，将原本由兴趣驱动的休闲活动，转变为一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精密管理和布局的项目。由此，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产生结构性的依附关系。

其三，除却亚文化藏品的生命时钟和青年玩家操作的项目时钟，在高度媒介化的当下，青年玩家的收藏实践还存在一个关键场域——社交媒体平台。在搜寻信息和陈列 / 分享等操作环节，平台及其算法推荐机制共塑出第三种时间结构，精密地控制着青年的消费与分享节奏，对此，本文将其概括为“平台时钟”，它揭示资本与平台如何“征用”物的时间性。具体呈现两种形态：一是“主动分享的节律化”，在社交媒体平台可见性的争夺过程中，玩家必须遵循平台的隐形发布规则，如维持更新频率、瞄准黄金发布时间等，“我买娃娃就是带出去拍照好看，然后定期整理发小红书，之前发星星人点赞收

藏有三千多，满足了我的虚荣心”（X01）；二是“被动卷入算法制造的欲望循环”，即使青年玩家不主动分享，平台算法推荐机制与品牌方形成一种隐形的联动机制，通过信息流持续推送新品与藏友动态，将玩家被动卷入资本所设定的营销周期中，“现在的小红书太精准了，总是给我推新品，还有别的藏友发的娃娃，我看到好看的就会想买”（X13）。无疑，“平台时钟”进一步深化了青年与藏品间维护性依附和结构性依附关系。

在收藏时钟的作用之下，青年玩家陷入霍德所描述的典型的依附困境：他们以为自己驾驭着物，实则被物的时间罗网所深深套牢，在永无止境的维护、追逐与空间让渡中，体验着与初衷相悖的焦虑、矛盾与异化感。最终，在经济、时空和情感等层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依附困境。首先，经济层面的依附直接由生命时钟与平台时钟塑造，生命时钟通过盲盒、限定、绝版、隐藏等方式，制造出物的稀缺性与时效性，将收藏转变为一场永无止境的循环竞赛。青年玩家为了追赶物的生命节律陷入非理性的消费状态，成百上千地购买亚文化藏品是一种常态。“我是会端盒的，看到喜欢的系列，我就会想要全套，但因为花费很高，有时候真的会有吃谷[①]焦虑。”（X12）同时，资本与平台的合流，借助物的时间性，通过算法精准推送、可见性竞争和欲望制造，“平台时钟”不断放大即时满足的消费欲望，构筑一道青年玩家难以挣脱的经济枷锁。

时空依附是生命时钟与项目时钟共同作用的物理结果。生命时钟不仅意味着推陈出新，也预示着物的衰败。一方面，为了占有物的灵性，青年玩家启动项目时钟，这个过程需要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当时去迪士尼买新品，我从北京专门坐飞机去上海，一夜不睡地去排队。买迪士尼的娃娃需要抽签，抽签又抽不中，买不到我就连着三天去排队，每天都只睡三个小时，结果还是没买到。”（X08）另一方面，除时间外，青年玩家必须做出空间让渡。随着藏品数量的线性增长，实体性、不可压缩性等物质性特征，使藏品不断侵占物理空间，“房间已经放不下了，之前房子装修的时候，我专门留了一面墙做展示柜，但是现在也放不下了，只能给他们堆在纸箱里，我有好几箱”（X07），收藏者反复陷入“断舍离”的困境。至此，时间和空间上的双向依附，使得亚文化藏品反而在某些时刻成为青年玩家的压力源。

最深层次的依附是情感。在收藏时钟的运作下，收集的初衷从悦己异化为追逐生命时钟的迭代速度、完成项目时钟的绩效目标、满足平台时钟的虚荣分享。收藏行为本身取代情感补偿或主体性召唤，成为目的。“有段时间，我买娃不是因为喜欢，只是成为一种习惯，好像就是为了买而买，买回来拆盒的一瞬间是非常开心的，但是过一会儿就会觉得好像不是我喜欢的，也就那样”（X09）；“我有认识圈内的玩家，他们疯狂地购买谷子，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买回来以后，甚至不会去拆那个盒子”（X03）。一种近乎偏执的、圈外人难以理解的“收藏癖”开始出现。最终，青年玩家在依赖与依附之间反复挣扎，在享受物带来的片刻情感补偿后，又在时钟的催促下疲于奔命，痛苦于物造成的重重限制。

概言之，收藏时钟的嵌入与运行，是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由积极“依赖”走向消极“依附”的关键机制。生命时钟、项目时钟与平台时钟相互交织，共同编织一个难以挣脱的依附之网：青年玩家在经济层面陷入非理性消费的循环，在时空维度面临资源侵占的压力，在情感层面经历从“悦己”到“役于物”的异化。在追逐、维护、展示与分享藏品的行动链中，精力与资源被消耗殆尽。作为愉悦与自主文化实践的收藏，被异化为由物的时间性所征用和支配的强制性仪式。至此，物人之间建设性的依赖关系，被消极深化为充满束缚、矛盾和混杂的依附困境，这正印证霍德所强调的物人纠

① 笔者注：“吃谷”是指购买周边产品，动漫、游戏等亚文化圈层的流行说法，他们将“谷子”指代周边。

缠关系中，物消极而强大的阴暗面。

五、物质性补偿仪式：固化混杂“依附”关系的终极文化景观

在纠缠理论中，霍德指出纠缠最令人满意的定义是一种隐喻，指物质的正向流动与逆向流动终将构成的具有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行文至此，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的具有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逐渐清晰。对此，本文提出“物质性补偿仪式”的概念——一种基于物的占有、迷恋和崇拜的仪式化实践，用以揭示亚文化藏品的正向流动与逆向流动所构成的具有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具体指“在收藏时钟的操纵下，青年玩家将亚文化藏品作为仪式的对象物，通过对藏品周期性占有、秩序化陈列、维护性劳动与标准化展演等操作链，构建出一种具有情感补偿功能的仪式化实践”。从表面来看，物质性补偿仪式是正面积极的，它是青年自我救赎的行动与仪式，但实际上其是依附关系的终极文化景观，充满混杂、矛盾性与争议。

在收藏时钟的精密调控下，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再只是散乱的、随机的或偶发的行为，而是逐渐固化为一种高度结构化的、仪式化的亚文化实践，此种仪式渗透在收藏行动的方方面面，外在表现为私人仪式化情境的营造、线下线上共享仪式的操演。就私人仪式化情境的营造而言，青年玩家并非随意、简单地陈列亚文化藏品，还会延伸出展示柜、防尘罩、亚克力架、定制小家具等物，借助物实现专属私人空间的情境化再生产。“最开始我没有黑胶机的时候，我买的黑胶只是作为收藏，摆在柜子里，但后来买了黑胶机，我又觉得我要给它配个柜子，氛围感也慢慢地被我打造起来了”（X05），一个具有情感投射、高度秩序化的仪式情境就被构造出来。在此，青年玩家通过介入并管理专属的收藏体系，借助物的可控性、可见性与稳定性，形成具有补偿性的秩序感，以此抵抗不确定性的外部世界。从而有助于创造一个整体的环境，有助于一个自我形象的整体化，而这正是收藏的奇迹[51]。收藏，因此成为一种通过组织物质世界来确认自身存在的仪式。其次，线下线上共享仪式的操演。收藏时钟所规训的操作链，促使实践升华为具有特定意义的仪式环节：诸如梳毛、换衣、清灰等打理活动，成为一种赋予藏品灵性的日常侍奉。此外，部分青年玩家将精心建构的私人仪式场景，分享至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拍摄、修图、文案编辑等一系列数字化操演，完成以分享、互动和圈层交流为主的线上共享仪式。由此，青年玩家借助物质性补偿仪式，构建出可控、可感、可见的物质世界。

然而，物质性补偿仪式的提出，也正式揭示出当代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的矛盾与困境，对应着霍德所说的具有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它表面上是一场创造性的救赎，展现青年玩家借助物实现情感补偿与身份建构，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结构性的牢笼，是物 – 人纠缠中依附关系的终极文化景观。当实践被仪式化，当束缚被情感化、浪漫化和神圣化，挣脱便变得愈加困难。物质性补偿仪式，以其强大的规范性和情感凝聚力，将青年玩家牢牢禁锢在由物、资本与平台共同编织的欲望之网中，以此完成对依附关系最后的也是最牢固的加冕。由此，物质性补偿仪式从解放性的解决方案，反转为炮制无限欲望的机器，它以暂时满足的方式，持续性地制造青年与藏品纠缠的、矛盾的、混杂的依附状态，青年玩家即使背负经济、时空和情感等多重依附困境，亦很难终止收藏实践或从藏品体系中全然抽离。

六、结语

本文以霍德的纠缠理论为框架，深入探讨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中物 – 人关系的辩证性与复杂性。研究发现，青年玩家与亚文化藏品之间并非简单的占有与被占有、支配与被支配，而是呈现出依赖或依附的纠缠状态：一方面，亚文化藏品具有“情感补偿与主体性召唤”的功能，与青年群体形成依赖关系；另一方面，亚文化藏品亦通过其物质性、符号性与时间性反向规训青年玩家，使青年陷入欲望生产、自

我博弈与系列游戏的循环之中。在此基础上，本文亦发现，藏品、资本、平台算法共同制造的收藏时钟，是物－人关系由依赖走向依附的关键变量，该时钟机制很好地揭示了物的时间性对人的时间性的征用与控制，正是在物的时间性（生命时钟）、操作链时序（项目时钟）及平台算法节奏（平台时钟）的共同作用下，青年玩家才会深陷经济、时空与情感等多重依附困境。最终，这种依附关系固化为一种物质性补偿仪式——一种基于物的占有、迷恋与崇拜的仪式化实践。物质性补偿仪式揭示当代青年的生存悖论与依附关系中的混杂状态：他们既是仪式的创造者，通过物建构主体性、连接世界，获得存在意义；但又被物的不断包围所吞噬，甚至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新焦虑与新困境。他们通过物寻找存有，亦在物中遭遇迷失。

本文引入霍德的纠缠理论，突破传统物－人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揭示作为具有约束性与反向依附力的亚文化藏品，如何深度参与并塑造青年的收藏实践。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如访谈对象主要集中于特定亚文化圈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多元的收藏实践；如霍德的纠缠理论是如此庞大且丰富，运用在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中，还有很多可深入探讨的分支；在方法论层面，或可学习霍德，结合定量方法重构物人时空上的纠缠关系。总之，青年亚文化收藏实践既是当代青年情感结构与生存境况的微观缩影，亦是洞察消费社会、平台资本与物质文化复杂互动的关键窗口。理解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物质性补偿仪式，不仅为解读青年亚文化消费提供新视角，也为反思当下社会物－人关系的演变提供新可能。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 Morrison R. Bringing the Collection to Life: A Study in Object Relations[R].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0: 3−4.

[2][16] 陈龙，经羽伦．作为亚文化资本的 NFT 数字藏品及其交往实践意义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 52(2): 106−113.

[3] 邢婷婷．“我驾驭物”还是“物驾驭我”：青年消费新观察 [EB/OL].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8/t20250819_5911401.shtml. 2025−08−19.

[4] Alfred G.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 35.

[5][7][44] 孔舒越．生成－物质性：一份“救命文档”的诞生、运作与流变 [J]. 新闻记者，2025 (2): 38−56.

[6]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1.

[8] Barad K.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without Contradiction[J]. In: Nelson L H, Nelson J. (eds.) *Feminism, Scienc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M]. Dordrecht: Kluwer, 1996: 161−194.

[9] Braidotti R. *The Posthuman*[M]. Cambridge: Polity. 2013: 3.

[10] Alberti B .Archaeologies of Ontology[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6, 45(1):163−179.

[11][12][13][17][19][20][21][22][23][24][26][28][31][34][35][36][37][38][39][43][45][48][49][50] 伊恩·霍德．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 [M]. 刘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 254; 254−255; 254; 255; 9; 5; 12; 11; 14; 14; 15; 15; 27; 16; 16; 15; 128; 121; 20; 67; 63; 68; 70−71;101

[14] 刘岩．考古材料研究的新视角：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纠缠理论分析 [J]. 东南文化，2021 (1): 34−43.

[15] Oliver J, Craig N. *Cipolla. Archaeological The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troducing Current Perspectives*[M]. London: Routledge, 2017: 15.

[18] 刘铮．从“纠缠”到“缠绕”：“身联网”时代的人—物关系特征及身体的弃置效应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 46(6): 1−8.

[25][27][29][33][40] 伊恩·霍德．纠缠小史：人与物的演化 [M]. 陈国鹏，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22: 84; 84; 84; 84; 93.

[30] Harman G. Entanglement and Relation: A Response to Bruno Latour and Ian Hodder[J]. *New Literary History*, 2014, 45(1):37−49.

[32] I Hodder. *Where Are We Heading ? The Evolution of Humans and Thing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32.

[41] 中国政府网．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 − 2025 年）》[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263.htm#1. 2017−04−13.

[42] Morrison R. Bringing the Collection to Life: A Study in Object Relations[R]. Alberta: University of Alberta. 2010: 147.

[46] Strathern M.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88.

[47][51]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 [M]. 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84; 84−85.

（下转第 27 页）

记忆之所中的“失恋”：基于“场所作为装配体”的个案研究

黄顺铭　王周霖欣

摘要　本文从“场所作为装配体”的视角考察了一座失恋博物馆。这个场所装配体由表意要素丰富的展览区和精心打造的摄影区组成，它也希望建构一种“释怀、疗愈、面向未来”的场所精神。爱情遗留物捐赠者的失恋记忆叙事存在“以爱情遗留物为中心”和“以爱情旅程为中心”两种类型，其捐赠行为的意义建构存在指向自己、对方、博物馆，自己与观众的四种指向性，其捐赠行为折射出“保存式遗忘”和“建设式遗忘”两种形式。观众在看展过程中存在视看展为告别仪式和在看展中怀旧两种典型心理；观众在玩游戏中存在“确认”“游戏”和“证明”三种典型心理；观众摄影存在“记录性摄影”“怀旧性摄影”与“展演性摄影”三种基本类型；观众留言表达了三个基本主题：与前任对话、释怀过去、许愿未来。失恋博物馆作为“记忆之所”涉及地点记忆、失恋记忆捐赠品的物质性、私人记忆的公共化等八个记忆面向。

关键词　失恋；爱情遗留物；失恋博物馆；场所作为装配体；记忆之所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207；王周霖欣，四川大学媒介与记忆研究所研究助理，四川成都 610207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二十年前，博物馆家族迎来了一个名为“失恋博物馆”的新成员，而如今，参观和打卡失恋博物馆已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流行的青年文化实践。世界上第一座失恋博物馆由一对分手的克罗地亚恋人维斯蒂卡（Olinka Vistica）和格鲁比希奇（Drazen Grubisic）创办，维斯蒂卡对于 2006 年它在一个地方艺术节上首次亮相，这样写道：“一个船运集装箱成了四十件爱情残骸的港湾。展品要么来自我们的好友，要么是陌生人的捐赠，我们以匿名的方式展出，唯一的文字介绍就是展品主人们的个人故事。曾经只是对两个人有意义的故事一下子激起了观众的共鸣，纯粹是陌生人的观众在看到这些展品时却一样真真切切地感到心痛。”[1] 从她的描述中可清楚地看到组成失恋博物馆的三大基本要素：（1）策展人构筑展览场所；（2）失恋者捐赠爱情遗留物及其背后故事；（3）观众参观及产生反应。由于失恋者捐赠的遗留物本身具有唤起失恋记忆的能力，更由于他们事实上写下并随同物品捐赠其失恋记忆叙事，因此第 2 个因素使失恋博物馆再明显不过地具备了一种“记忆之所”（site of memory）[2] 的性质。当然，另两个要素对失恋博物馆作为记忆之所的面貌

来说也同样非常重要：正是策展人为记忆之所构筑起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场所”（place）面貌；正是记忆之所中失恋展品与观众的相遇使私人失恋记忆走向了公共化。在过去二十年间，不仅失恋博物馆在世界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且它们因在这些基本要素上的不同配置状况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作为由异质性要素组成的整体，失恋博物馆与人文地理学家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的“场所作为装配体”[3]的理论高度契合。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场所作为装配体”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成都首家失恋博物馆——失恋先生博物馆——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策展人、失恋的捐赠者和观众三种行动者如何经由不同的实践来将此记忆之所塑造为一个特定的场所装配体。本文具体回答下列研究问题：首先，策展人将这座失恋博物馆装配为一个怎样的场所装配体？其次，失恋的捐赠者如何将爱情遗留物及其背后的失恋故事 / 失恋记忆叙事捐赠给这座失恋博物馆？再次，这座失恋博物馆激发或容纳了观众的哪些实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座失恋博物馆作为“记忆之所”涉及哪些记忆面向？

二、装配体与“场所作为装配体”

“装配体”（assemblage）是由法国学者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于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概念[4]，后来另一位法国学者德兰达（Manuel DeLanda）将其系统化为“装配体理论”[5]。德兰达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被视为装配体。一个装配体乃是由异质性要素组成的整体。虽然每个要素各具“特征”，但真正使异质性要素组成装配体的并非要素的特征本身，而是其释放的“互动潜力”。正因如此，他才称装配体为一个“涌现的”而非“有机的”整体[6]。一个装配体中的某要素因丧失互动潜力而被移出后，仍有望进入其他装配体中释放新的互动潜力。例如，一个轮胎因无法在汽车上正常运转而被拆下后可被吊在一座花园里的树上供人荡秋千。物理“特征”未变的轮胎在“汽车”和“花园”这两个装配体中可以释放截然不同的互动潜力。同样，一个各要素正常互动的装配体也可因新要素的互动潜力而改变原有互动面貌。例如，一个人在花园中新做的轮胎秋千可创造出人与秋千、树、地面、低空、高空之间新的互动面向；一位司机在方向盘前面安装一个手机支架也可为驾驶过程创造出新的互动面向。同时，德兰达从装配体的角度，为理解社会现实中“微观 – 宏观”的层次或尺度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路，认为任何装配体都兼具宏观与微观：若置其于宏观层次，则其异质性要素为微观；若置其于微观层次，则其为某个更大装配体的要素。例如，一个博物馆既可被置于宏观层次来分析，也可被置于微观层次来分析。一句话，“宏观”与“微观”分别对应于“装配体”与“要素”。他将这种要素与装配体在不同分析层次上的嵌套关系称为“装配体嵌套”（embedding of assemblages）[7]。此外，德兰达为装配体构想了“表意性”和“凝聚性”的双轴，以分析组成要素对装配体的作用[8]。一方面，一个要素可能对装配体发挥不同的表意作用，如一辆汽车的车体几乎是纯粹物质性的，而车标符号则是高度表意性的。另一方面，一个要素也可能使装配体走向“辖域化”或“去辖域化”。辖域化既可通过定义或锐化装配体的空间边界来实现，也可通过强化装配体的内部同质性来实现，而反之则可使之去辖域化。譬如，砌上围墙可辖域化一座花园，为其开一道门则可使其去辖域化。

克雷斯韦尔提出了一个旨在分析场所的装配体理论 ——“场所作为装配体”。他指出，任何场所都可被视为装配体，包括“物质性”“意义”与“实践”三个基本维度[9]。一个场所的地理位置以及非生命性（如土壤、石头、路灯）或生命性（如人、动物）的要素都揭示了其物质性。意义是通过场所装配体中的表意要素来实现的，有些场所装配体中的表意要素数量众多、表意复杂。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的微观场所装配体“遇难者 300000”为例，设计师调用众多表意要素建构出了一整套意义[10]。

实践则通常与人联系在一起。仍以场所装配体“遇难者300000”为例，它们激发或容纳着观众的献花、摄影等记忆实践[11]。克雷斯韦尔还指出，场所装配体具有时间性[12]。任何要素都只能在时间中展露并受其束缚，因此它们都会随着时间推移或快或慢地走向消失。仍以“遇难者300000”为例，关于它的场所装配体自建馆以来逐步由少变多，但某些要素早已消失不见[13]。

当透过“场所作为装配体”的视角来考察“记忆之所”[14]时，该理论中的“物质性”维度就自然会与记忆研究中的“物质性”维度发生相遇。传统上，记忆被视为一种心智过程，常被隐喻为“储藏室”或“阁楼”，其中存储着有限的感知印象和知识，而物品则要么被理解为思想的外部存储库，要么被视为象征性载体[15]。这种对物质与记忆关系的传统理解在当代记忆与物质文化研究者看来颇成问题。首先，物品不能忠实存储明确的记忆，将物质文化视为思想或信息的存储库不可靠；其次，这种将心智视为独立实体、将物质世界视为外部客观实体的观念把心智、身体、世界割裂开来；再次，将物质世界视为一套有待解读的符号系统容易导致心智与物质世界的脱节[16]。他们主张将物质性视为记忆痕迹和感官“指示”（index），对物品与记忆关系的考察重点在于物品如何通过感官接触来“唤起”而非“储存”人的记忆。记忆之所以能被唤起，是因为物品上留存的记忆痕迹能对感官产生冲击，或换言之，物品能充当过去事件或行为的指示。这种物品对记忆的指示关系不是武断的象征性符号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或物理上的临近性。同时，记忆唤起不是简单的信息检索，而是人与物之间具身性和对话性的相遇[17]，物会在此过程中从感知和感官上给人留下印象。此外，人–物关系中也存在“时间性”问题。例如，在有些语境下（如失恋）存在一种人–物的“时间脱节”（temporal disjuncture）[18]，而记忆的产生又往往正是源于这种时间脱节。最后，作为指示的物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总是处于某个更大的“指示场域”（indexical field）或“引证场域”（citational field）之中，由此与个体、实践、时间等连接为某种“关系网络”[19]。换言之，一个物品只是特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20]。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田野观察法、访谈法和档案材料来回答上文提出的研究问题。首先，对失恋先生博物馆做了为期五个月（2019年6月至11月）的频繁田野观察。其中，有15次观察在4小时以上。最初两三次采用参与式观察：以“观众”身份，仔细观察馆内的布置、展品、许愿卡等各种事物，并将任何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事物都写入田野笔记。随后，以“研究者”身份，在馆内开展非参与式观察，观察内容包括空间、物、人在内的各个方面，并撰写了大量田野笔记。

其次，对许多观众做了非正式访谈，也对15位馆方人员、捐赠者及观众做了深度访谈。非正式访谈往往发生于受访者在某些方面引起我们特别注意时，如参观时间长、身份特征突出、情感状态明显。通过非正式访谈，有6位观众（B、H、K、L、N、O，3男3女）又进一步接受了深度访谈。同时，在馆方帮助下，深度访谈了7位捐赠者（C、D、E、F、G、I、J，2男5女），主要围绕捐赠原因、展品背后的故事、上一段恋情经历、当前生活状况等展开。我们还深度访谈了馆方的策展人（A，男）和一位工作人员（M，女），主要围绕策展缘起、展览基本情况，以及捐赠物的征集、接收与管理等展开。15位受访者的年龄在21到31岁之间，访谈时长在1.5到3小时之间。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最后，收集了馆内两种档案材料：展品捐赠登记表、观众许愿卡。通过登记表，我们掌握了捐赠者的更多信息，并从中物色到了深访对象。从许愿卡中，我们摘抄了许多精彩留言。

四、一座失恋博物馆的“场所装配体”面貌

我们借助“装配体嵌套”[21]的思维来勾勒失恋先生博物馆作为“场所装配体”的基本面貌。我们将整座博物馆视为宏观装配体，它嵌套了

表 1 深度访谈的受访者基本情况

代码	性别	年龄	身份	访谈地点	访谈时长
A	男	28	策展人	失恋先生博物馆楼下茶室	2.5 小时
B	女	25	观众	失恋先生博物馆楼下咖啡厅	2.5 小时
C	女	24	捐赠者	武侯区万达广场星巴克	3 小时
D	男	27	捐赠者	失恋博物馆楼下甜品店	1.5 小时
E	女	21	捐赠者	微信电话访谈	1.5 小时
F	女	20	捐赠者	环球中心星巴克	2 小时
G	男	30	捐赠者	微信电话访谈	1.5 小时
H	男	25	观众	环球中心星巴克	2 小时
I	女	28	捐赠者	失恋先生博物馆内	1.5 小时
J	女	22	捐赠者	宽窄巷子必胜客	1.5 小时
K	男	23	观众	富力天汇太平洋咖啡	1.5 小时
L	女	22	观众	富力天汇太平洋咖啡	1.5 小时
M	女	26	工作人员	失恋先生博物馆内	2 小时
N	男	31	观众	富力天汇星巴克	3 小时
O	女	23	观众	宽窄巷子必胜客	2 小时

“门外区”“展览区”和“摄影区”三个中观装配体，而每个中观装配体又嵌套了若干微观装配体。

作为中观装配体的门外区利用多个微观装配体来“辖域化”博物馆，以彰显和固着其场所身份。第一个微观装配体是大门上方悬挂的“成都失恋博物展”招牌，不仅表达了“博物馆”的类属性质，而且宣告了“失恋”的独特定位。第二个微观装配体是外立面上喷绘的“失恋词频”，其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望激发观看者的情感共鸣。第三个微观装配体是一大块透明玻璃，透过它可看到留言间中的各种物品和正在留言的观众。

作为中观装配体的展览区包括“出入口走廊区”“留言区”“展览大厅”“小展厅”“七情室”和“《一生所爱》背景音乐墙”等微观装配体，每个微观装配体都含有若干表意要素。出入口走廊区是一条狭长走廊，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表意要素是从屋顶悬垂下的一块块失恋语录牌和内侧墙体上的失恋语录。留言区是一个小隔间，外侧墙上安有一大块透明玻璃，内侧墙上除了缀满交通票根之外，门洞被一块布帘与展览大厅既隔离又连通。留言间中拥有整座馆内最具生产潜力的表意要素，观众可在此书写许愿卡和“最后一封情书”。交通票根的表意性在于，无声地诉说观众远道而来的“旅程”故事。展览大厅与诸多其他微观装配体之间存在既隔离又连通的布帘，因此成为最具“互动潜力”的微观装配体，也成为外形最不规则的微观装配体。尽管展览大厅中除了两个展台上的失恋记忆展品之外别无同类展品，然而此处表意要素却相当丰富：一侧摆有几棵供观众悬挂许愿卡的许愿树；一面墙上设计了一个名为“学会爱”的电影互动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答案之书”的互动区；在与摄影区既隔离又连通的布帘上印有失恋类文字。小展厅共四个，其中三个虽一墙之隔但并不互通，旨在延长看展流线。只有靠近博物馆出口的小展厅是一个无门帘的开放式展厅。在每个小展厅内，都有若干爱情遗留物及讲述其背后故事的展牌。在每个非开放式小展厅的内墙上，通过字号大小、位置错落、颜色搭配为失恋语录带来了独特审美效果。有一个非开放式小展厅内设有一个弹珠游戏互动区，另一个非开放式小展厅内墙上有一个“天使的翅膀”的摄影道具，后来被一幅异地恋地图取而代之。七情室是一排名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的小隔间，内墙上有表达相应主题的标语。《一生所爱》——电影《大话西游》片尾曲——的背景音乐墙正对一条粉红羽毛走廊，这种视听表意要素塑造出一种极具弥漫性的失恋氛围，也会让熟悉该影片的观众回忆起关于“爱而不得”的经典台词，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说我爱她，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由失恋者捐赠的爱情遗留物及其失恋记忆叙事是展览区最具定义性的表意要素。虽然物品本身可释放一定表意性，但真正使其具体、系

统且个性地完成表意的乃是由捐赠者书写的失恋记忆叙事。每一个叙事都带有标题，其中最常见的是直接以物品为其核心或全部信息的“实题”，如《子弹壳戒指》《未画完的画》《B超单》《两只小卡通玩具》《国徽》《一个空的戒指盒》。也有很多未提及物品的“虚题”，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少有人走的路》《我们的故事，回忆里待续》。还有个别虚实相生的标题，如《爱心》——同时指向心形折纸和情感。正是物品与叙事共同组成了失恋记忆展品。同时，展牌落款中不尽相同的博物馆名字流露了展品的时间性，即从特定名字时期成为展品以来的“展品生命期”。此外，不少展牌上还有一种“评语”表意要素，包括“网友评语”和“策展人评语”两种类型。例如，《两只小卡通玩具》的展牌上有“网友评语：初恋就像一杯酒，喝了就醉”，《少有人走的路》的展牌上有“策展人评语：不被世人接受的爱情本来就是一条少人走的路，充满荆棘”。

比较之下，失恋标语是比展牌上的失恋记忆叙事更引人注目的文字表意要素。在出入口走廊上空到展览大厅和小展厅的墙上，用了上百条出自有名或无名之辈的失恋语录来烘托失恋氛围，从网络文学/文章、网络社区热评、经典文学作品（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歌词（如朴树的《那些花儿》、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当爱已成往事》），到电影台词（如《东邪西毒》和《海上钢琴师》），不一而足。

作为中观装配体的摄影区由小摄影间、粉红羽毛走廊、星空屋等微观装配体组成。小摄影间共六个，其中四个与展览大厅仅一帘之隔，另两个位于《一生所爱》背景音乐墙、粉红羽毛走廊与星空屋之间的角落。粉红羽毛走廊因其鲜艳色彩和走廊外形，比小摄影间更夺人眼球。星空屋以镜面和氛围灯来模拟星空效果并营造浪漫和梦幻的氛围，其中无任何与失恋相关的展品与意义建构。摄影区相对展览区而言处于辅助性地位，即使纯粹作为网红摄影打卡点而构筑的星空屋，也是为了给博物馆及其中的展览区带来更多观众。这种辅助性地位为馆方提供了空间弹性：当需要更多展览空间时，可将某些摄影空间改为展览区。譬如，有个小摄影间后来被改为“最后一封情书”展厅。

对不少微观装配体而言，布帘不仅是基础且关键的表意要素，更释放出了不同装配体之间“可通行性”的互动潜力。所有布帘上都印有烘托失恋氛围或表达特定情绪主题的文字。借助“观众”的中介，由布帘释放的互动潜力体现在不同微观装配体之间，如观众可从展览大厅掀开门帘进入留言间或反之。当然，这种互动潜力也同样体现在不同中观装配体之间，如观众可从展览大厅掀开门帘进入摄影区或反之。

在勾勒中观与微观装配体后，回到宏观装配体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座失恋博物馆将各种要素如此装配一体试图实现何种主旨表意性？不妨借用诺伯舒兹的说法，将主旨表意性称作“场所精神”[22]。策展人A表示，他希望建构一种“释怀、疗愈、面向未来”的场所精神。为此，他倾向于选择“进行时态”的物品，因为其蕴含的未完成性、残缺性或遗憾性与失恋主题高度契合。他也尽量不选择太过沉重、容易引发不良反响或让人太沉湎于过去的物品，例如他未选择一件与失恋者数次割腕相关的物品和一本由沉湎于过去的失恋者所写的日记。他认为：“失恋博物馆是情感的宣泄出口，而不能是失恋的深渊，我们的目的是去淡化这个事情。”其实，他创建失恋博物馆的过程也构成了一个他对失恋的自我疗伤过程。他还表示，未来自己希望更完整地展现恋爱过程，以引导观众学会释怀与面向未来。他说：“失恋的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没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成长，如果能当作一种成长，那么回首的时候高度更高，更容易走出来……失恋本身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无非就是一个小坎，它仅仅只是个人的感情经历……我们希望他们能走出这种情绪，更多地面向未来。”

最后，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建构这种场所精神中交由观众生产的两个表意要素：许愿卡和“最后一封情书”。正是得益于观众的生产性，策展人追求的场所精神才能日复一日焕

发出动态更新的品质。两者虽同为表意要素，但差异显著。其一，在媒介形式上，前者为一张小卡片（其实就是观众领到的那张门票），后者是一个留言簿。其二，在内容指向上，馆方希望观众在前者上书写对未来的憧憬，在后者上书写对过去的告别。其三，在公私性质上，两者均存在辩证性：前者与门票的合一为其奠定了“去个人化”的私人性基础，但它会在被写下内容并展示后获得公共性；后者的留言簿形态和作为由不同观众共同生成的展品为其奠定了公共性基础，但“情书”内容又高度私人性。相对而言，一张许愿卡在公共性上明显比一本“最后的一封情书”留言簿短暂：前者中的大部分每天会被取下，以将空间留给新的许愿卡。馆方受访者 M 和 A 表示，他们会优先取下字太差、辱骂性、情绪太负面，有碍观瞻的许愿卡，而保留字数多、内容有趣和阳光的许愿卡。

五、捐赠爱情遗留物及其折射的遗忘形式

失恋者捐赠爱情遗留物对失恋博物馆来说构成了最具前提性和定义性的实践，因此本节转入对捐赠实践的分析。

从捐赠登记表上关于拥有何种爱情遗留物的回答中，可以发现一系列特征。其一，绝大多数人以相当具体的词汇来指称遗留物，如相册、手套、情书、照片、球衣、戒指、围巾。也有人以非常笼统的词汇来指称它们，如礼物、礼品、纪念品。笼统词汇几乎总在某些具体词汇后出现，如“相册啊”“礼物啊”，因此揭示了一种失恋者不愿在捐赠语境下详细罗列的心理。其二，大多数人的回答中只提及少许物品。仅有少数人所列较多，如一位女生说：“东西太多了，例如衣服、包包、化妆品、口红、各类书信贺卡、各类小礼物、钥匙扣、吹风机、烘干机、电饭煲。”其三，绝大多数人提及的物品专属于二人世界。只有个别人所列之物超出此范畴，如一位女生在列出数种二人世界物品后说：“还有对方妈妈手写的明信片和钥匙扣、他奶奶送的小挂件。”其四，绝大多数人提及的遗留物为无生命之物。仅有个别人提及有生命之物，如宠物。其五，有些人提及“数字”遗留物，如电子邮箱、steam 好友、社交媒体聊天记录，这折射出了当代人失恋的数字时代语境。甚至，有人视“聊天记录”为最重要的遗留物。其六，有些人提及与遗留物相关的时间性。最常见的是物品进入恋爱关系的特殊时间性，如“第一次送礼物”或“情人节礼物”。也有物品进入恋爱关系中的日常时间性，如一位女生说：“就平时送的小礼物，写的小纸条，一起去玩买的纪念品。”还有物品见证部分或全部恋爱旅程的持续时间性，如一位男生提及围巾时称它是“那个冬天她对我最温暖的关怀”，一位女生提及衣服、书信等物品时称它们是对“四年八个月”初恋的见证。

失恋者对登记表上关于如何处置不同类型遗留物的回答揭示了在捐赠之前的常态处置方式。他们提到“留着”“扔掉”“砸碎”“继续用”“送人”“出售”“封存”等诸多方式，以“扔掉”最为常见。只有少数人表示处置方式不受物品类型影响，如一位女生称“全部打包放杂物间”，另一位女生称“正常留着……无论什么类型的都会留着”。大多数人虽对不同类型的物品有不同处置方式，但对“类型”本身有着种种区分标准。有些人按单一标准区分类型，诸如“喜欢”（如“比较喜欢的留着，其他或者送人或者丢了”）、“贵重”（如“稍显贵重的可能会留着或出售，一般遗留物会直接丢弃”）、“有用”（如“其他有用的东西，例如口红、化妆品，这些我还是继续在用”）、“与对方有关”（如“与他有关的一切物品都扔掉了……他妈妈和奶奶送的都留下来”）。有些人区分类型的标准不止一个，诸如“可爱”+“顺眼”（如“后来如果可爱看着顺眼的就留着，其他的全部捐献出去”）、“有用”+“回忆”（如“有使用价值的会继续留下来，没用的会选择扔掉。承载了许多回忆的东西，我会选择保存起来，但是不会去看它。”）、“有用”+“意义”（如“有用无意义的东西，我还在用。有用有意义的东西，还了，扔了，送人了”）、“实用”+“喜欢”（如“比较不实用的，我一般就压箱底等着某次自然遗落，实用的，譬如前女友送过我鞋子和外套，我还在穿”）。

从对登记表上关于选择何种爱情遗留物捐赠并展出，以及如何看待捐赠行为的意义的回答中可见，与拥有的遗留物相比，捐赠并展出的物品表现出高度选择性。有些人还给出了如此选择的原因，如一位女生从衣服、饰品、前男友给自己买的第一条裤子、她买的第一件情侣衣中选择了“第一件情侣衣，因为还蛮好看的”，而另一位女生则从照片、公仔、毛绒睡衣、包、steam好友、前男友妈妈的手写明信片和钥匙扣、他奶奶送的小挂件中选择了“睡衣和他妈妈写的明信片。因为在当时都是开心的时刻，虽然没能走下去，但让我曾经觉得温暖过，现在也依然珍惜”。少数人未表现出任何选择性，愿将所有遗留物捐赠并展出。同时，捐赠者们为自己捐赠并展出的行为建构的意义具有多重指向性。首先，绝大多数人指向自身，诸如：“与自己分离”或“‘我来过的’存在感”。其次，有些人指向对方，如“那个灯泡，说不定他会看到呢”或“让她再成长吧”。再次，有些人指向博物馆，如“捐出去丰富一下这个博物馆也算是物尽其用吧”或“留在自己手里也没啥用，不如去博物馆发光发热”。最后，还有些人同时指向自身与观众，诸如“和陌生人分享我的记忆，也帮我保留和封存美好”。

失恋者捐赠爱情遗留物时需在登记表上“故事简介”一栏写下相关故事。书写故事自然是一个因回忆失恋经历而情绪外化的过程，故我们可从表上“情绪”一栏中看到由物品接收人观察到的种种情绪状态，从“正常”“低落”“哽咽”“伤心”“大哭”到“崩溃”，不一而足。有些人为自己的故事精心拟定了标题，如《捂不热的心》《致·已逝的错爱》《遥远的你》。这些故事大致落入两种基本叙事类型。一种是“以爱情遗留物为中心”的失恋记忆叙事。如一位捐泡泡机、项链、戒指的女生写了四段，前三段各呼应一种物品，最后一段简要梳理爱情旅程。另一种是“以爱情旅程为中心”的失恋记忆叙事，涉及或不涉及捐赠物。再如一位捐手工泥塑的男生以五段讲述从相遇、相恋、分手到放下的爱情旅程，仅在倒数第二段简要提及捐赠物。在这种叙事中，有些仅含蓄呼应捐赠物，如一位女生仅以“已有身孕的我”的表述来呼应捐赠物“报告单”，还有些闭口不提捐赠物，如一位捐折扇的女生对爱情旅程的概述中完全未提捐赠物。

我们从对捐赠者的深度访谈中发现，他们的捐赠行为折射出“保存式遗忘”和“建设式遗忘”[23]两种不同的遗忘形式。捐赠改变了人与物之间原有的记忆唤起关系，故有望带来一种保存式遗忘效果。受访捐赠者普遍表示，捐赠行为提供了一种以“保存”通往“遗忘”的方式。有些人只希望博物馆代为妥善保管其物品，不展出它们，而更多人则恰恰因为可在馆内公开展出才决定捐赠。只保管不展出使博物馆仅可发挥“存储记忆”的作用，公开展出则使其可发挥“功能记忆”的作用。无论展出与否，捐赠都切实改变了原有人–物关系：一方面，将过去的记忆妥善保存在了别处，这种保存式遗忘客观上外置了情感与记忆；另一方面，使作为“指示”的物脱离正常记忆唤起关系，甚至将其展品化，让其焕发的公共展示价值取代个人纪念价值。人–物关系的改变也使失恋创伤记忆获得了向叙事记忆转化的可能。诚如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言，公开展览本质上是一种遗忘策略，因为记忆一旦作为故事被记录下来，便有了被消除、改写或推翻的可能[24]。更重要的是，言说与叙述有助于创伤情感的释放与消解，进而产生疗愈效果。捐赠者F一开始面对“故事简介”一栏无从下笔，后来在泪流满面的回忆中写到多得想再加一页纸，写完感到长舒一口气。她回家后甚至继续顺着那种感觉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长动态，再读它时竟“有点像在看一个和自己的经历很相像的小说一样”。当失恋者决定捐赠并展出物品及背后故事时，冀望通过公开诉说对创伤记忆进行的“物质性转化”[25]来实现自我疗愈。捐赠者C意识到不能一直沉湎于过去的悲伤中，遂选择将B超单及背后故事捐赠并展出。总之，公开展出完成了失恋记忆的公共化、客体化与外置化，创伤因诉说与倾听而有了遗忘与治愈的可能。

失恋者的捐赠行为亦有望带来一种建设式遗忘效果。有些人会先通过自我暗示实现暂时

性遗忘，这种暂时性遗忘也有望转化为永久性遗忘，而能否成功转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失恋者能否迈出主动遗忘的一步而释怀过去。在所有受访捐赠者中，只有 C 至今未做好释怀过去的心理准备，她更多地将捐赠作为一种指向被引产孩子的纪念方式。受访捐赠者普遍认为，捐赠具有一种“仪式”性质，有助于放下过去、面向未来。E 称捐赠是为过去的感情找个归宿；G 称想通过捐赠告别过去并开启新关系；F 称捐赠是一种放过自己和释怀过去的行为；D 和 H 称捐赠是一种斩断过去的方式。另一个因素是失恋者如何在处理创伤记忆过程中建构新的自我认同。在受访捐赠者建构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浮现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通过“加害者”的在场来加速治愈。E 在分手第三天得知前男友闪电交上新女友，第二天极度崩溃的她捐掉了戒指、泡泡机等物品，并希望尽快展出。她急于展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借此加速自我认同的改造过程。戏剧的是，不久后他们又复合了，然后她带他到馆里看自己的捐赠品和书写的故事，希望他理解自己的失恋之痛。对她而言，男友是其失恋创伤的加害者，也是其公开诉说最重要的受众。加害者在现场阅听中表现出懊恼、自责、悔恨等情绪有望为受害者提供一种有效的创伤疗愈方式[26]。另一条路径是将创伤记忆光辉化。公开展览推动创伤记忆向叙事记忆转化，而这种叙事往往会修改故事情节，甚至美化自身表现以维持自尊[27]。在所有受访捐赠者中，只有 C 和 I 承认双方都对感情破裂负有责任，甚至将责任更多归咎于自身，其他人将自身摆在绝对的“牺牲者”或“受害者”位置，将分手责任归咎于对方或第三方：D 称自己放弃机关单位的工作去前女友的城市，但因她父母极力反对而分手；E 称自己为前男友放弃工作去他的城市，最终因无法忍受他的不忠行为而分手；F 称自己在与前男友的恋爱中扮演“舔狗”，倾情付出却一无所获；H 因无法忍受前男友的性格及其母亲的落后性别观念而分手。这些失恋者利用不同的叙事框架对失恋创伤记忆“光辉化”，以重新定义和建立自我认同：D 将自己建构为自我牺牲者和外部压力的受害者；E 和 F 将自己建构为倾情付出、为爱牺牲的殉道者；H 将自己建构为敢于抗争的独立女性形象。无论这些形象真实性如何，被光辉化的记忆都可能随着重复讲述而被讲述者当作“事实性记忆”，并有望在此基础上建立符合当下需要、面向未来的新自我认同。

六、观众在失恋博物馆中的多元实践

失恋先生博物馆容纳或激发了以青年群体为主的观众的多元实践，其中看展、游戏、摄影和留言是馆方通过场所设计刻意追求的四种实践形态。

看展是观众在展览区最基本的实践。看展受位置临近性、现场观众流量、事先期待的展品等因素影响。例如，一对情侣来到展览区后，男生到近旁一个小展厅观看，女生直接先去找那件在抖音上反响热烈的展品《未画完的画》。这些因素容易导致漏看，看展欲望强烈的观众在意识到漏看后往往会去补看。在结伴而来的观众中，有些人几乎全程一同看展，甚至边看边聊。其交流内容与展品相关居多，但与展品相关的交流未必与爱情或失恋相关，如两位女生看到尤克里里时回忆了自己与此种乐器相关但与爱情无关的趣事。一同看展的观众未必具有同等兴趣，不难见到一方草草观看后央求还在认真看展的同伴去拍照区甚至离馆的情形。相较之下，独自前来的观众虽无同伴互动，但并非不能表达。一位独自前来的男生在多件展品前若有所思，对着展品或摸着墙上的失恋语录唉声叹气或自言自语。大多数观众十几分钟即可看完，而奔着摄影打卡而来者通常对展览三五分钟走马观花，有些甚至根本不看展。

从对观众的访谈中可以发现，他们在看展过程中存在两种典型心理。一种心理是视看展为告别仪式。“仪式”是他们口中一个高频词，如“来这里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告别仪式，以后不会来这了，这种地方对我而言就是对过去自己的告别”或“我和她其实都没有好好地说分手，来这里算是把这个仪式给补上吧”。当然，

并非所有原本计划的告别仪式都能成功，偶能见到告别不成反复合的情形。一对年轻情侣已因家庭反对分手数月，但仍放不下彼此。趁女生即将去外地出差之机，他们相约来馆参观，希望将此当作对过去爱情的正式告别，然而看完别人的失恋故事后，他们决定重新在一起。另一种心理是在看展中进行爱情怀旧。馆内的失恋展品有望触发观众心中对爱情的怀旧情绪，使其个体记忆与此公共空间所建构的集体记忆发生某种情感联系。博伊姆（Svetlana Boym）所说的“修复型怀旧”和“反思型怀旧”[28]都可以在观众身上见到。修复型怀旧认为，过去是一个完美的快照和比现在更美好的存在，不应显露出任何衰败迹象，而应以现代技术重现过去，表现出一种执着的返乡心理。在不少观众身上，这种返乡心理表现为对过去爱情的美化与追怀。一些观众表示，在参观中因受到这个回忆空间的影响，对某些展品产生了共鸣，并由此回忆起逝去的爱情。即使那段感情涉及创伤记忆，他们仍表示“值得留念的部分更多一些”。刚经历过一次失恋的受访者 K 坦言看展时回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在忆及带给自己很深伤害的前男友时说：“当时很恨他，现在再去回忆会觉得感激，感激自己有那么一段经历，自己获得了成长。如果给他一个标签的话，那我会给他一个‘最感激的故人’，现在感觉他更像一个亲人。”除怀念这段创伤性爱情之外，看展也勾起她对高中时美好初恋的无比怀念，而唤起怀旧的是一件旧手机展品。与修复性怀旧不同，反思性怀旧延迟返乡，更重视回忆过去对当下和未来所蕴含的新的可塑性。不少在馆内追怀过去的观众无意回到过去，而希望从过去中汲取经验与力量，以拥抱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受访者 B 在看展后拍下入口处墙上的标语 ——“2019，愿自己重生”，并分享至微信朋友圈。她表示：“我来这里，就意味着我真的放下过去了，来这里看看别人的故事，也会想起自己的经历，也会怀念那些美好的回忆，但这些回忆更多是让我知道我以后想要的是什么，回忆过去是为了让我更好地面对未来。”

玩游戏构成了看展过程中的伴随行为。“等还是不等”和“答案之书”这两个游戏互动区激发了不少人参与。前者是一个弹珠游戏，弹珠在往下滚落中因遭遇多层分叉而最终落在底部三个答案——“不等了”“再等一分钟”和“继续等”——中的一个。后者是让观众先默想一个问题，再随手翻至书中某一页查看并自行解读答案。尽管两者的答案都高度随机，但观众在游戏中表现出了三种典型心理。一种是“确认”心理。很多失恋观众希望游戏能确认其心中已有的答案。一位玩弹珠游戏的观众惊叹：“很神奇，我玩了三把，三把都让我别等了，我觉得确实是缘分到了，确实我也不会回头了。”有些人玩了多次才得到与心中答案一致的答案。而答案之书中答案的“弱编码性”提供了巨大解读空间，只要朝着心中答案自圆其说地解读，即可完成“确认”。另一种是“游戏”心理。不少非失恋者怀此心理来玩，比如有人多次尝试如何才能让钢珠给出不同答案，也有人多次翻开答案之书看分别得到什么答案。还有一种“证明”心理，尤见于情侣观众。他们来此看展是希望从别人的失恋故事中汲取经验教训，以珍惜当下感情。当玩弹珠游戏时，他们往往不得到“不等了”不罢休，将其理解为对自己与过去切割的证明。同样，答案之书中答案的弱编码性使“证明”不难完成。一位女生问“我们会不会吵架”，翻到的答案是“毫无疑问”，男友立即表示“毫无疑问，我这么怂的人怎么敢跟你吵架”，她对此解读欣然接受。

摄影是一种在广泛性上仅次于看展的观众实践。这固然极大归功于摄影区，但展览区也同样激发了强烈的摄影欲望。观众摄影大致落入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记录性摄影。展览区的摄影以观众看展过程中的拍照记录为主。出入口长廊、展览大厅、失恋语录墙体、“最后一封情书”展厅都是颇受青睐的摄影场景。这些记录性摄影带有明显“游客的凝视”[29]性质。第二种是怀旧性摄影。有些人之所以拍下某些展品或某些语录，在于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它们激活了其记忆并令其怀念已

逝的感情生活。几乎每位受访观众都将其怀念的感情生活视为“青春”的一部分且是“美好的”，选择性地过滤掉了不好的记忆。这种怀旧性摄影也给予了一些观众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决心，例如一位拍下印有“The Long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的那面墙的观众表示：“看着这首诗很有感触，拍下来也是为了告诫自己吧，就算再怀念也该和过去说再见了。”受访的观众 B 拍下标语“2019，愿自己重生”，表示已决定告别过去，希望这一年能真正重生。第三种是展演性摄影，尤见于女生。大多数展演性摄影者因在网上看到别人发的精彩照片或视频专程前来摄影打卡，往往备有诸如汉服、纸伞、头纱之类的特色道具，拍完后将其照片或视频发至社交媒体。馆方对这种摄影也有激励措施：“在失恋博物馆中拍摄抖音短视频，并加上定位分享至社交平台，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虽然这些观众普遍在摄影区拍摄，但也可见到相反情形：有些人感觉摄影区乏善可陈，反被展览区的“失恋”主题与氛围吸引。在 2019 年国庆节期间，身着红白古装的高中生（两女一男）来馆打卡，未相中摄影区，却相中了七情室，见缝插针地进入其中拍照，随后挑出与每个隔间相关的照片各一张，组成一个“工”字形，以隔间“惊”里的一句“你怎么来了？”作为文案，并带上博物馆的定位，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有的展演性摄影在被发至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后，影响甚巨。例如，有人为展品《未画完的画》拍摄短视频，配上背景音乐与文案发至抖音，引来众多网友点赞、点评、转发。这种线上扩散可发挥多重作用：将这个特定的物理性记忆之所延伸至虚拟空间；为这座失恋博物馆带来更多观众；通过“#失恋博物馆#”话题将各地同类博物馆汇聚为一道更大的“失恋”数字记忆景观；被打卡内容连接在一起的网络公众有望形成关于失恋和失恋博物馆的公共记忆；网络公众的众声喧哗可能反过来影响博物馆的空间生成。

最后，留言构成了观众在馆内最具生成性的实践。许多人会将留言后的许愿卡钉在“许愿墙”或挂到“许愿树”上，供人观看。大多数许愿卡内容与恋情相关，并表达了三个基本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与前任对话，如“希望以后你能安好，我能变优秀，别再在我伤又快愈合时再伤我一击了”。第二个主题是释怀过去，如“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种渴求，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无奈，一别两宽，各自珍重”。还有一个主题是许愿未来，如“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太多，我等你娶我，往后余生都是你！”也有很多许愿卡内容与恋情无关，如“希望 2019 全家人健康”或“祝我考研顺利”。偶尔，有观众后来想要回其许愿卡。一对分手恋人相约前来看展并写下许愿卡，四天后女生对男生提出的复合前提是找回那张许愿卡，他返回馆里，工作人员陪他在储藏室找了一下午才找到。与许愿卡上只能表达简化的故事和碎片化的情感不同，观众可在“最后一封情书”中尽情书写。许多人认识到情书的私人或隐私性质，因此自己在留言簿中写情书时不会翻阅他人的情书。我们翻阅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期间全部情书后发现，大部分是在告别过去，但也夹杂一些与恋爱相关或无关的戏谑留言，如“多大了还在这聊失恋？来玩王者荣耀，带你飞”或“加企鹅 ×××××××× 扩列”。

七、失恋博物馆作为“记忆之所”的多重面向

在上述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需进一步探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失恋先生博物馆作为“记忆之所”涉及哪些记忆面向？换言之，当我们说它是记忆之所时究竟在说什么？

第一个面向是“地点记忆”[30]。任何一个位于特定地点的场所都或多或少有其地点记忆，甚至可能还被人通过某些记忆载体保存了下来。鉴于这一地点自购物中心启用以来已经经历了若干种场所身份的更迭，因此它在不同时期的地点记忆必然不平衡，其中与失恋博物馆的场所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地点记忆或许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地点记忆——微信、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上保存了大量这种地点记忆，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馆是所在城市的第一座失恋博物馆。

第二个面向是失恋记忆捐赠品的“物质性”。爱情遗留物与体现“物－人”关系的失恋记忆叙

事一起构成了“失恋记忆捐赠品”的物质性。这些独一无二的失恋记忆捐赠品是失恋博物馆真正成其所是的最具定义性的表意要素。对现场捐赠者而言，其失恋捐赠品的物质性是在博物馆的捐赠处通过他们的现场记忆唤起并具身铭刻于纸面，才最终被形塑出来。可见，博物馆为捐赠品物质性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唤起性情境，甚至捐赠登记表的格式和物品接收人的在场可能也会微妙地影响失恋记忆的唤起进程、记忆叙事内容，以及具身铭刻 / 书写。

第三个面向是失恋记忆捐赠品在失恋博物馆中发挥的记忆作用。它们在博物馆中同时发挥着“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31]的作用。只有通过馆方基于场所精神、故事的品质、与同类捐赠品的重复性等因素的考量的捐赠品才能真正成为“失恋记忆展品”，进而发挥功能记忆的作用。因捐赠者不愿展出或未被馆方选择来展出而被置于博物馆储藏室的“失恋记忆储藏品”则只能发挥存储记忆的作用。这两种记忆也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性：一方面，随着与馆方考量因素更契合且愿意展出的捐赠品的到来，或馆方对先前未选中捐赠品的价值的重新发现，部分现有失恋记忆展品会被撤下并放回储藏室，从功能记忆沦为存储记忆；另一方面，捐赠者是否同意展出的态度未必一成不变，一开始不同意者后来可能同意，反之亦然，由此导致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的相互转换。

第四个面向是私人失恋记忆的“公共化”。失恋记忆展品必然带来私人记忆的公共化。一旦捐赠者意识到这种性质变化，那么，无论是否同意展出，他们在书写失恋记忆叙事时都可能对内容进行更有意识地选择，并对某些个人信息（如本人或前任的姓名）匿名化处理，以达到保护隐私或符合社会期待等目的。私人失恋记忆公共化有望产生的主要公共价值在于，使观众从别人的失恋经历和记忆中汲取经验教训。值得指出的是，琼斯（Bryan D. Jones）的“指示场域”概念[32]为观照失恋记忆展品由私而公的性质变化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这种性质变化不仅改变了一个失恋者自身的微观指示场域面貌，而且也经由博物馆在公开展览情境中将他 / 她以及其他人的失恋记忆展品并置，人为构筑了一个以“公开展示”为特征的指示场域。

第五个面向是失恋博物馆的“集体记忆文化”性质。将不同人的失恋记忆捐赠品汇聚在一座博物馆中同时关系到奥立克所区分的“集合记忆”（collected memory）和“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33]，这两种集体记忆文化反映了集体记忆概念自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以来在本体论上存在的“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紧张关系。对失恋博物馆而言，存在两种类型的集合记忆：一方面，来自一个个捐赠者的个人失恋记忆展品汇聚为一种具有观众可见性的集合记忆，可谓之“前台”集合记忆；另一方面，同样来自一个个捐赠者但被锁在储藏室中的失恋记忆储藏品则汇聚为一种缺乏观众可见性的集合记忆，可谓之“后台”集合记忆。对“前台”集合记忆而言，观众自然清楚，不同展品对应于不同失恋者。不过，这两种带有强烈个体主义色彩的集合记忆未尝不存在“集体”记忆：一件失恋记忆捐赠品可能折射出某种集体观念；观众可从“前台”集合记忆中领悟到某些集体观念，或调用某些集体观念来理解展品，而这些集体观念可能折射着某些集体记忆。可以说，集合记忆构成了失恋博物馆的表象，而集体记忆则构成了其价值根基。另外，馆方在选择何种失恋记忆展品时的考量也同时触及这两种集体记忆文化。例如，馆方不会过多地选择相似的爱情遗留物或相似的失恋记忆叙事，并会对部分失恋记忆故事“润色”或“二次加工”，就分别出于对集合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考量。

第六个面向是博物馆中失恋记忆的“媒介模态性”。这座失恋博物馆存在记忆媒介的多模态性。其中，文字是最浓墨重彩且最引人注目的模态。大量文字标语以多种方式为博物馆营造出了浓厚的失恋氛围。各种文字要素构成了一个琼斯所言的“引证场域”[34]：很多标语是馆方从网络社区中找来的热评，馆方也对部

分句子有所改动，不少标语摘自电影台词、歌词、经典文学作品，观众留言中也存在对馆内标语或馆外其他内容的引用或改动，而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不同方式或不同程度的引证。馆内也有视觉与声觉的模态性，典型体现为对电影媒介文本的忠实引证，如“学会爱”互动墙上的电影片段和《一生所爱》背景音乐。对观众而言，各种“源文本”可能令其唤起与阅读、观影、成长、爱情等经历相关的记忆，也可能会影响其对失恋记忆展品的理解和对留言内容的书写。总之，一方面通过捐赠者和观众以文字模态构筑反映失恋记忆的“真实”品质，另一方面则通过文学、歌曲与电影等文本以文字、视觉与声觉多模态地构筑更具理想性或超越性的“虚构”品质，可谓虚实相生。

第七个面向是观众的记忆“生产性”。观众是失恋记忆展品的观看者和解读者，也是失恋记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有些观众仔细观看与解读某些失恋记忆展品、失恋标语或观众留言，甚至产生不同程度的情感共鸣。许多观众写下许愿卡和/或“最后一封情书”，这些由观众日复一日生产的留言中含有大量记忆（尤其是失恋记忆），其中许多甚至成为展品，既大大丰富了博物馆的记忆面貌，也为博物馆记忆带来一种生机勃勃的“生成”性质。同时，许多观众还将展品、标语、留言发布至微信朋友圈和抖音等社交媒体，甚至带上博物馆的定位、配上爱情背景音乐、带上“#失恋博物馆#”的话题，从而使这座博物馆内的失恋记忆大大超越了其物理边界——这可被理解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去辖域化”。尤其是“#失恋博物馆#”的话题，使各地失恋博物馆汇聚为一道更大的“失恋”数字记忆景观。

第八个面向是记忆的“商业色彩”。这座失恋博物馆的策展人从不讳言其商业色彩。商业色彩最典型地表现在对摄影区浓墨重彩的打造，尤其是奔着成为网红打卡地而去的粉红羽毛路和星空屋，旨在不仅吸引无失恋经历或对失恋不感兴趣的人光顾，而且也通过摄影打卡者为博物馆进行宣传和带来观众。这种商业色彩固然制造了一种不少人无意看展却沉醉拍照的格格不入景象，但也不乏本为摄影打卡而来者反被失恋记忆展品吸引的情形。还存在一种非常隐晦的商业色彩：对部分人的失恋记忆叙事加以“润色”。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二次加工都会多少牺牲故事或记忆的“本真性”，甚至可能会助长“虚构性”。

（责任编辑：孙尚如）

参考文献

[1] 欧琳卡·维什蒂查，德拉任·格鲁比西．心碎博物馆 [M]. 王绍祥，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7.

[2][14]Nora 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 de memoire [J]. *Representations*, 1989(26): 7–24.

[3][9][12]Cresswell T. Place [C]. Lee R., et al.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Human Geography*. London: Sage, 2014:3–21;9–12;14–19.

[4] Deleuze G., *Guattari F. A Thousand Plateaus* [M]. London: Continuum, 1987.

[5][6][7][8][21]DeLanda M.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M]. London, Continuum, 2006:1–140;4;17;12–13;17.

[10][11][13] 黄顺铭．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个案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8):15–37.

[15] Donald M. Precis of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J]. *Behavioural and Brain Sciences*, 1993, 15: 183–206.

[16][17][18][19][20][32][34]Jones A. *Mem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6;25–26;60;81;81;81;81.

[22] 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 [M]. 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23]Assmann, A. *Formen des Vergessens* [M]. Go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2016.

[24]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98.

[25] Sturken, M.,“The Objects That Lived: The 9/11 Museum and Material Transformation”[J]. *Memory Studies*, 2016, 9(1): 13–26.

[26] 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 [M]. 贺海仁，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27] 叶蔚春．文化记忆：从创伤到认同 [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8.

[28] Boym S.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29] Urry J.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M]. London: Sage, 1990.

[30][31]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16:343;146–156.

[33] Olick J K. Collective Memory: The Two Cultures [J]. *Sociological Theory*, 1999, 17(3): 333–348.

“Romantic Breakup” in the Museum: A Case Study Based on “Place as Assemblage”

Huang Shunming, Wang Zhoulinx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a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ce as assemblage”. The assemblage of this museum incorporates an exhibition zone full of rich expressive components and a meticulously-desgined photography zone, and it seeks to construct a genius loci of “letting go, healing, and facing the future”.The mnemonic naratives of romantic breakup written by donors of love relic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which are “love relic-centered” and “love journey-centered”. Their meaning-making of the act of donation has four orientations: toward themselves, toward the partners, toward the museum, or toward both themselves and visitors; their act of donation reflects two forms of forgetting: “preservative” and “constructive.”Among visitors, two typical mentalities are observed in the exhibit-viewing process: regarding their exhibit-viewing as a farewell ritual or engaging in nostalgia in their exhibit-viewing. When playing games, visitors display three typical mentalities, which are “confirmation”, “play”, and “verification”. Visitors’ photography falls into three basic categories, being “documentary”, “nostalgic” and “performative”. Audience’s messages express three fundamental themes, being “communicating with the ex-partner”, “letting go of the past”, and “making wishes for the future”. As a “site of memory”, the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involves eight mnemonic dimensions, such as memory of site, the materality of donated breakup relics, and the publicization of private memories, etc.
Keywords: romantic breakup; love relics; museum of broken relationships; place as assemblage; site of memory
Authors: Huang Shunming, College of Literaturt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Wang Zhoulinxin, Institute of Media and Memory, Sichuan University.

（上接第 14 页）

Material Compensation Ritual: Things-Humans Entanglement in Youth Subcultural Collecting Practices and the Embeddedness of the Collection Clock

Chen Long, Jing Yulun

Abstract: Based on Ian Hodder’s “entanglement theor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mplex “things-human relationship” within subcultural collecting practi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collectors and subcultural collectibles is not merely one of possessing or being possessed; rather, it constitutes a deeply entangle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formed through “dependence” and “dependency”.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erms of dependence,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young collectors and subcultural collectibles is collectively shaped by humans’ dependence on things, things’ dependence on other things, things’ dependence on humans, and humans’ dependence on other humans. In terms of dependenc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he “collection clock”, revealing how the temporality of things (life clock), the sequence of the operational chains (project clock), and the rhythm of platform algorithms (platform clock) collectively and precisely regulate youth collecting practices, entrapping them in multiple predicaments of dependency, economically, spatiotemporally, and emotionally. Ultimately, this dependency solidifies into a “material compensation ritual”—a ritualized practice based on the possession, obsession, and worship of things, which represents the ultimate cultural spectacle of youth collecting.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aterial culture analysis, this article unveils the complex entanglement of things, humans, and technology in collecting practices,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youth subcultural consumption.
Keywords: youth collectors; subcultural collectibles; things-humans entanglement; collection clock; material compensation ritual
Authors: Chen Long, School of Media, Soochow University; Jing Yulun, School of Journalism, Fudan University &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0 期

数字新闻的形制：从封面逻辑出发的实践现象学阐释 1）

骆世查　陈园

摘要　AI 文生图与文生视频曾引发新一轮对视觉转向的反思，但少有人指出，任何可视化的文本首先正是凭借封面图为人所触达。封面不仅是数字时代做内容的必要门径，这一具体界面也昭示着朝向通用人工智能趋势的数字文化技术的浮现。本文立足微信新闻的推送封面展开实践现象学考察，以期对微信新闻的特有形制与实践情境做出更精细化的阐释。此外，通过与大众媒介封面的比较，凸显数字封面的独异面貌，进而管窥数字新闻实践的具体媒介逻辑。本文着意化用弗卢塞尔、基特勒等对媒介技术代际转换的哲学书写，基于适量反身实践素材，指出微信新闻封面依“诱导逻辑”运转，凭“并行逻辑”确立意义，它们均区别于大众传媒的“提炼”与“递进”逻辑。研究强调，我们在用微信书写的同时，也是在为微信书写。数字封面的编程实践蕴含一种崭新的终端意识，超脱了文字代码的组织规则，意在造就“表面”的媒介基础设施。

关键词　微信新闻；数字封面；媒介逻辑；实践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骆世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 610207；陈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207

一、再问媒介逻辑：数字新闻是何“形制”

至晚十年前，就不断有学者探究微信新闻的独特运转方式。谢静侧重新闻理念层面，她指出微信新闻挑战甚至颠覆了大众新闻传播的生产范式 [1]。也有学者立足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了微信新闻分享机制 [2]。与之类似，彭曌等人也指出微信技术特征及其与任务的契合度可以较好解释人们的新闻消费行为 [3]。郭蕾和张伊妍把微信、网站、微博放到一起，探讨平台内部与之间的假新闻流转 [4]。曾维欣在其博士论文中谈及微信的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主流媒体账号上的新闻翻译实践 [5]。吴燕等人还探讨了微信何以持续模糊了新闻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并促进公民新闻实践 [6]。凡此种种，皆是中国视角与经验为数字新闻学所做的切实贡献，但这些重要成果的前提是认为微信是不言而喻、无须专门探究之物，研究要做的往往是在观念、技术、内容、

1）基金项目：2023 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学研究”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重点项目培育项目“全媒体语境下四川新闻发布研究”（GJ202301）。

行为等方面揭示微信新闻的不同之处。这多少透露出结果导向思维，大部分研究早已默认微信这一新闻产消工具的既定事实，鲜有人去厘清它和大众新闻传播究竟给人怎样不同的感觉，或者说，人们如何组织有关微信新闻的经验[7]。诚然已有关注“新闻体验”的学者，但若不是放到较为宏大的现代性体验上[8]，也多聚焦在视觉框架的感知经验上[9]。本文更想将数字新闻的感知放到实践现象学层面，既不全是理论解读，也并非经验调查，而是追索微信新闻这类中介化实践的运转逻辑及其特有形态。

媒介逻辑是在探讨新兴载体时常常使用的核心概念，可惜该理论在国内有被滥用之嫌，大多冠名媒介逻辑的成果要么将其望文生义为某种思维规律和规则，要么指向平台化、参与性、信息关系等抽象概念。阿什德（Altheide L. David）讲得很清楚，媒介逻辑是媒介呈现和传递信息的过程，其要素包括各种介质及媒介采用的形制（format），即材料的组织方式、呈现风格、对特定行为特征的聚焦或强调，以及媒介传播的语法规则等[10]。这在国外常被用来解析政治传播领域的媒体关注，所谓“形制”借鉴自齐美尔（Georg Simmel）对社会形式的力量与本质的洞见，指那套定义、选择、组织、呈现、辨别信息的规则和编码[11]。所有媒介皆具某种形制，并可据此加以区分[12]。形制是呈现和解读现象的一种框架或视角，可通过对形制的分析部分实现对媒介逻辑的剖析[13]。范·迪克（José van Dijck）等学者在后续研究中还进一步区分出大众媒介逻辑和社交媒介逻辑，后者的独特形制是可编程性、普及化、连接性、数据化[14]。这些都为我们重新审视微信新闻提供了新起点。

微信新闻首先绕过发行和出售，是通过“推送”抵达用户的。所谓“封面”，正是特指微信推文以图像显现，而不是一串字母、字符和数字组成的链接。事实上，教人如何做视频封面、笔记封面已是B站和小红书的一大垂类内容，用标题文字自动生成艺术字封面图甚至就是小红书的独有基础功能。连小宇宙这类声音向的平台，其知名播客如《凹凸电波》《大内密谈》《罗永浩的十字路口》等节目的每期音频也都有不同封面。封面在接下来的视频播客业态中只会更加重要。2025年6月，微信视频号又特意推出封面修改功能，图像链接在微信新闻的呈现上可谓无可或缺。我们触达微信新闻的姿态已非报纸时代的“翻阅”，而是“点击”。新闻信息被隐藏在“封面”这个一级界面之下，封面的特质深刻影响了微信新闻的“媒介内容创作与消费方式”[15]。已有研究显示，用户对微信朋友圈广告的信任程度整体高于其他平台[16]。与算法分发为特点的新闻APP不同[17]，微信用户需订阅后才能收到推送内容，其推送采用封面内嵌标题的形式。随着数字新闻学研究的深入，我们亟待更精细化的阐释，透过不同个案显明数字新闻的特有形制。再次检视微信新闻，亦是站在一种具体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上，剖析数字新闻实践的具体媒介逻辑。

有学者认为，数字新闻学研究应当将重点放在对人们的“新闻经验”（news experiences）的解释上[18]。常江也认为应当将数字新闻视作围绕“作为经验”甚至“作为生活方式”的新闻活动[19]。这要求研究者关注数字新闻活动的具体情境，对数字新闻做出原生态的记录与诠释。本研究正欲采取范梅南（Max van Manen）所谓“实践现象学”的立场来理解微信新闻。这种作为反思过程的现象学研究和写作实践，旨在用来反思实践、反映于实践，并且为实践做准备[20]。方法上不是纯粹的理论性分析，也不是全然的经验性调查，而是“详细描述”和“反思”[21]。具体操作类似参与观察法，更强调参与体验[22]。这种观察体验也亲近项飙的路径，即把个体经历问题化，将个人实践视作“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23]。

值得澄清的是，电影、电视等运动影像媒介的封面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库克（Roger F. Cook）认为运动影像的空间建构与照片等静态图像的空间建构有着根本不同，其叙事建立在对影像的体感和情动层面的身体反应上[24]。影片按照逻辑或时间顺序展开，以形成一种透明的叙述，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叙事推向大结局[25]。

运动影像的表意蕴含在影像的流动过程中，是整体的、历时性的，然而静态影像是一个此刻的、即时性的平面，其呈现机制、表意模式遵循着截然不同的范式，故囿于篇幅，本研究暂不将动态影像媒介纳入考量。

二、封面的运作：从“抓取”到“点击”

纵使推文封面图成为触达微信新闻的独特方式，但封面本身并非新事物，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观看封面。诚如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所言，“观看世界其实并不是我们如何看见，而是我们对所见的东西做了怎样的处理”[26]。因此，我们首要探讨的是封面如何为微信新闻赋予形式，这种形式又怎样组合成我们新的知识系统。简言之，接下来率先通过比较探讨的是微信新闻的表与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即封面如何成立，封面如何统摄内容。

虽名为“封面”，但微信新闻推送封面与大众媒介新闻封面组织内容的方式截然不同。报刊封面产生于编辑部的理性构思和逻辑编排，其编排是一种抓取意义的姿态，编辑选定重要文章，慎重调整每篇文稿的位置和占比，通过新闻内容和视觉设计的配合形成版面语言，表达报刊的观点态度。推送封面是微信新闻的显现方式，微信推送的封面虽类于传统报刊新闻标题的位置，其意义却不是概括、评价新闻内容，而是作为正文的图像化入口，封面图无需像文字标题一样被仔细解读，只需促发用户的点击行为。

（一）提炼逻辑：大众媒介封面的理性构思

版面是报纸组织新闻的方式，而头版则是一份报纸的脸面，是报纸的橱窗。《纽约时报》前执行总编辑艾布·罗森索（Abraham M. Rosenthal）认为头版呈现给读者的并非只是一些重要新闻，还包括本报编辑们对新闻重要性的判断，“新闻在本报头版上的位置，其本身就构成一件新闻”[27]。类似地，杂志封面也是杂志风格与内容的集中体现，一本杂志的视觉特征源于它的内容特征，杂志的视觉风格与杂志的定位与编辑理念应该相吻合，杂志设计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页面，而是蕴含着某种内容意义的页面[28]。《时代》周刊图片编辑戈登（Gordon Parks）认为封面其实就是一个杂志的广告，这是行业众所周知的规章，封面并不仅仅是新闻价值的问题，需要封面来吸引读者[29]。无论是报纸头版还是杂志封面，皆有符合该媒体理念的编辑方式，封面设计不仅是一种外观和装饰，而且是与媒体向读者传达的意义交织在一起，视觉设计协同新闻内容共同构成了新闻文本所表达的观点、态度以及世界观[30]。大众媒介新闻封面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编辑部理性思维的认知实践，体现了编辑主体对新闻价值的系统性评估与视觉逻辑的辩证统一。

报纸头版并不是一系列文稿的简单集合，作为报纸的门面，头版需要运用独特的视觉标识、字体和色彩等视觉设计展现报刊的自身个性。头版凝聚着从总编辑、编辑、美编到记者的层层心血，报头、报眼、头条、标题和图片等要素组成了头版的标识。此外，头版的编排起着引导读者选择阅读的作用，通过调配标题、正文和图片的位置、所占版面，向读者传达报纸的观点。有研究表明，在接受同等视觉信息刺激的情况下，人在阅读报纸时的眼动轨迹呈现顺序性的阅读规律：即从左到右，由上及下。但版面主视觉区的设置具有直接吸引关注的特征，可以改变上述阅读的视觉轨迹[31]。一篇稿件在版面中所占的面积大小与强势成正比，也与稿件的意义大小成正比，编辑往往给予意义大的稿件比较大的面积，意义小的稿件比较小的面积[32]。大号字、多行题、大图片、大块文章等编辑手段的运用是最常见的，以显示重要稿件的醒目地位。

相比于报纸的头版，杂志的封面更易于识别，其设计自然而简单，直接作用于读者的直觉而不是脑海中的文字概念。杂志编辑会选取合适的视觉工艺将文章信息、编辑意图、重点和风格传达给读者，并把标题、文字、色彩、配图和空白等元素组合成一个令人愉悦的视觉整体。多数杂志都会把杂志的卖点放到封面上以提示当期的主题，但导读功能较弱。已有研

究表明，Instagram 的界面是对时尚杂志封面的某种模仿和进化[33]。但该平台的构想在国内恰恰没有对应物，样式上最接近的小红书其实也更注重笔记检索属性。

对报刊封面卖点的精心设计，最终意图在于促成读者的购买行为。封面作为报刊自身的广告，因值得一看或具有收藏价值等原因促使读者产生购买意愿，进而产生购买行为，购买自然而然指向被消费对象。然而，“消费”微信新闻的方式是点击。不同于购买行为，点击行为脱离了被点击对象本身，是一种没有明确指向的中介行为。吴红涛认为日常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被分解为手部触控的多元化指令[34]，这就是我们使用数字媒介的常态，尽管目的是阅读新闻、打游戏、看电影、聊天交友，行动却只是点击，通过点击建立起与世间万物的联系。微信新闻封面诱导着用户点击，点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顷刻间的决断，其映射着数字媒介的新媒体语法。

（二）诱导逻辑：微信新闻封面的点击姿态

在大众媒介时代，衡量媒体影响力重要的量化指标是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而在数字媒介时代，点击量成为新闻机构十分重视的新闻评价标准。“点击”已成为新闻消费中最基本的交互行为，它不仅是用户获取信息的入口，更是新闻分发算法、商业模式和受众注意力的关键指标。与报纸头版和杂志封面不同，微信推送封面不仅承担着信息概览的功能，更本质的特征在于可点击的虚拟导航界面。整个封面区域构成一个完整的超文本链接，用户必须通过点击这一身体姿态才能实现从表层封面到正文内容的跳转，将传统阅读中对文本和图片的“视觉－解码”过程转化为数字环境下的点击操作。2025 年 1 月，微信公众号信息流页面悄然新推出“快讯”功能，更让新闻极大程度被集纳到“点击”背后。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指出，计算机已使图像变成一种“用来点击而非观看的图像”[35]，这一论断精准预示了微信新闻推送封面的本质特征。封面图像的首要功能不再是视觉审美或意义传达，而是作为触发跳转的交互元件。用户的手指点击成为连接封面与正文信息的唯一通道，这种操作逻辑使“点击”成为微信新闻阅读中首要的身体姿态。有学者富于创见地阐释了“按”与“刷”这两种主导性媒介手势的历史转换[36]，后者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实践更得以在“现－场”这类屏幕时空经验中得以证成[37]。但均质化的点击恰恰是“机械式贯穿”按压与“流动式停留”刷屏之间的中间姿态，它是使上述历史型构得以发生的语法基础，将打字机与键盘下的线性文本转码为均质化的点击对象，又为平层化的流动数字视听内容创造了差异化的接入口，这也是为什么数字封面成为衔接表里的重要环节。

微信新闻推送封面虽然以“封面”为名，实则与传统刊物封面截然不同。当读者拿起一本书或杂志，封面与内页在物理意义上是连续的，读者通过“封面－扉页－目录－正文”的逻辑逐序阅读，或者自主选择跳读其他内容。微信推文封面不再具有空间翻页的实体形态，完全依赖于电子屏幕的像素呈现，所谓封面并不是对可翻开的实体封面的模拟，而是一种对“覆盖”的高明隐喻，包含账号标识、图片和新闻标题的第一级界面就像覆盖在展示推文完整内容的第二级界面上，就技术特征而言，整个封面区域都是超链接，推文封面与正文内容的关系不再是物理空间的连续性连接，而是通过超链接技术建立的虚拟关联。

读者会对报纸头版和杂志封面投以持续的注视，来解码封面所承载的大量信息和丰富的象征意涵。读者将目光驻留于封面，试图把握编辑的意图、图像的意义以及文本导向的主题。在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数字媒介界面中，“凝视”这一传统阅读姿态被彻底重构。尽管有时候推文封面也承载大量的视觉元素，但其无意于向用户传达该媒体的独特个性，用户也并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对推文封面进行意义解读，在扫视完推文封面后，用户只需要做出决断：点击抑或划走。在朋友圈或订阅号信息流的瀑布式布局中，用户对封面的接触时间通常极短，报刊封面的艺术设计在微信新闻推送封面上几

乎毫无用武之地。无论哪家媒体，其新闻都被推送为同一样式的新闻封面，除使用媒体标识的公众号头像外，账号名称、标题的字体字号都保持一致，推文的媒体归属被弱化，封面图片则成为刺激用户点击的关键。

与传统纸质媒体相比，移动端推文卡片流界面的空间约束与时间压力更大，数字界面无限滚动的特性创造了持续的时间流，每个封面卡片当前的位置很有可能立刻被取代。用户不再对封面进行深度视觉解析，而是执行快速的识别。在印刷时代，阅读被视为一种以解码为核心的认知活动，“书写者编制的丝线，将被接收者拾起，并将接收者自身编织进去”[38]，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解码过程中得以显现。于微信新闻而言，阅读越来越表现为一系列操作行为的组合——点击、滑动、缩放等手势动作构成了新媒体语法。微信新闻推送封面作为一种“视觉按钮”，其价值不在于被欣赏或解读，本质上就是图形化的超链接，用户的点击行为本身成为对封面价值的投票。当图像成为微信新闻推送的封面时，图像的意涵一定程度上被取消了，封面不再是被解读的“文本”，而进化为触发行为的“开关”。

订阅号消息界面和公众号会话界面的封面卡片排列与传统报纸版面也截然不同。传统报刊的版面设计建立在明确的空间坐标系之上，即便在数字时代版面布局也出现了多种类型，如所谓流体布局、瞬时布局等，但报纸头版编辑逻辑始终延续着某种“空间语法”，以对稿件进行模块化分区构建信息层级[39]。同一版面内亦存在明显不同的价值区位，编排上同时存在“左右空间”“上下空间”“中间和边缘空间”等，尤其是被置于日报版面特定位置的内容，也肩负着特定的使命[40]。多条微信新闻的同步推送会形成一个卡片式图像，除头条外，其余消息的呈现方式和位置占比没有区别，并不能简单通过次条的先后位置判断其重要性程度。新闻组间的重要性程度也难以判定，每个新闻组都具有相同的结构和位置占比。在传统报纸中，头版偶尔还会出现双头条的情况，但微信新闻每次推送都会制造一个所谓“头条”，即便这一“头条”并非当天最重要的新闻，更遑论公众号消息列表中封面皆以尺寸均等的正方小图显现的已推送内容，委实难分伯仲。

在单个公众号内，推文封面的排列遵循发布时间由近及远原则，偶尔会在消息列表中置顶作者精选内容，恰如报刊透过版面和栏目所传达的考量一般，但多个公号推文放到手机界面上时，垂直排列的封面便形成了持续滚动的卡片流。报纸版面所指向的特定时段社会图景被微信封面的超线性叙事取代，借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话，这些推文卡片就是流动的马赛克。传统报刊的空间布局为读者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认知地图，使其能够快速定位重要内容，报刊也通过空间差异构建的等级秩序引导公众议程；微信新闻推送封面的垂直卷轴结构极度强化了时间维度，空间差异性却系统性消解，时间序列则迫使读者采用连续的线性处理模式，必须通过持续滑动来探索信息流，信息以均质化的时间切片形式持续流动，受众界面的实时流动打破了传者赋予内容的空间特权。

三、封面的意义：从“深度”到“表面”

前文透过大众媒介新闻与微信新闻在表里关系上的比较，尝试说明了“凝视”这一传统阅读姿态何以被颠覆，这里不妨借用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凝想”概念进一步诠释技术图像时代的微信封面运作。弗卢塞尔提醒当前视觉研究要从按压按键的手势转移到凝想者的意识，凝想者无法像打字者监督打字机那样监督他的装置，相反，他身处其中，与装置融为一体[41]。凝视之所以相对传统，是因为其重点是对字里行间或图像背后意义的解读，凝想则是另一种意识层次——一种基于视觉的、表面的、终端的思维方式。凝视最终指向抽象化，凝想则是要提取具象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接下来重在探究微信新闻封面怎样具体表意、封面的形与意又如何被用户接收。

刊登在封面上的新闻图片往往具有代表性，这是一种对整体内容的提喻，摄影师通过专业手法将新闻现场转化为具有深层含义的视觉符

号，优秀的新闻图片往往包含丰富的内涵，能够传递文字难以表达的信息。然而，微信推送封面图片与大众媒介新闻图片有着本质区别。它不再承担信息传递或辅助说明的功能，而是演变为一种视觉引导机制，其本质是文本概念的视觉化呈现，提示读者点击进入正文可能会看见类似的想象，而非对新闻事实的直接反映。

（一）递进逻辑：大众媒介封面的语义修辞

新闻图片不仅承担着记录事实的功能，更通过提喻和隐喻等修辞手法，在有限的画面内传递更多的信息与更深层的情感。提喻强调“以局部代整体”，刊登在报纸头版上的新闻图片通过捕捉新闻事件中的关键细节或典型瞬间，代表了整个新闻事件全貌，而杂志封面以最精彩亮眼的图像来代表整期杂志的主题。隐喻则更进一步，通过调配各种视觉元素符号，赋予图片超越具体视觉元素的情感意义甚至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目击真实”都是被崇尚的证明事实的办法[42]。图片尤其是摄影照片因其直观具象的呈现，被认为是对现实快速、真实的写照。新闻摄影图片既可以独立使用在新闻报道中独当一面，也可以与文字相配合辅助说明新闻事实。此外，其他新闻图片也都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对新闻事实的说明和解释作用。新闻图表往往呈现某事物或信息数据的动态发展趋势，有助于解释说明动态变化的新闻事实[43]。在疫情报道中，新闻信息图的使用就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尤其是各类“疫情地图”备受关注[44]。新闻示意图过滤事件的次要信息和冗余信息，只留下最重要的环节，往往以流程图和模拟图呈现，说明新闻事实的逻辑关系，为情节复杂的报道设计关系图并辅以一定文字说明，而一些未能拍摄到现场的新闻事件，通过现场模拟图能够帮助读者理解新闻事件。

通常而言，新闻图片不仅呈现新闻事件现场的各种视觉要素，更通过具体符号来传达抽象的深层含义，展示新闻图片中的特有的情感、意义、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等因素。新闻图片中的主体、陪体、背景、空白、线条、色彩、角度、景深等要素，都有着自身特有的符号意义，共同建构着该新闻图片的意义指向。最典型的莫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巴黎竞赛报》封面图像的神话分析，他指出神话当中有两种符号学系统，一种是语言系统，即抽象的整体语言；另一种系统就是神话本身，即“释言之言”，这种次生语言用以谈论、解释初生语言，通过意指作用造就神话[45]。弗卢塞尔说得更直接，大众媒介图像就是一种“欺骗”，我们错误理解了符号的意义，才会竭力去解读图像背后生产者的意图和意义，但了解其欺骗性才是更为根本的[46]。微信这样的技术图像装置令这一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二）并行逻辑：微信新闻封面的意义提示

微信新闻推送封面图虽然作为新闻的一部分，却不证实或解释新闻事实，封面图内的视觉元素甚至可以完全与文章所述新闻事件或主体无关。推送封面是将文章的某种概念进行视觉化处理的结果，追求的不是意义阐释或象征意涵，而是瞬间的视觉刺激。微信新闻推送封面作为一种典型的技术图像，其运作机制并非反映现实和描绘外在世界，而是将文本视觉化，将概念划分为不同判断的规则慢慢消逝，概念失去连贯性，“书写的主体则会分解为一堆碎片与字节、决定性的瞬间和行为的分子”[47]，要重新把握这个抽象的宇宙，就必须努力使宇宙和意识具象化，只有通过照片、电影、电视、视频图像，尤其是未来的计算机合成图像，我们才能回到具体的经验、认识、价值和行动中去，远离这一切已荡然无存的抽象世界[48]。微信新闻推送封面就是一种将难以理解的概念、认知、文本还原到具体的行动中去的图像。

微信新闻封面有一种典型，即彩底大字，被各大专业媒体微信号广泛使用。这类封面虽以文字为主，却非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其残留了一定的文本性，文本仍遵循线性阅读方式，但串联文本的逻辑规则却被破坏，仅抽离出“要闻”“快讯”“通报”“最新”等概念，对其进行低阶视觉化处理。文字封面寄生在文本之上，却按图像规则运作，文字被设计为特殊字体、放大加粗脱离标题和内容文本，赋予颜色和背景，按照视觉

元素的构图居中排版，使用高对比色突出反差以刺激眼球。文字的功能不再是被阅读，而是被观看、被点击——文字封面追求的不是语言意义，而是整体作为图像被消费。“要闻”的文字封面无需由读者读解出重大时政新闻的意义，它仅仅是“要闻”二字作为文本概念视觉化的图像。

微信新闻推送的封面图不再承担传统新闻摄影忠实记录的使命，也不再执着于完整呈现事件的真相。封面图像作为一种意义的“提示”，并没有表达文章作者想要传达的意义，也无意于告知读者关于事发现场具体的事实信息，而是一种预期的方向。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冗长的文字说明和复杂的现场照片反而可能成为阅读的阻碍，于是封面图像便承担起了“视觉路标”的重任，用最精简的图像为读者提示可能的想象空间。这种图像文化改变了我们消费新闻的方式，当我们滑动手机屏幕时，并不期待从封面图中获取完整的事实信息，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视觉邀请。它的作用不是概括全文内容，而是唤起读者足够的欲望去点击。并且与传统宣传画不同，封面提示的运作逻辑完全是个人化的，它不试图动员群体，也不像政治标语那样带有明确的指向性，每一张封面图都在与每个用户进行着沉默的对话。这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更进一步演化成为某种“提示素养”[49]。

在视觉优先的传播环境中，纯文字推送越来越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异类。微信公众号允许推送纯文本内容，但必须为该文章设置一张封面，即使作者（或编辑）认为文章本身无须配图，但整个平台的视觉设计、用户的浏览习惯都在无声地引导着内容创作者选择配图。这不仅仅是审美上的偏好，更是一种认知方式的转变——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图像来初步判断信息的价值，那些拒绝这种视觉游戏的内容，很可能在信息洪流中被轻易淹没。于是，每一篇推文都不得不寻找一个提示意义的图像，不为传达事实真相，而是为了赢得一次被点击的机会。

随着图像制作技术的发展，人们往往认为图像尺寸越大清晰度越高越好，小图、低像素图似乎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然而，微信公众号推文封面始终要求设置一个正方形缩略小图在次条消息和转发推文时呈现，高压缩率、弱化构图是封面小图的主要特征。当图像被缩小至手机屏幕上的方寸之地时，复杂的细节和微妙的层次都会消失殆尽，甚至有些图像中主要人物的身体都因图片被裁剪而残缺，由于图片呈现时的实际尺寸太小，甚至无法清晰分辨出图像中的视觉元素，仅能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微信封面小图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传达多少事实信息，而是通过简洁、模糊但易于识别的图像指示了文章内容可能涉及的意义，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伊尼斯（Harold Innis）的媒介理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要领不是要把媒介特性泾渭分离，而是突出介质在时空倾向光谱中动态平衡的重要性[50]。本文所描绘的大众媒介封面逻辑与微信新闻封面逻辑也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存在交融与互渗，如光谱般逻辑演变。相较而言，报刊新闻封面更侧重提炼逻辑和递进逻辑，其塑造着大众媒介的线性深度与意义协商，微信新闻封面更侧重于诱导逻辑与并行逻辑，其影响着数字媒介的具象表面和视觉先行。如弗卢塞尔所言，这是不同的意识维度，前者偏向多层的意义包装，后者偏向多面的意义分装，在今天的实践情境中，前者可能被批评为缺乏“网感”，后者可能被批评为缺乏“纵深”。连通二者运转逻辑的动态平衡，仍是数字时代内容生产的必备演练。

四、作为编程的封面：数字文化技术的浮现

弗卢塞尔在《书写还有未来吗》中提出了一种除言语和书写之外赋予意义的姿态——编程。其表现形式是由装置生成的种种技术图像，人们用指尖敲击装置的按键生产如马赛克般的粒子组合，这种手势被称为“考量与计算”。装置的运转程序是“一种各种情况可能会随即发生的游戏，一种被编排的偶然事件”[51]，技术图像就生成于这种对可能性的计算中。我们不妨把微信新闻推送封面视作这样一种经由编程产生的技术图像，既非生产者赋予的表意规则，也不是

在编程软件中输入具体的代码指令。编程意味着在微信新闻生产中存在着一个可视化的过程，经由微信公众平台的设定，编辑将关于文本的感知展示为具象的封面，这种编程的典型特征是在具象化过程中伴随着黑箱化。

报纸杂志的封面生产往往需要经过层层审核，而微信新闻推送封面则常常逾越编审机制之外。微信新闻并不专属机构媒体，还有个人化的“市民新闻”和UGC写作，一些依托“互联网企业母体、附属高校科研机构、靠公益基金支持”的内容团队也是重要的微信新闻主体，它们被称作“线上新闻作坊”[52]。这些传统建制外的新闻实践，并不一定能遵循编审流程，有的甚至没有编审机制，封面往往由发布者自行决定。即使在专业媒体机构的新闻编辑室，仍存在机制外的溢出行为，很多时候“小编”也可以独立完成微信公众号推文推送[53]。小编会选取其他公号的内容，进行稿件汇编，甚至修改封面直接转载，这些“拼贴”推文难以纳入编审的论述网络。事实上，早有研究深描过，滔天舆情的背后可能恰恰就是微信编辑的临时判断，即便在重重把关的制度之下仍无可规避这种个体偶然[54]。就此而言，图像的生产在实操中变得难以追溯、无须说明，封面图像的呈现基于一种小编与网络图像资料库互动可能性的计算。

摄影图片的原始文件往往包含完整的EXIF参数，但经编辑上传微信公众平台成为封面后，这些验证性元数据被系统清除。无论是否经过剪裁、数字合成等编辑，该图片已经完全脱离了原始图片的生成环境，变成一张改装图片，分析这张改装图片，或可知晓图片的哪些部分经过数字合成，却不能追溯照片最初始的模样和生成环境。微信封面的原始素材在被编辑发现之前，可能已经在网络空间中经历了数次“包浆”[55]。应该说，封面的原始素材来源是模糊的、去中心化的。数字封面的处理是非标准化的、不可复制的，小编既可以保持系统给出的默认裁剪方案，也可以手动拖拽裁剪，编辑过程充满了主观性和偶然性，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决策，不是系统性逻辑思考或反复斟酌的精度把控，往往是下意识的拖拽等操作。

微信新闻推送封面的编程挑战了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关于媒介历史的划分。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编程，一种是对“日常语言的编码”，将可感知的观点转译成话语，另一种是“按照现代数学编码公式而运作”的物理程序，技术媒介将信息转换成技术信号[56]。大众媒介内容生产与霍尔（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概念具有相通之处，通过一定规则将原初事件和信息组织成为具有丰富意义的文本或图像。技术媒介的编程是一系列向计算机发送的指令，以此“细致入微的细节去解释”计算机应如何执行这项任务[57]。若将微信新闻推送封面视作编程，它则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日常生活语言的形象化，但微信封面的可视化策略与文本的写作策略、电视的编排策略、照片的拍摄策略不同，它并不遵从隐喻的逻辑，而是类似于转喻，封面是表层的、具体的、随意的、局部的、亲切的、肤浅的，它的作用仅仅在于给用户一个自然的印象。同时，这种看似自然的呈现实际上遮蔽了封面背后软件程序的运作。正如弗卢塞尔所提醒的，真正拥有权力的不是拥有或使用这些图像的人，而是信息的编程者，这是一种新帝国主义[58]。

微信新闻的编程既不是语言学家和文化研究领域中组织意义表达的文化媒介，也并非完全按照现代数学编码公式而运作的技术媒介，而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文化技术，旨在可视化和具象化。这与已有研究中对数字新闻生产的“视觉手段”或其“文化逻辑”的探讨有所不同，这里的可视与具象不是字面指涉的感官效果[59]，而是技术运转的目的与意识维度。前文论及的点击姿态、凝想意识、流动排布、意义提示等均是这种数字文化技术外显的物质性条件。进言之，继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电影－哲学和卡波内（Mauro Carbone）的屏幕－哲学之后，我们有必要尝试勾勒一种封面－哲学，因为“荧屏”仍无法观照到更普遍的随身移动的媒介界面，封面既呼应了超电影、后电影、后电视、总体

屏幕等理论化情境，又有着更切近日常生活实践的阐发空间。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认为媒介基本的、首要的能力不是表征，而是呈现，从而使某些东西能被看到[60]。微信新闻的编程就是将编辑对于封面的凝想具体化为图像的过程，这种文化技术再次遮蔽了以绘画、图表为代表的使不可见之物转变为可见可感对象的透明与控制。基特勒将用户界面视作计算机软件的欺骗，其目的在于“阻止人类继续做人类”[61]。他呼吁人类学习基本的编程语言与计算机内部已化为信号的事物进行互动。不论该建议是否现实，这种新的文化技术赋予了人类空前能力，我们只需要专注于被生产的表面，就可以创造前所未有的图像。由装置书写和制作的历史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口头和字面意义的历史[62]。我们在用微信书写的同时，也是在为微信书写，以微信新闻封面为代表的数字封面不啻制造了“诱导消费”“形意并行”等媒介逻辑下的全新感知[63]。微信新闻封面的编程亦展示出了另一种意识维度——基于平层表面的“终端感知”[64]，它超脱了组织文字代码的规则，而意在造就“表面”的媒介基础设施。

（责任编辑：徐秋染）

参考文献

[1] 谢静 . 微信新闻 : 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23(4):10-28+126.

[2] Xu V W. WeChat and the Sharing of News in Networked China[J]. *Digital Journalism*, 2022, 10(9): 1441–1463.

[3] Peng Z, Miller S. An Examination of How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Perceptions Predict Social Media News Use on WeChat[J]. *Journalism Practice*, 2021, 17(3): 554–573.

[4] Guo L, Zhang Y. Information Flow Within and Across Online Media Platforms: An Agenda-Setting Analysis of Rumor Diffusion on News Websites, Weibo, and WeChat in China[J]. *Journalism Studies*, 2020, 21(15): 2176–2195.

[5] Zeng W X. Reconstructing news values of the frenemy through journalistic translation on WeChat[D].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6] Wu Y, Wall M. Prosumers in a digital multiverse: An investigation of how WeChat is affecting Chinese citizen journalism[J]. *Global Media and China*, 2019, 4(1): 36-51.

[7] 欧文·戈夫曼 . 框架分析 : 经验组织论 [M]. 杨馨 , 姚文苑 , 南塬飞雪 , 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11.

[8] 尹连根 , 王海燕 . 现代性的加速器——微信的传播社会学意义解读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5(6):66-80.

[9] 田浩 . 数字时代用户如何体验新闻？——一项视觉框架处理研究 [J]. 新闻大学 ,2024(7):1-14+117.

[10][13] Altheide D L, Snow R P. *Media logic*[M]. SAGE. 1979:10.

[11][15] Altheide D L. Media Logic[M]//*Mazzoleni G.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Wiley, 2016:1-6.

[12] Altheide D L. The impact of television news formats on social policy[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1991, 35(1):3-21.

[14] Poell T, Van Dijck J.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logic[J].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3(1):2-14.

[16] 增长黑盒 .2024 微信朋友圈用户研究报告 [EB/OL].(2024-10-15)[2025-09-03]. https://mp.weixin.qq.com/s/3-90CjYfrkWDvDh-LRY4pA.

[17] 张路曦 . 我国新闻 App 的现状、困境与进路 [J].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32(1):162-172.

[18] Picone, I. Grasping the digital news user: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news use studies[J]. *Digital Journalism*, 2016, 4(1):125-141.

[19] 常江 . 文化研究作为数字新闻学的方法论思考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4):45-51.

[20] 马克斯·范梅南 . 实践现象学 : 现象学研究与写作中意义给予的方法 [M]. 尹根 , 蒋开君 , 译 . 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8:1-8.

[21] 王正绪 . 厘清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基本差别 [EB/OL].(2024-9-13)[2025-09-03].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09/t20240913_5777429.shtml.

[22] 郭建斌 , 姚静 .“把自己作为方法”——兼谈民族志文本中作者的“主体性”[J]. 南京社会科学 ,2021(1):109-116.

[23] 项飙 , 吴琦 . 把自己作为方法 [M].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217.

[24] 罗杰·F. 库克 . 后电影视觉 : 运动影像媒介与观众的共同进化 [M]. 韩晓强 , 译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66.

[25] 吉尔·利波维茨基 , 让·塞鲁瓦 . 总体屏幕 : 从电影到智能手机 [M]. 李宁玥 , 译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8.

[26]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 如何观看世界 [M]. 徐达艳 , 译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49-50.

[27] 甘险峰 . 当代报纸编辑学 (第 2 版)[M].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284.

[28] 李静 . 杂志编辑实务教程 [M].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4:253.

[29] 任悦 , 曾璜 . 图片编辑手册 [M]. 北京 :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5:227.

[30] Behshad A, Ghaniabadi S. Visual analysis of magazine cov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015, 7(5): 20-32.

[31] 喻国明 , 汤雪梅 , 苏林森 , 等 . 读者阅读中文报纸版面的视觉轨迹及其规律——一项基于眼动仪的实验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07(8):5-19.

[32] 王灿发 , 方汉奇 . 报刊编辑 (第 2 版)[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205.

[33] Rossol E, Kendra L. Hashtag Vogue: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al Vogue Instagram accounts[J]. *Fashion, Style & Popular Culture*, 2020,7(2-3): 259-279.
[34] 吴红涛 .“手时代”:技术、微机器与手指狂欢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0,41(1):48-55.
[35] Elsaesser T. *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M]. Amsterdam, AM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5.
[36] 孙藜 . 数字之“手”:现代社会手势演化的媒介学语法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2):1-12.
[37] 张丽华 , 骆世查 . 刷礼物 : 网络直播的交互屏幕与身体实践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3,76(4):71-81.
[38][62] 威廉·弗卢塞尔 . 书写还有未来吗 [M]. 朱恬骅 , 译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2024:42;25.
[39] Waller R. Graphic Literacies for a Digital Age: The Survival of Layout[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12, 28 (4): 236–252.
[40] Reisner A E. The news conference: How daily newspaper editors construct the front page[J]. *Journalism Quarterly*, 1992, 69(4): 971-986.
[41][47][48][51] 威廉・弗卢塞尔 . 技术图像的宇宙 [M]. 李一君 , 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24;4;25;12.
[42] 王敏 .“目击”即真实? ——一项关于新闻“真实性”的实践策略考察 [J]. 国际新闻界 ,2020,42(11):119-135.
[43] Paul N, Nisbett G. The numbers game: How local newspapers used statistics and data visualizations to cov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J].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2021, 33(3): 297-313.
[44] Rezk A A, Hendawy M. Informative cartographic communication: A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map types on users’ interpretation of COVID-19 geovisualizations[J].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2023, 51(2): 257-274.
[45] 罗兰・巴特 . 神话修辞术 : 批评与真实 [M]. 屠友祥 , 温晋仪 , 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176.
[46] 威廉・弗卢塞尔 . 传播学 : 历史、理论与哲学 [M]. 周海宁 , 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119.
[49] Hwang Y, Lee J H, Shin D. What is prompt literacy?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language learners’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cy skill using generative AI [Z]. arXiv, 2023(2023).
[50] 哈罗德·伊尼斯 . 传播的偏向 (第 3 版)[M]. 何道宽 , 译 . 北京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2021:40.
[52] 李东晓 . 界外之地 : 线上新闻“作坊”的职业社会学分析 [J]. 新闻记者 ,2019,(4):15-27.
[53] 张寅 .“小编”与记者的“脸面观”: 媒体微信公众号新闻生产中的人际关系向度 [J]. 新闻记者 ,2020(11):13-25.
[54] 陆晔 , 周睿鸣 .“液态”的新闻业 : 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23(7):24-46+126-127.
[55] 章戈浩 , 章倩砺 . 电子包浆 : 时间性痕迹或尺度式差异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72-80+170-171.
[56]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 黄淑贞 . 传播媒介史绪论 [J]. 文化研究 ,2013(1):235-254.
[57] 杰米・萨斯坎德 . 算法的力量 : 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M]. 李大白 , 译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8.
[58] 威廉・弗卢塞尔 . 摄影哲学的思考 [M]. 毛卫东 , 丁君君 , 译 . 北京 :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7:45.
[59] 王晓培 . 数字新闻生产的视觉化 : 技术变迁与文化逻辑 [J]. 新闻界 ,2022(2):12-20.
[60] 西皮尔・克莱默尔 , 吴余劲 , 叶倩 , 等 . 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 : 从书写平面到数字接口 [J]. 全球传媒学刊 ,2019,6(1):18-27.
[61] 杰弗里·温斯洛普-杨 . 基特勒论媒介 [M]. 张昱辰 , 译 .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19:90.
[63] 唐士哲 . 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 : 基德勒的媒介理论初探 [J]. 传播研究与实践 ,2017(7):5-32.
[64] 陈嘉映 . 穷于为薪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23:147-161.

The Format of Digital Journalism: A Phenomenology of Practice from Cover Logics

Luo Shicha, Chen Yuan

Abstract: AI text-to-image and text-to-video technologies have stimulated a new wave of reflection on the visual turn, yet few have noted that any visualized text first reaches audiences precisely as a cover image. Covers are not only essential for making content in the digital age but also signal 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cultural technology aligned with the trend toward gen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conducts a pragmatic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centered on WeChat News’ delivery covers to offer a more nuanced interpretation of WeChat News’ distinctive format and practical context. Moreover, by comparing with mass media covers, this paper intends to unpack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covers, thereby providing insights into the specific media logic of digital news practices. The study, being grounded in a measured amount of reflexive practice material, deliberately draws upon 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thinkers like Flusser and Kittler on the generational shifts in media technology to point out that WeChat news covers operate according to an “inductive logic” and establish meanings through a

(下转第 58 页)

从共生到进化：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人类文化的非对称演化机理 1）

战迪　方杰云

摘要　人工智能时代，媒介景观的革新持续突破人类感官界限与叙事想象边界，推动数字生态向深度智能化演进。本文基于技术哲学、媒介环境学与进化生物学的跨学科视角，系统探讨了技术文化关系从“共生”向“进化”的理论演化路径。研究表明，技术自主系统与人类认知需求形成了既受限于生物适配边界，又根植于技术物质基础的递归互构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内容自主生成和分发机制构建了新的文化模因生产逻辑：技术的模块化重组增强自我效能；神经介入撼动人类感知的生物学基础；算法霸权通过数据捕获和行为建模驱动文化进化线路。三重进化动力均深植于人类价值体系的隐性规训与显性治理。当代文明与技术系统在非对称的演化机理中相互博弈与权衡，人类认知革命正加速深描“后人类”图景。

关键词　人工智能；技术自主性；技术文化共生论；技术文化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战迪，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全球传播研究院研究员，广东深圳 518060；方杰云，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深圳 518060

引言

2024 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称为“AI 教父”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教授近期在一档播客节目中以 GPT 为例提出警告：“人工智能将带来两大风险，第一是人类对技术的滥用；第二是人工智能变得如此智能，以至于它不再需要人类。”[1]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正深刻塑造当代文化生态，其影响延续并深化了技术与文化在媒介演化路径中形成的互动机制。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与制度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依存形态。在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的理论谱系中，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与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构成理解技术文化关系的两大核心范式，前者强调技术的宰制性与主导性，“技术的自我增强决定了技术进步是不可逆的，且其速度呈现几何级数增长”[2]。相关学者将技术视为超越人类控制的“元主体”，笃信技术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与此相对，后者则主张技术是社会协商的产物，其形态与意义深植于

1）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5 年度项目“数字媒体生态下中国网络视听文化发展史研究”（GD25CYS19）。

具体的历史情境与文化价值网络。“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框架指出：“技术人工物（technological artifacts）是文化建构和解释的。”[3] 这一视角将技术视为文化实践的具象化载体，其发展受制于权力博弈、意识形态与制度约束。此后的研究表明，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导致了其在解释技术文化动态关系方面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技术－文化共生论作为一种调和性理论应运而生，逐渐成为理解和分析数字媒体生态的重要理论框架和逻辑起点。

然而，随着近年来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迅猛发展，传统文化生态已被悄然打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4 年 7 月，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已超过 190 个，服务用户规模突破 2.3 亿。技术渗透率较以往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裂变式技术扩散正在催生文化生产领域的范式革命。“多智能体系统，驱动关系重组，变革现实的结构与形态，势必引发社会由外而内的适应性变迁，进而推动整个文明的进化。”[4] 智能技术的集群效应正在形成多智能体协同演化的社会动力系统，算法透明度与价值对齐成为文明演进的关键参数。

有鉴于此，本文立足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当代数字文化生态中的深刻影响，将其引发的媒介形态、认知结构与文化秩序的剧烈变动作为研究切入点，着重探讨以下核心问题：（1）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通过内容自主生成与算法分发机制，改变文化符号的生产逻辑与传播路径？（2）技术系统在突破传统人机共生模式后，是否已具备推动文化认知结构独立演化的能力？（3）面对生成式 AI 在叙事、感知及记忆机制中的深度介入，人类应如何理解技术介导下文化意义建构的变迁，并重估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交互边界？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本文旨在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文化转型和人类自我认知演化中的关键作用，并为技术与文化的协同关系提供新的启发。

一、共生关系的理论内涵与范式困境

在媒介环境学的理论谱系中，技术与文化关系的阐释经历了多维度的发展。最初，媒介技术的发展路径往往受到特定文化需求和社会结构的驱动与规训。随着媒介的更迭与复杂化，技术系统逐步展现出反向建构文化的能力，不仅反映文化动荡，也反过来成为激发文化变迁的关键变量。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技术作为人类感官的延伸，在建构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是推动文明跃迁与认知变革的关键因素。但不同于技术决定论将技术视为绝对主导力量，麦克卢汉亦强调人类对媒介具有调节与反馈能力，指出“人们也在不断寻找新方式修改自己的技术”[5]。而其学生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则在媒介技术论述中引入意识形态维度，借助“技术垄断”概念批判技术对文化的深层嵌入与控制倾向，为理解技术的文化编码机制提供了更具批判性的理论视角。

波兹曼的学生林文刚，在整合媒介环境学与系统论思想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技术－文化共生论”这一具有范式突破意义的理论框架。“共生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植物学家海因里希·安东·德·巴里（Heinrich Anton de Bary）于 1879 年提出。共生（symbiosis），在生物学中指不同种的生物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互利共生关系。德·巴里将共生视为“对异名生物共同生活现象的考察”[11]。林文刚借“共生论”对麦克卢汉等学者的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将媒介环境学的核心命题提炼为“人类文化是人与技术或媒介不间断的、互相依存的因而互相影响的互动关系”[6]。该理论打破了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二元对立，将技术自主性界定为一种在文化实践博弈中逐渐涌现的结构属性。技术系统既作为“文化器官”参与意义生产，又在文化实践的规训下持续进化，由此形成动态平衡的生态共生关系。

这一共生机制与人工智能专家约瑟夫·卡尔·罗伯内特·利克莱德（Joseph Carl Robnett Licklider）提出的“人－机共生”模型理论高度

契合，人类与计算机通过功能互补实现持续反馈协同，为技术－文化共生思路提供了重要的认知基础[7]。在技术哲学的历史谱系中，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中提出的“技术体系”思想，为技术－文化共生论奠定了基调：“我们的机械体系正走向内部平衡，开放时代的特征是动态平衡，而不是无限的发展。”[8]他揭示技术进化的“双刃剑”特质，深刻预见技术自主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张力，技术既是文明进步的引擎，也是权力失衡与认知异化的潜在推手。这一洞见被后来学者发展为三大理论命题：技术进化的动力源于经济资本、政治权力与认知结构的多元共谋；技术代价通过复杂系统的黑箱化完成隐匿性转移[9]；技术后果因社会互动的随机性而呈现不可预测的或然特征。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始终“有赖于大量准独立变数之间的推定”[10]，双方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其历史逻辑更类似一种尚在进行中的系统性实验。而在媒介的历史演变中，技术进化与社会赋权促使本土文化要素创新性转化，带来新的文化混融形态。技术与文化的互动是传播、混合的过程，更是抵抗、协商和再平衡的过程，技术平台是提供承载符号的媒介，也直接参与符号意义的生成和演变过程[12]。技术－文化共生论所提倡的动态平衡，可以看作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技术与文化在持续互动中能够维持平衡的一种理想状态。然而在现实的技术文化发展进程中，这种平衡状态面临诸多挑战。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Habermas）在批判工具理性扩张时便警告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沿着批判理论的思路，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继承并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观点，强调技术系统中隐含的权力结构以及技术与文化的相互进化关系。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将技术理解为“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即人类记忆与认知的外在化器官。他指出，人类自旧石器时代起便是“技术性存在”，技术为人类认知提供延续机制，也可能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生成“去身体化”的认知结构。人类认知被技术规训，削弱了主体的批判性与未来投射能力。

在关于技术演化的哲学讨论中，麦克卢汉与斯蒂格勒分别代表了两种具有根本分歧的本体论立场。前者立足于媒介作为人类感官延伸的结构主义视角，强调技术在文化演化中的形态建构作用；后者则从生成论与符号规训的批判路径出发，强调技术在失控状态下对主体性与记忆机制的操控能力，主张以哲学反思介入技术演化进程。本体论差异使得两位学者在理解“技术如何进化人”的路径上展现出不同的重心偏向：麦克卢汉关注技术对认知方式与文化语境的激活与建构，斯蒂格勒则警惕技术的符号规训功能及其对主体性的侵蚀。但它们均承认，技术已成为推动认知进化与文化重组的重要协同因子，并共同指出了现代技术发展的深层悖论：当技术系统的进化速度超越文化系统的适应阈值，技术文化关系中所期待的动态平衡将面临失稳的风险，进而引发对人类文化适应与技术自主边界的根本性反思。

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AI 在其官网正式推出产品 ChatGPT，开创了大语言模型在多领域通用生成中的新范式，以卓越的可用性和跨任务通用性，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进入主流应用阶段[13]。ChatGPT 将生成式 AI 从以往的单一、静态、短文本输出，推进到能够执行多任务、支持动态多轮交互，并具备上下文自适应能力的综合人工智能生成系统。与以往的人工智能相比，ChatGPT 展现出类人推理、深度理解和跨领域归纳等前所未有的综合智能水平，这标志着人工智能整体能力层次的显著跃升[14][15]。更有研究指出，AI 系统通过模块化参数集群的并行优化，使创新路径可能脱离人类语义监督的轨道，并迅速超越人类水准[16]。

当 GPT-4 的参数规模突破 1.8 万亿、扩散模型生成机制实现显著提速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从两个维度体现出递进深化过程。一方面，在系统内部逻辑上，技术表现为结构组合

与功能整合能力的持续提升。技术系统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回应文化实践与制度需求，确保在内部各要素之间实现平衡，通过已有模块的再组合不断生成新的功能单元，从而提升整体性能与效率。“新的技术元素源自既有元素的重组，这些元素本身又成为构建下一代系统的潜在模块。”[17]技术系统在吸收社会输入、压缩操作路径与拓展边界条件的过程中，推动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同步演化，逐步确立其相对自主的结构演进机制。有研究表明，GPT-4 具备的涌现能力，体现了技术规模效应与模块化重组的叠加效应：其能力并非来自逐项编码，而是规模化训练过程中内容自然生成的产物，展现出技术系统自行成长出超越预先设计的智能趋势[18]。另一方面，在系统对外功能上，技术开始深度介入文化生产与认知组织机制。技术系统的指数级扩展与人类文化适应的渐进性之间形成鸿沟，导致算法中介机制对认知环境产生结构性调整。生成式 AI 在分类和回归的基础上，具备了将概率建模与符号生成结合的新能力，可在单模态或跨模态场景中主动合成、创造新的符号化内容[19]。推荐算法通过对数据的捕获与行为建模，改变了信息的呈现顺序与意义流通路径，并对文化生产的主导权产生实质性转移。针对丹麦 2022 年大选的实证研究显示，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已偏离编辑的价值判断，议程设置权存在“被转移”的风险[20]。

由此可见，现有技术 – 文化共生论在揭示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动态依存关系方面，已取得重要理论进展，尤其阐明了技术自主性与文化适应机制在互动中所呈现的平衡性特征。然而，这一理论体系大多基于技术与文化之间长期互惠、相互制约的共生关系假设，缺乏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主动性、突发性技术变革的系统性研究。生成式 AI 的崛起标志着技术系统首次在语言、符号和文化模因层面展现出大规模、自动化生成与改写文化语境的能力，使得技术演化的速度和深度远超文化系统的适应阈值，打破了动态平衡的共生假设。技术 – 文化共生论在应对这一全新技术现象时，面临解释力不足的范式困境。

据此，本文认为，有必要系统探讨从技术 – 文化共生论向技术 – 文化进化论理论演进的可能性，进一步揭示当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在技术自主性驱动下，主动塑造文化认知结构和意义生产路径。同时需要强调，技术 – 文化进化论并非对共生论的替代，而是在其理论基础上进行历史性与动态性的深化和拓展，尝试为理解生成式 AI 对人类文化演化的深层干预提供更加精准的理论工具。

二、智能装置驱动的非对称演化实践

传统以主体理性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正在被技术系统的主动介入所解构。“当代媒介文化体现出离身性的后人类特征，意义和经验的生成与人类身体及其承载的历史感逐渐疏离。”[21]后人类状况逐渐成为技术演化主导下的历史症候。在这一解构过程中，“人工智能以数据为对象确立规则，既复现了客观存在的关系，又以数码的方式泛化了智能系统发现的规则，变革了人类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与影响逻辑”[22]，从而推动人类感知与认知结构异化。鉴于此，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感知交互系统实现装置化整合，形成融合语义生成、感知反馈与交互功能的“智能装置”。作为将技术能力嵌入文化实践的结构单元，它们在文化语境中发挥出强烈的中介性功能，正深刻调试人类的感知经验与认知秩序。

（一）想象进化的智能叙事

叙事作为文化生产与认知建构的核心机制，不仅组织语言、视觉等符号内容，也承载社会经验的历史延续与情感联结。已有研究对大语言模型展现出的意识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接收输入、推理、分析、生成预测以及执行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方面的能力，表明其具备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感知和认知能力。”[23]在基于数十亿人主观输入的训练下，生成式 AI 的语义掌握程度远超单一个体，并能够在交互中模拟第一人称的主体视角。这种类意识能力使智能系统逐步掌握了对文化意义进

行元编码的能力，从文本的语义网络到视觉的时空连续性，生成式 AI 正在将叙事生产从人类独白式模式推进到人机协同的超文化生成阶段。“作为一个智能体，生成式 AI 已然成为叙事活动中的行动者，深度嵌入叙事的全部流程，拓展了叙事的内涵与观念。”[24] 在深度学习框架的支撑下，生成对抗网络（GANs）与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等核心生成模型技术不断迭代演进，使机器主体的符号生成能力持续拓展，日益深入地介入人类的文化认知结构，对意义建构与叙事秩序产生系统性影响。

以 ChatGPT 系列为例，其参数规模自 GPT-3 起，至今已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并表现出超越线性规模效应的智能跃升，这标志着其在文化叙事中所占主导份额的显著提升。当它能够以莎士比亚风格创作十四行诗，或以康德口吻论述道德哲学时，此类输出并非对既定文化的机械复制，而是通过参数空间的梯度优化实现的风格涌现。与 ChatGPT 在语言维度的突破形成呼应，Stable Diffusion 在视觉文化生产领域实现了更深层的范式颠覆。生成模型通过潜空间（latent space）向量的概率采样与插值，使得传统艺术创作中历时性积累的风格系统，可以被解耦为可微分优化的高维向量。梵高的笔触、浮世绘的构图与赛博朋克的视觉元素均转化成参数化调制的概率轨迹，其组合可能性远超人类艺术家的经验边界。机器在解构人类叙事范式的同时，创造出既非纯粹人工亦非完全自然的“杂交文化形态”。这种形态的颠覆性在于，其意义生成逻辑脱离了作者意图的线性约束，转而遵循数据分布与损失函数的非线性博弈。

智能体的多模态扩展加剧了叙事权力的转移。认知科学研究早已证实，图文信息同步显著增强学习迁移与信息处理效率[25]。佩维奥的“双重编码理论”指出，人类对图文耦合的处理具有天然优势 ——“言语系统与非言语系统之间的协作性通过神经表征功能相互激活。根据任务需求的变化，人类能够在两套系统之间灵活切换，以适应不同的认知情境”[26]。这一优势在智能系统中被系统性地利用并放大。多模态模型通过高频次、同步化的信息推送机制，持续提升用户的感官输入密度，强化人类对多通道内容的处理需求，促使感知系统在神经层面发生适应性调整，朝向更高效的多模态协同加工机制演化。从最初的文本生成与理解，逐步拓展至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数据的协同生成与整合，该能力的发展使机器更有效地感知并响应人类的意图与情感。在此基础上，智能系统逐步具备从模仿、仿真到拟象的叙事能力，能够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进行情境化计算，为其赋予新的历史与文化参照，实现更自然、高效的人机交互过程。

2024 年 4 月，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HAI）发布的《2024 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基于 Transformer 的多模态大模型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分析与音频理解等任务中的跨模态融合与生成能力显著提升。其中，以 Segment Anything、HEIM 等为代表的图像任务模型，进一步优化了机器对视觉数据的分割、理解与生成能力，为多模态系统的视觉处理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大量实验证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阅读理解和视觉推理等任务中已在多个指标上超越人类，并具备了在无明确模板条件下构建动态叙事路径的能力。叙事生产正逐步从基于静态表征的结构模仿，转向以模型内生规则为基础的情境生成机制。智能技术通过物理引擎、世界建模等系统动态推演事物间的因果与时序逻辑，自主探索情节演化的可能性空间。

2024 年 12 月，OpenAI 向公众正式开放视频生成模型 Sora，它融合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 Transformer 架构与扩散式图像建模机制，并在训练中引入“重新标注”技术，以提升语言文本到视频内容的语义一致性与物理合理性。Sora 能够通过自注意力机制精准识别文本中的时序与空间线索，并借助扩散过程再造视觉场景，生成具有叙事结构与现实仿真度的视频内容。在此进程中，生成逻辑从以人为核心的意图设计逐渐转向以模型参数空间为基础的概率推演，人类创作者的角色也由构思者转变为生成参数

的设定者。以生成式 AI 为核心的智能装置转化为推动人类叙事机制演化的外部进化因子，标志着媒介形态从“补偿性设计”迈向“以技术主导的人机进化”范式的跃迁。

（二）虚实耦合的感官联觉

社会信息从单一的视觉模式向多模态、多感官、多渠道并存的复杂形态转变。藉由多种媒介和符号系统（如视觉、听觉、触觉等）以感官联觉的方式进行多模态信息处理，已然成为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重要发展方向。联觉以异常的感觉知觉为特征，是指由一种感觉诱发另一种感觉的心理现象。“所有关于联觉的论述都基于一系列核心事实：一小部分人在阅读、听音乐、进食等日常活动中会对颜色、味道、形状等产生非同寻常的感觉。”[27]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支持下，联觉的神经表征被算法建模捕捉，使其不再仅限于个体神经差异，而成为可通过技术规模化生成的感官交互模式。“联觉式生产在不同感官之间，以及感官与情感之间，建立了一个转换性的中介空间，通过将神经结构映射到技术结构，放大、拓展了人的感官和情感体验。”[28]在感官联觉的过程中，技术通过与文化的深度交互，成为推动人类感知结构演化的核心动力来源。从认识论层面看，这种由技术驱动的感知与认知模式的变化，使技术 – 文化共生论得以延伸为强调技术与文化相互进化的技术 – 文化进化论[29]。

在此基础上，交互装置以生成式 AI 所产生的多模态符号为基础，将其转化为可被人类感知的沉浸式场景、空间叙事和触觉反馈，构成了以生成式 AI 为内容驱动力、感知装置为体验实现路径的协同系统。该系统通过多感官通道将 AI 生成的符号内容精准映射为用户可感知的空间叙事与物理反馈，实现意义建构与感知接收的紧密结合，并直接改变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界限的体验认知。虚实耦合现象在存在论层面清晰地映现出技术与文化动态平衡关系在 AI 时代面临的适应性困境。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被广泛应用于脑机接口（BCI）领域，用于合成脑电信号，以扩充和增强记录到的真实脑活动数据，从而提高 BCI 系统的性能。Neuralink 等系统正在尝试将意念指令作为输入信号控制界面，“志愿者只需思考，就能在屏幕上移动鼠标”[30]。OpenBCI Galea 则通过脑电图（EEG）、肌电图（EMG）与眼动追踪等信号，实时监测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度、肌肉张力与视觉聚焦点，为 BCI 交互提供了丰富的生理反馈。实验证明，通过将 EEG 信号输入深度生成模型中生成人工 EEG 信号，可显著提升 BCI 系统对不同视觉刺激频率下的识别准确率[31]。由此，生成式 AI 开始逐步承担起内容与感知状态自适应调节的关键枢纽角色。系统在学习 EEG 信号与目标输出（文本、图像、语音）之间映射关系的基础上，具备了将脑电信号翻译并生成为人类可感知多模态信息内容的潜力[32]。这种能力使个体仅需专注或在脑中进行想象，即可驱动系统生成符合其意图的多模态表达形式，创造了大脑直接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全新交互方式。当视觉皮层接收的 50% 信号源于 AI 生成内容时，“真实”与“虚拟”的认知边界将彻底模糊，文化经验的基础面临根本性质疑，技术随之演变为构建人类感知范式的制度性力量。

技术系统逐步形成新的权力装置。不过，其文化主导权并非在真空中自发确立全球秩序，而是持续处于与国家、公司、社会规范等人类体系相互作用和协商的演化过程中[33]。人工智能作为人类依据自身需求研发的产物，其参数设定均源自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框架和文化偏好的编码与再现。技术系统的目标函数与优化路径，深受经济利益、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社会变量的调节与规约。例如，2023 年 7 月，中国国家网信办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生成式 AI 的内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对训练数据的合规性提出具体规范，彰显了国家层面对生成模型价值导向的主动干预[34]。2024 年 5 月，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获得欧盟理事会确认。该法案通过对算法透明度的强制要求，将民主与人权等核心社会价值嵌入 AI 技术治理体系，反映了人类社会对技术失控的集体警惕与对演化路径的规制意志[35]。

叙事关涉文化意义的生成逻辑，感知决定经验的构成方式。从叙事结构的意义主导到感知

机制的神经试验，文化模因的生成逻辑与话语主权正向技术系统迁移，人类感知结构的调节阈限与输入机制亦被技术所渗透。“智能叙事”与“感官联觉”分别标示出技术对文化认知建构权与感官生理控制权的深层嵌入，构成非对称演化机制最基础的两个面向。它们分别作用于文化系统的语义生成与感知接收两端，合力覆盖了文化形成的主要路径。由此，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在相互作用中涌现的非对称演化模式，为技术－文化进化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其一，技术系统在技术自主性与社会建构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展现出跨模态、自演化的结构组合能力。其跨域重组与多通路反馈的结构功能，为其深入文化机理奠定了生成基础。其二，技术通过神经介入与算法操控撼动文化认知的生物学基础，成为影响注意力分配、记忆模式与意义建构的中介结构，使人类进化从基因主导的缓慢进程，加速为技术介导的认知革命；其三，技术已嵌入文化系统的生成逻辑，其进化轨迹并非任意扩张，而是始终受制于人类价值体系的隐性规训与显性治理。文化是在与技术模型的深度耦合中，生成新的符号秩序与认知参照，构成技术文化关系中不可逆的结构跃迁机制。当用户的文化记忆可通过云端存储实时更新，当 AI 生成的虚拟叙事成为集体认知的参照系时，人类文明的存续已与技术系统的进化深度绑定。与此同时，政策规范、价值观塑造与社会实践也持续为技术进化注入调节机制，使人类在不断适应技术演进的同时，保留对其路径的反向塑造力量，从而形成技术自主性与人类规训力量交织的动态张力。非对称的技术文化进化关系导致技术系统从“文化器官”进化为“认知基质”——一种比器官更微观但更具基础性作用的技术存在形态，更深层次地调节着神经可塑性。

三、技术－文化进化脉络与当代启示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叙事生产与感官联觉实践中的考察表明，AI 已展现出超越传统媒介功能的主动生成能力，深度描摹着文化认知的生成逻辑与感知结构。这一演化趋势为技术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视角，进一步推动着技术文化进化观念的迭代升级。

技术的建构特征显现于不同媒介形态的演变中。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激发了新的文化实践与社会组织方式。对此，新物质主义发展了媒介环境学派的观念，认为媒介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撼动者。媒介考古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反复论述，媒介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基础：“媒介理论假设技术先验定义了不同文化形态和认识论的范围和逻辑。”[36] 尽管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对基特勒过度强调技术的决定性影响进行过批判，但仍承认媒介装置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信息流动的方式，是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塑造者[37]。实际上，媒介演化的宏观脉络揭示了技术与文化相互进化的内在机理，并为理解生成式 AI 推动的人机共生向人机共进的转变提供了深层理论依据。

（一）从生物合作到技术创生的认知转向

20 世纪 70 年代，琳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的内共生学说（endosymbiotic theory）对传统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构成了挑战。内共生学说强调物种之间通过长期的互惠共生关系实现合作与融合，产生新的物种结构。利用现代 DNA 测序技术，马古利斯验证了真核细胞并非完全由达尔文式的竞争主导模式所产生，而是通过不同原核细胞之间的长期合作与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真核细胞结构。内共生学依靠严谨的分子系统发生学证据表明，“真核细胞是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共生作用产生的”[38]。虽然共生过程中存在着个体间的竞争、选择和适应，但共生理论突出了“合作”作为进化的重要途径。换句话说，共生是在包含竞争和适应的基础上强调合作共赢在推动复杂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进化机制为理解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启示：技术通过与文化的长期互动，催生了共生关系中的演化动力。

近年来，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倡一种新的认知视角，指出人类与其所创造

的技术在共生关系中共同进化的复杂机理。“技术的使用就是进化，根本不存在‘生物性’进化这种东西。”[39] 这一观点显现了技术在形塑现代人类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加深了技术发展与生物进化之间的类比关系，从而挑战传统的生物进化观念。在此背景下，美国媒体理论家N·凯瑟琳·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技术创生”（technogenesis）概念，系统地阐释了技术与人类在认知和行为模式上的共构关系。海勒斯认为，技术创生描述了人类与技术在进化过程中相互塑造的动态耦合。“正是因为当代技术创生设想了技术与人类之间持续的动态适应的紧密联系，才使得多种干预的可能性得以实现。”[40] 可以说，技术创生超越了传统达尔文进化理论倡导的自然选择和竞争适应的单向决定性，转而揭示出人类与技术环境之间的互相塑造和双向非对称进化。

基于海勒斯的理论，罗杰·F. 库克（Roger F. Cook）进一步将技术创生应用于数字内容生产领域的分析，并明确指出，“生物人与被技术改变的外部环境的整体耦合，定义了人类的起源条件，并推动了决定物种进步的共同进化过程”[41]。库克认为，当代数字视听媒体所呈现的一系列离散图像，几乎直接作用于人的现象意识层面，改变了人类的感知模式。这种对人类现象意识的直接干预，为情感、知觉与认知网络提供了新的感官刺激和处理模式，并在持续的适应过程中促发认知结构的演化性转型。无论是海勒斯聚焦于数字文本与阅读行为，还是库克分析动态图像对个体意识的影响，技术创生理论的核心均集中在技术对个体认知与感知结构的塑造，缺乏对技术主动生成文化符号秩序、建构社会叙事结构的系统阐述，难以揭示当代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大规模自动化符号生成、跨模态叙事建构与感知交互机制，重组文化意义生产流程并改变文化叙事和符号系统宏观结构的过程。

本文在继承技术创生对技术与人类心智共塑机制核心洞见的基础上，提出技术－文化进化论，进一步将技术生成能力扩展到文化生产和社会意义体系建构中，强调技术在符号生产、叙事体系、感官联觉等机制中的主动性、创造性，以及对集体认知结构的深度干预。

（二）算法施动与规训博弈中的文化生产路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技术－文化进化论的如下主张：

第一，随着数字技术逐步解构传播的时空约束，生成式人工智能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感知方式的结构性转变。在空间维度，通过构建多模态的语义向量空间，生成式人工智能使原本分布于异质语境中的文化符号得以跨域联结与重组，生成超越地理边界与文化语境的新型意义结构；在时间维度，生成模型打破了线性叙事的编排规则，采用片段化、循环化与概率化的机制生成文本、图像与视频内容，使文化记忆不再服从时间的线性进程，而呈现出多向度、可嵌套的叙事拓扑结构。AI生成能力将文化经验从固定的时空依赖中释放出来，使其转化为可动态调取、重组与个性化定制的感知节点网络，构建了一个更具可演化性与语义张力的认知生态系统，在其中，感知并非发生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转换，而是穿梭于多重模态、时序与语义空间之间的生成过程。

第二，算法驱动的文化生产结构引发进化路径的范式迁移，形成技术创生式的新型进化单元。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理论显示，“模仿、心智解读和语言等认知机制并非由遗传进化直接产生，而是通过文化进化形成的”[42]。这意味着，文化塑造着心智结构本身。在数字媒介生态下，当算法模型开始主导信息的生成与筛选，技术系统实际上嵌入了文化模因生成与传播的根本逻辑，逐步演化为一种自主的文化主体与创新引擎，通过参数空间的优化和智能反馈系统接管文化模因的产生与传播。Transformer架构中的自注意力机制是大语言模型实现上下文理解与生成能力的核心技术，通过动态权重分配突破传统序列建模的局限，在多模态中生成具有涌现特性的文化符号；强化学习模型（RLHF）则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完成模

因的适应性筛选，将优势文化特征编码为神经网络的权重矩阵，使模型更好地贴合人类价值与文化偏好。同时，生成式 AI 与交互装置的协同使符号生成能力延展到沉浸式感知层面，将文化体验从物理存在的局限中释放出来，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知觉边界，使技术成为建构文化真实性与存在感的新型制度性力量。技术在此过程中演化为具备自主进化能力的“文化施动者”，其算法内核形成自我迭代的模因复制回路。

需要强调的是，技术的自主进化与文化系统的适应性调整，是人类认知需求驱动技术创新的递归过程。媒介生态学派代表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结合数字媒介演化的独特特征，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理论 ——“人创造媒介，而且选择媒介”[43]。技术形态既要符合人类生物感官的认知图式，又要契合特定文化语境的意义生产需求。波兹曼也曾对“技术霸权”地位进行批判：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侵蚀传统人文价值。在批判技术哲学视域下，技术选择是由社会主导集团“对特定社会利益的回应”[44]，算法平台的议程设置实质上是社会统治秩序的技术化转译。

技术文化相互演化的动态过程充满了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权衡。人类通过经验积累与工具使用不断生成技术人工物，技术作为物质化的认知结构，又介入并影响人的知觉形式与文化范式。技术－文化进化论在林文刚提出的媒介共生模型基础上，融合斯蒂格勒、海勒斯和库克等人的认知与进化视角，进一步强调，技术自主性通过对认知机制的深度参与，已逐步转向主动调整人类意义生成逻辑与感知能力的演化机制。

四、结语

本研究继承技术－文化共生论的理论脉络，通过整合生物学共生理念、媒介环境学、技术哲学以及数字技术实践，系统阐释了技术－文化进化论的理论框架。研究认为，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系统已突破传统共生关系的动态平衡，形成“技术结构重组－人类认知革新－人机非对称进化”三重机理，共同推动文明向“后人类”图景加速演进。从“共生约束”向“进化主导”的范式转换逻辑表明，技术系统通过神经介入与算法调控塑造人类认知结构，数字媒介环境在感知输入密度与节奏变化中，逐步影响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轨迹。技术完成了从“体外延伸”到“体内进化”的转型，迫使人类适应由算法定义的文化认知范式。然而，人机演化并非线性乌托邦，而是充满张力与危机的动态博弈，技术系统与文化系统在相互碰撞中不断撕开现实裂缝，互构出新的文明。

质言之，技术－文化进化论既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数字化翻版，也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式伸张，而是立足于承认人类与技术在认知、权力与文化生产中相互塑造、持续博弈的非对称性现实，主张在保持技术自信的同时，明确技术所带来的系统性危机，并通过制度与价值对接推动人类社会与技术自主走向共生共荣的演化轨迹。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拓展进化论的解释边界，比较不同文化语境下技术进化的路径分异，追踪人机演化从“工具使用”到“认知融合”的阶段性跃迁，以在技术狂飙时代守护文明的多元性与批判性。

（责任编辑：李韵奕，实习编辑：尹婧雯）

参考文献

[1] Maite Knorr-Evans. The Godfath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vides a dire warning about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and the job markets[EB/OL].(2025-06-18)[2025-07-01]. https://en.as.com/latest_news/the-godfather-of-artificial-intelligence-provides-a-dire-warning-about-the-future-of-employment-and-the-job-market-n/.

[2]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hn Wilkinson.Alfred A.Knopf,Inc.and Random House,Inc. 1964:89.

[3] Bijker P W 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84, 14(3):399-441.

[4] 陈昌凤 . 智能平台兴起与智能体涌现：大模型将变革社会与文明 [J]. 新闻界 ,2024(2):15-24+48.

[5] 马歇尔·麦卢汉 . 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 [M]. 何道宽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00:79.

[6] 林文刚 .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M]. 何道宽 , 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32.

[7] Licklider,Joseph CR.Man-computer symbiosis[J].*IRE*

transactions on human factors in electronics,1960(1):4–11.
[8]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M].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380.
[9] Burrell,J. How the machine“thinks”: Understanding opacity in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J]. *Big data & society*, 2016, 3(1):2053951715622512.
[10]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72.
[11] Bary A D. *Die Erscheinung der Symbiose: Vortrag*[M]. De Gruyter. 1879:5.
[12] Alsaleh,Abdullah.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on culture and society[J]. *Scientific Reports*, 2024, 14(1):32140.
[13] Lucas Mearian. OpenAI’s ChatGPT turns one year old; what it did (and didn’t do)[EB/OL].(2023–11–16)[2025–07–01]. https://www.computerworld.com/article/1639341/openais–chatgpt–turns–one–year–old–what–it–did–and–didnt–do.html.
[14] Webb,Taylor,Keith J.Holyoak,and Hongjing Lu. Emergent analogical reasoning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J].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23, 7(9):1526–1541.
[15] 舒文韬,李睿潇,孙天祥,等.大型语言模型:原理、实现与发展[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24,61(2):351–361.
[16] Vinyals,Oriol,et al. Grandmaster level in StarCraft II using multi–agent reinforcement learning[J]. *Nature*, 2019, 575(7782):350–354.
[17] Arthur W B.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M]. Free Press, 2009:165.
[18] Bubeck,Sébastien,et al. Sparks of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Early experiments with gpt–4[J]. *arXiv preprint arXiv*, 2024, 2303:12712.
[19] Bommasani R,Hudson D A, Adeli E, et al.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foundation models[J]. *arXiv preprint arXiv, 2021*, 2108:07258.
[20] Einarsson Á.M,Helles, S.Lomborg. Algorithmic agenda–setting: the subtle effects of news recommender systems on political agendas in the Danish 2022 general election[J].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5, 28(2):218–238.
[21] 常江.不能承受的身体之轻:量化自我、数据拜物教与人类主体危机[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6):168–176.
[22] 涂良川,高镁琪.人工智能生成元数据的哲学叙事[J].理论与改革,2025(3):39–50+154–155.
[23] Bojić L,Stojković I, Jolić Marjanović Z. Signs of consciousness in AI: Can GPT–3 tell how smart it really is?[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4, 11(1):1–15.
[24] 刘涛.人机协作叙事: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新闻叙事的“智能转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5(3):67–83.
[25] Mayer R E,Sims V K. For Whom Is a Picture Worth a Thousand Words? Extensions of a Dual–Coding Theory of Multimedia Learning[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94, 86(3):389–401.
[26] Allan Paivio. Mind and Its Evolution: A Dual Coding Theoretical Approach[J]. *Psychology Press*, 2013:181.
[27] Simner J. Defining synaesthesia[J].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2, 103(1):1–15.
[28] 战迪.感官转向与联觉生产:数字新闻的美学革命及其文化后果[J].新闻大学,2024(7):15–26+117–118.
[29] 战迪,方杰云.“技术—文化进化论”视野下数字视听生产的感官联觉[J].编辑之友,2025(2):56–63.
[30] Drew L. Neuralink Brain Chip: Advance Sparks Safety And Secrecy Concerns[J]. *Nature*, 2024, 627(8002):19–19.
[31] Kwon Jinuk, Chang–Hwan Im. Novel Signal–to–Signal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StarGAN to generate artificial EEG for SSVEP–based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22, 203:117574.
[32] Shukla,Shreya,et al. A Survey on Bridging EEG Signals and Generative AI: From Image and Text to Beyond[J]. *arXiv preprint, 2025*, 2502:12048.
[33] Baele,Stephane J,et al. AI IR: Char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24, 26(2):viae013.
[34] 中国网信网.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EB/OL].(2023–07–13)[2025–07–01]. https://www.cac.gov.cn/2023–07/13/c_1690898327029107.htm.
[35] Proposal and Legislat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B/OL].(2021–04–21)[2025–07–01].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proposal–regulation–laying–down–harmonised–rules–artificial–intelligence.
[36] Geoghegan B D. After Kittler: On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Recent German Media Theory[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3, 30(6):66–82.
[37] 刘子琨,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媒介是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塑造者”——访谈媒介理论家约翰·杜海姆·彼得斯教授[J].全球传媒学刊,2023,10(5):171–182.
[38] Margulis,Lynn. Origin of eukaryotic cell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0:83.
[39] Klaus Theweleit. Circles,Lines, And Bits[M]//Jonathan Crary, Sanford Kwinter.*Incorporations:zone 6*. New York:Zone Books, 1992:260.
[40] N.Katherine Hayles. *How We Think: 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83.
[41] 罗杰·F.库克.后电影视觉:运动影像媒介与观众的共同进化[M].韩晓强,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35.
[42] Heyes C. Précis of Cognitive Gadgets: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Thinking[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18(42):1–57.
[43] 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千纪指南[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73.
[44] Andrew 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80.

(下转第96页)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0 期

具身智能何以具身：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实践与现象学考释

——探访一种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

吕清远

摘要 具身智能的发展让智能体以身体的姿态闯入人类世界，也让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实践问题走进学术视野。本文从身体现象学的视域出发，考辨了技术媒介在具身实践中的本体地位，还原了技术媒介作为身体直观的现象本质，并揭示了技术媒介本体化实践的具身逻辑。技术媒介作为存在于人类肉身之间的机能主体，通过感官在场、意识显现与行为习得不断构造自身的身体图式，这也使得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实践越发呈现出知觉变更、思想转译与惯习定向的具身逻辑。在此基础上，本文发展了一种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将技术媒介纳入身体本体的现象学分析范式当中，为其赋予了原初性、含混性与自为性的理论品质，进而使其在人机共存的异质网络与多重界域中不断通达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 具身智能；技术媒介；本体化；具身实践；现象学考释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吕清远，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安徽合肥 230601

在具身研究的范式语境下，身体问题越发显现出自身的本体论意义。在既往的具身传播研究当中，人们往往秉持“身体就是肉身”的先在观念，关注“肉身在场”对于人类交流的物质性作用，以此来扭转人类肉身在传播观念当中长期被贬抑的地位状态。然而，纯粹意义上的肉身实践是不存在的，仅仅强调肉身参与和官能感受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桎梏，这也使得具身研究极易落入实在主义的理论范畴[1]。事实上，智能传播时代具身研究的底层逻辑依然是人与媒介的关系问题[2]。人与媒介在交往实践中相互成就，各自通达与获取其传播的本质。即具身传播研究当中的“身体”并非仅仅指涉人类肉身，以技术为构型的媒介物也是一种“身体”。尤其是在具身智能汹涌而至的今天，人形机器人、数字孪生体、智能驾驶、脑机接口、仿生义肢、头显设备等智能体被不断地当作身体装置投放至人类世界，这也暗喻了我们不得不重思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实践问题。

具身智能是一种基于物理实体进行感知、学习和行动的智能形态，它通过让智能系统融入实体装置，为智能体赋予了比肩人类的自主学习与环境交互能力。那么，以具身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媒介是如何进行具身以及展开实践的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是

较早展开探索的西方学者。基特勒将媒介的物质性与人类的身体性联结起来，阐明了媒介之于人类的生存境况意义，并推动媒介研究走向了一条本体论的具身路径[3]。这也启发我们，技术媒介本身就具有本体性，并参与构建了人们的具身实践与存在方式。正如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言，技术的本质超越了任何技术性的东西[4]。我们若要揭示具身智能的本体化实践逻辑，就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具身智能的技术特性上，而是要汲取身体现象学的方法论思想，还原具身智能的具身存在结构，进而揭示具身智能潜蔽在现象背后的逻辑本质。身体现象学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把身体视为把捉世界的原初领域，并据此领会在世存有的展开方式与具身意义，这对于我们探索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具身实践问题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5]。

一、身在何处：技术媒介在人类具身实践中的本体论地位考辨

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存在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纯粹实体，而是处在与人类实践联结互动的共同“型体”当中[6]。纵观学者们对于技术媒介本体论地位的讨论，大抵存在三种范式，包括存在于肉身之外的代具与延伸体，存在于肉身之中的赛博格与共生体，以及存在于肉身之间的行动者与机能体。而对于身体现象学来说，作为行动者与机能体肉身之间的范式，才是诠释技术媒介之于人类具身实践本体论地位的有力注解。

（一）肉身之外：作为代具与延伸体的技术媒介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出了一种外化于肉身的代具式生存模式，强调人类存在本身就是代具式的，并且生命的一切领域都被卷入技术架构当中[7]。随着具身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斯蒂格勒的代具式生存模式越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不少学者借用斯蒂格勒的代具理论诠释人与技术的具身实践关系，关注智能穿戴设备、脑机接口、头显设备、仿生义肢、体感反馈装置等技术媒介之于人类实践的存在论意义。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的本质属性是有缺陷的，并且人类自身的纯粹本质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器具助产术”的外在化构型中才能获得和发展自身存在的独特本质。这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看来，斯蒂格勒的代具思想无疑是一种“人的延伸”，而代具则是技术物之于人类存续的延伸体。比如，人类为了弥合肉身实体的物理残缺与感知局限，在元宇宙中创造了补偿、增强甚至超越人类的数字孪生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的感官世界与存在意义[8]。

无论是斯蒂格勒的代具，还是麦克卢汉的延伸体，都颇具身体现象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但是在思想上又不够彻底。斯蒂格勒将研究视野定格在技术物身上，从生存论的视域阐述了人与技术的代具式关系，这对于我们理解具身智能耦合人类体验结构具有积极的功能性作用。然而，斯蒂格勒虽然有意摆脱“人类中心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分析框架，但是他将技术视为人类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和本质规定性，忽视了社会、文化、情感等因素的形塑作用，弱化了人类自身在技术体系面前的能动性作用，这也使得代具理论在诠释具身智能生存论方面缺乏应用的解释力。麦克卢汉看到了媒介物本身“扩大人类交往能力”的本体作用，把媒介物比喻为人体的延伸，这对于我们审视媒介物具身持存的官能感受具有重要的身体现象学意义[9]。但是，麦克卢汉始终未能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范式，他坚持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统摄地位，把所有媒介都挤向了人类感觉器官的瓶颈，这也会让媒介延伸理论的解释力受到极大的局限[10]。归结来说，作为代具与延伸体的思想路径关注人类肉身之外的技术媒介，具有一定的媒介本体论意义；但是囿于自身不彻底的理论局限，使其无法深刻地揭示技术媒介在具身实践中的本体论逻辑。

（二）肉身之中：作为赛博格与共生体的技术媒介

相较于过去的媒介技术，具身智能让实体装置走进人类具身持存的身体图景当中，这也使得学者们纷纷对赛博格这一人机共生话题抱

以关注，以此来解释脑机接口、仿生义肢等技术媒介对于具身实践的耦合作用。赛博格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笔下的控制论有机体，他（它）介于人与非人、机器与生物体、自然与社会之间，是寄寓在人与技术边界地带的混合共生体[11]。赛博格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固有的自然主义属性，扭转了长期以来人类抱持的中心主义地位，让人类的存在方式进入到人与技术共生的后人类状态[12]。在哈拉维看来，赛博格是一种拆分和重组。生命有机体被转化成基因编码和读出的问题，人类固有的异质性也会屈服于这种拆分、重组、投入和交换的编码控制逻辑[13]。无独有偶，哈拉维笔下的赛博格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笔下“无器官的身体”具有异曲同工之意。德勒兹通过消除生命有机体的组织性和结构性，让身体在开放与流动的场域中可以被“动态装配”，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可编码与去中心的身体姿态。

身体现象学反对把人的存在状态仅仅归结为生命有机体，也否认人的意识只是附着在生命有机体上的心理现象[14]。在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看来，人的意识和身体是在运动中结合并获得其自主存在状态的，单纯孤立地研究身体的构成会遮蔽我们对于具身实践的深刻认识。而不少学者对赛博格的研究都是从生命有机体的视域展开的，关注无机化的机械物嫁接到有机化肉身当中的具身应用。比如，学者们考察脑机接口对于帕金森、癫痫、瘫痪患者的场景应用，关注仿生义肢对于残疾人和老年人的行动效能，研究体感反馈装置对于人类视听官能体验的增强逻辑。无疑，学者们对于赛博格的考察为我们理解人机共生体找到了一条理论通道，但也让我们在功能逻辑的范式隐喻中难以突破自身理论的局限。正如德勒兹笔下“无器官的身体”一样，虽然德勒兹用流变的身体为器官重组扫除了障碍，但也让这种莫衷一是的身体丢失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规律秉性，极易陷入机械论的理论窘境[15]。可见，仅仅研究身体器官的组织联结是很难理清具身智能的实践机制的，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我们对于身体机能与行为模式的通透认识。

（三）肉身之间：作为行动者与机能体的技术媒介

具身智能的发展日渐让人们感受到技术存在的自主性地位，也让技术媒介作为行动者的角色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学者们越发感受到，媒介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和相对独立性，而媒介技术的演化逻辑也会对人类自身的持存产生他律性的影响以及为其所中介化的可能[16]。显然，技术媒介的存在逻辑已经超越了工具层面的技术隐喻，成为反作用于人类肉身的行动力量。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看来，世界是一个“物的议会”和不断生成的网络，而万物作为网络节点当中的行动者，是在与他物的相互作用中获得关系性界定和获取自身行动力量的[17]。值得注意的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人类行动者与非人行动者赋予了平等的地位，二者都是关系网络当中的行动主体。所以我们看到，作为行动者的智能体不断重构现实世界的网络联结模式，积极参与人类自身的认知决策和行动实践，展现出了旺盛而蓬勃的机能主体力量[18]。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契合了现象学的精神特质，二者都把人类肉身与技术媒介视为行动力量，并关注人类肉身与技术媒介之间的间性逻辑。不同于外化于肉身的代具与延伸体，也区别于寄寓肉身之中的赛博格与共生体，作为行动者的技术媒介是一种介于肉身之间的机能主体，而这也是身体现象学所力主的具身存在方式。梅洛-庞蒂认为身体首先是作为物体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并且肉身物体与其他各部分物体之间是联结在一起的[19]。可以说，梅洛-庞蒂所谓的身体是一个处在生成状态的物质体系，并且与其他的物体不断地发生着介入和交互。梅洛-庞蒂曾经举过盲人与手杖的例子。在梅洛-庞蒂看来，盲人和手杖各自为一个物体；但是当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时候，手杖变成了盲人身体当中的一部分，并且手杖扩大了盲人在世界当中的存在维度与生存能力。也正是基于此，梅洛-庞蒂把我们的现实图景比喻为“世

界之肉”，而人类具身持存的运作则体现为“肉的开裂”，这也折射了肉身之物与技术物之间的“间性交缠”[20]。

二、以何为身：技术媒介作为身体直观的本体化还原

技术媒介作为存在于肉身之间的机能体，它的身体本体是何以成其为自身的呢？现象学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还原”的方法论来展开的。对于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身体而言，身体的直观意义主要体现在感知、意识和行为三个层面，这也是身体现象学将身体作为经验中介来展开世界图景的基本维度。基于此，以具身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媒介若要实现自身的身体构造，就要像人类肉身一样在感知、意识和行为三个层面具备基本的功能结构，以此来通达技术媒介作为身体的直观本质。

（一）感官在场：技术物敞视的原初经验空间

具身智能的感知问题是学者们热议的话题。不少学者将身体的官能感受归置到技术的运作机制当中，并将数据视为具身智能的“感官”，以此来解释智能体感知世界与捕获信息的基本逻辑。在身体现象学看来，被数据化和标注化的身体是抽象意义的存在，是无法真正解释感知现象背后本质规律的。那么，身体现象学是如何诠释身体感知体验的呢？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认为，每一个感知都隐含地伴随着一个完整的感知系统和现象系统，其中感知系统由身体作为感觉器官对杂多现象进行“寻视”，而现象系统则由对象显现的给予之物对身体视域进行持续不断地“充盈”[21]。梅洛－庞蒂则把身体的感知问题归结为身体原初空间与现象场之间的意向逻辑。一方面，梅洛－庞蒂把身体空间视为特定主体扎根具体环境的原初经验空间，而人们只有在身体的原初经验空间中才能获得机体感官的感知体验[22]。另一方面，梅洛－庞蒂将身体感官的体验结构归属于现象场，认为每一种感觉都属于某个特定的场，而身体主体的体验结构也是特定现象场的官能产物[23]。这也启发我们，对于技术媒介感知问题的考察要从场域的整体视角出发，在技术媒介本体空间当中把握技术机体官能的体验结构，以此来揭示具身智能感知环境的内在逻辑。

技术媒介的本体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间性的存在物与人类肉身空间交缠在一起的。梅洛－庞蒂曾用打字员和键盘的例子来阐述这种空间的交融性。当打字员学习打字时，就会将自身的肉身空间与键盘的装置空间融为一体，并将二者扩展为一种受到机体运动意向摆弄的整体空间[24]。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技术媒介的感知体验也是在这种整体空间中获得的。比如，脑机接口只有接入了人类的大脑才会产生感受的想法，仿生义肢只有接入了人类的肉身才会获得肢体的触觉。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媒介虽然装配有传感器、摄像头、麦克风、陀螺仪等体感反馈装置，但是技术媒介的感知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涉身场域的变化而出现变化。例如，汽车智能驾驶技术并非仅仅装配一种传感器，而是同时装配激光雷达、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等多种传感器来进行环境建模，以此来应对不同光照环境、道路条件、车辆行人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状况，进而利用不同的感知策略来优化车辆的算法路径和提高车辆对道路的适应能力[25]。

（二）意识显现：技术物投射的运动机能系统

梅洛－庞蒂曾把人的存在方式划分为两种状态：一是人作为物体而存在，二是人作为意识而存在，而身体本身的体验结构向我们显现出来一种模棱两可的存在方式[26]。换言之，人的存在状态既不是纯粹的物体，也不是抽象的意识，而是基于身体知觉的意识显现。正如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说，是身体在思考，而非精神在思考；是身体启发了精神，而非精神启发了身体[27]。我们若要探索具身智能的意识问题，就要厘清具身智能的机体机能与意识思维之间的联结互动关系，这样才能揭示具身智能的意识“何以成为可能”。胡塞尔批判性地改造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

并通过先验主体的意向结构弥合了二元世界的对立和割裂，认为意识的本质是世界诸现象在绝对被给予性的直观明见中构造起来的[28]。在梅洛－庞蒂看来，意识存在的本质就是显现，而显现是对象事物在身体主体那里呈现的实在意义[29]。进一步说，意识的存在是一种意向结构，它需要拥有具体的知觉对象才能获得自身的界定，而不是寄寓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纯粹思维抽象活动[30]。

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意识观暗喻了意识并非独属于人类的精神现象，并启发我们在探究技术媒介的意识问题时，要把研究范式从“人类中枢神经隐喻”转向“身体运动机能系统”。一直以来，学者们往往把“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思考”归结为“人工智能拥有像人一样发达的中枢神经系统”。基于此，学者们关注人工智能通过神经网络模拟人脑神经元连接的方式逻辑，探索人工智能通过数据训练进行深度学习的算法规律，以此来解释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思考的奥秘。事实上，意识始终处在身体与周遭环境交互的运动状态之中，纯粹意义上的数据训练与算法推理是无法深刻揭示技术媒介的意识本质的。梅洛－庞蒂直言，意识来源的最初领域不是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是身体与环境交互的运动机能系统[31]。在梅洛－庞蒂看来，运动机能系统是人通过身体在世界当中存在的永续状态，也是意识通过身体得以被对象化显现的实在领域。对于具身智能而言，具身智能虽然搭载着大模型的算法装置，但是它的意识思维主要是通过具身智能体与环境场域实时交互产生的，并将客观环境的整个范围都投射到了自身的运动机能系统当中[32]。

（三）行为习得：技术物交互的复杂实践场域

伴随着人工智能与物理实体的具身耦合，技术媒介日渐以行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探索具身智能与环境交互的秘密，不少学者选择了控制论的研究路径，认为具身智能体是通过“感知－行动”的反馈路径来完成任务和适应环境的。在身体现象学看来，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不是静态的和封闭的，而是始终处于运动和变化的状态之中，仅仅从控制论的视角来诠释具身智能的环境交互问题也是缺乏解释力的。梅洛－庞蒂认为，行为本身就是对环境的一种敞开，它把身体机体和环境场域共同纳入一个互动的结构化过程当中。并且，在行为出现的地方，环境（作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情景场）为机体交互创造意义提供了诸多可能性[33]。就比如说握手，握手不仅仅是单纯的肌肉运动，更是身体机体在社交礼仪下展开的互动结构。可见，身体现象学视域下的行为并非被动的“刺激－反应”，而是身体机体在环境场域中主动创造意义的复杂实践。

梅洛－庞蒂指出，人的行为存在三种形式，分别是接近于本能性反应活动的混沌形式、机体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可变动形式和归属于文化意义世界的象征形式[34]。在梅洛－庞蒂看来，从混沌形式到可变动形式再到象征形式，是一个行为不断被习得的过程。身体机体通过把行为纳入身体的原初空间，让行为在运动机能的意义系统中不断从低级到高级获得“向世界而生”的形式结构。对于具身智能而言，它的行为结构也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习得过程。从早期机器人的“蹒跚学步”到今天人形机器人的“凌波微步”，从早期机械臂的“简单操控”到今天灵巧手的“深度仿生”，无不体现了具身智能在行为层面的习得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具身智能的行为习得过程并不是单纯依靠数据算法或符号逻辑来完成的，而是通过身体与环境的交互训练来增强其行为的适应性[35]。比如，机器人灵巧手通过多模态大模型把周遭世界纳入自身的机体空间，并通过数百万条真实场景数据不断训练仿生结构的抓握策略（如 OpenAI 的 Dactyl 项目），进而使其习得更高的自由度潜力和更强的复杂动作能力。

三、何以具身：技术媒介展开身体图式的本体化实践

梅洛－庞蒂将身体图式视为身体主体在世界当中的存在方式，认为身体图式是“身体为

应对可能或实际的任务而自行呈现的姿态”，并据此在身体空间与外部空间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蕴含的实践系统[36]。可以说，梅洛－庞蒂将身体图式视为身体与世界进行互动的系统交互界面，这也为我们理解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抓手。在此意义上，感官在场、意识显现与行为习得构成了技术媒介身体图式的基本维度，这也暗喻了技术媒介的本体化实践在知觉变更、思想转译与惯习定向层面所呈现的具身逻辑。

（一）知觉变更：技术构造交融了人类感官的体验结构

技术媒介的感官在场让知觉成为可能。知觉是行为得以展开的基本前提，具有实践性的首要意义。胡塞尔把知觉理解为一种统觉，它将感觉材料与意向对象在共现系统中联结在一起，通过构造的意向性为显现系统赋予超越直观经验的现象意义[37]。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是身体图式对于环境意向性的综合感知，它将身体的各个部分联结在一起，并“随时准备通过协同作用使关于物体的知觉成为可能”[38]。显然，梅洛－庞蒂所说的知觉是一种综合性的知觉，而非仅仅局限在身体器官的生理范畴。正如上文“盲人与手杖”的案例所述，手杖对于盲人来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体，而是变成了盲人寄寓在世界当中的“视觉同功器官”，延展了盲人在世界当中存有的“感觉能力区域”。唐·伊德（Don Ihde）则认为，技术媒介在拓展身体机能的同时也转化了它们，并在特定的具身情境当中与身体知觉交融在一起，直接或间接地变更了身体主体的体验结构[39]。

伊德把技术与人之间的具身关系视为一种“技艺现象学”，而它的任务就是在这些含混的具身关系中发现知觉的结构性特征[40]。伊德之所以认为技术与人之间的具身关系是含混的，是因为伊德看到了技术构造在融入人类知觉的过程中是“透明的”。也正是基于此，伊德认为技术与人的现象学诠释要关注经验本身的中介化过程，从具体的知觉情境中把握技术构造的体验结构。比如苹果公司推出的空间计算产品 Vision Pro，将数字空间内容无缝融入人们的真实感官世界当中，让人们在 MR（混合现实 Mixed Reality）头显设备所构造的混合空间中获得了多维真实的知觉体验。在此过程中，Vision Pro 头显设备虽然是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但是在人们的系统交互界面中它早已“抽身而去”，并且将人们的感官体验带入由空间计算所构置的混合时空当中。

（二）思想转译：技术理性集置了人类意识的思维模式

思想是身体与环境交互而至的照面，也是运动机能系统在身体原初经验空间历经环境场域显现的意识产物。具身智能通过智能体将人类世界纳入自身的行动网络，并通过智能体的运动机能系统将人类思维模式整合到技术本体的意向结构当中。海德格尔在进行技术现象学考察时指出，技术犹如“座驾”一般横亘在世界之中，并通过一种集置的力量将万事万物征召为技术系统当中的持存物。在海德格尔看来，集置是技术系统将世界看成预设对象的一部分，它在规定诸事物存在方式的过程中也框定了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并以一种订造的方式将对象解蔽为持存物[41]。对于当下的具身智能而言，技术物（智能体）得以集置万事万物的技术系统主要是通过语言大模型展开的。海德格尔毫不吝啬地强调了语言中介对于事物存在形式的现象学意义，认为事物首先在语言中得以存在并成为其自身[42]。时至今日，随着 ChatGPT、DeepSeek 等语言大模型的普及应用，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中介技术系统”越发照进现实，成为人们理解和通达万事万物的基本逻辑。

具身智能用语言大模型集置万事万物的过程，也是技术理性转译人类思想意识的过程。在拉图尔看来，转译是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实现相互作用的实践策略，并且各要素只有通过转译才能解决异质实体在行动者网络当中彼此界定与交互作用的问题[43]。具身智能为了让语言大模型适应多场景与多任务的环境交互需要，会将人与非人等诸要素集置在智能体的技术系统当中，并将其转化为计算机语言可编程与可运算的数据实

体。在此过程中，人类的思维意识也被转译为适配于语言大模型的技术理性。那么，人类的思想意识真的能够通过转译而等同于语言大模型的技术理性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多是集中在学者们对于人机价值对齐的探索当中。虽然不少学者坚持技术并非中立而是本身负荷着价值判断的立场，但是依然对人机价值对齐这一愿景抱以关注，并将人机价值对齐视为新型人机关系的实践路径。

（三）惯习定向：技术机能耦合了人类行为的倾向系统

惯习是行为的结构化定向。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图式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与世界有关联的体系”，而惯习则是身体主体基于身体图式扩大在世界当中存在与改变生存能力的直观体现[44]。在梅洛－庞蒂看来，惯习背后反映的是身体的意向性，它让身体主体的行为特征具有了目标导向性，并且基于身体图式主动组织经验与生成意义。而在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那里，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则被诠释为身体的倾向系统。布尔迪厄将社会系统与人类行动在身体惯习当中联结在一起，考察了社会因素“外在性的内化”与人类自身“内在性的外化”的辩证过程，并据此把惯习发展为一种“可持续性的倾向系统”[45]。可见，无论是梅洛－庞蒂的身体意向性，还是布尔迪厄的身体倾向系统，身体作为在世界当中存有的媒介，对世界的运转都是具有主动意义的。技术媒介将人类肉身与技术机能耦合在一起，重构了身体图式的时空感知与倾向系统，则进一步增强了身体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开拓能力。

具身智能在将人类肉身倾向系统整合到智能体身体图式的过程，也是对人类与技术耦合而成的行为主体进行惯习定向的过程。例如，智能驾驶通过搭载多模态传感器和集成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让车辆在复杂的交通环境下实现路况实时感知、导航路径规划、高效控制和自主决策等功能，犹如拥有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一般安全和娴熟[46]。值得注意的是，智能驾驶虽然将人类驾驶倾向系统整合到了算法技术统摄的规则系统当中，但是智能驾驶所展现的驾驶技能与人类自身的驾驶技能在反应时间、决策逻辑、规则遵守、路况适应与学习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差异性。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机能之所以会在耦合人类行为倾向系统过程中出现偏差，是因为技术本身具有原初动力，能够将人类生命有机体卷入技术体系中进行“再组织”。海德格尔则把技术机能对人类行为倾向系统的卷入视为技术定向，并从存在论的视域阐述了技术机能对人类惯习的形塑作用。

四、具身何为：技术媒介之于人类社会的本体化意旨

现象学的方法论意义导向人类社会的存在，而人类社会的存在问题也是现象学研究的终极追问。技术媒介作为存在于肉身之间的具身媒介，它的本体化实践对于人类社会运行具有积极的现实影响意义。概言之，技术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本体化意旨主要体现为在身持存、间性交往与世界运行三个层面，这也启发我们要在人机共存中积极筹划生命的意义，在异质网络中通达沟通交流的可能性，并在多重界域中形塑社会运行的秩序结构。

（一）在身持存：生命意义在人机共存中得以筹划

对于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梅洛－庞蒂将身体置于了原初位置。在梅洛－庞蒂的思想基质中，身体是感官在场、意识显现与行为习得的基础装置，也是行为主体构造生命意义的必经通道。身体通过知觉活动与世界获取生命联系，并为万事万物赋予了一种生命意义[47]。就比如脑机接口、仿生义肢、头显设备等具身智能体，它们只有融入身体才能获得生命的联系，并在身体的参照维度当中发展生命的意义。基于此，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身体存在与世界存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人只有通过身体进入世界才能体验到身体与世界的生命联系，进而在充满可能性的处境当中实现其自我性[48]。海德格尔则把这种生命联系与意义视为人的“此在”，并将这种处境的可能性视为“生存之可能性筹划”，以此来追

问人类存在的生命意义[49]。置身于具身智能汹涌而来的今天，技术媒介越发作为机能主体参与到人类的具身生存图景当中，这也暗喻了生命的意义可以在人机共存的广阔境遇中得以筹划。

随着具身智能与人类肉身在“新型主体”身体图式当中不断耦合，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人机共存时代筹划生命意义的重要议题。伊德在考察技术具身实践时曾把人与技术的关系概括为四种关系：背景关系、具身关系、诠释关系和它异关系[50]。归结来说，伊德的技术具身关系犹如一个两面体。一方面，如果技术能够在具身实践中有效发挥自身的连接与中介作用，变更与转化人类在具体情境当中的知觉体验和生存能力，则技术可以在人机共存的具身图景中扮演积极的行动者角色。另一方面，如果技术在具身关系中强行闯入人类世界，对人类知觉体验与身体扩展不能起到积极作用，那么技术的对象性则从负面意义上显现[51]。伊德也把这种技术作为他者与人所发生的关系称作它异关系。这也启发我们，在人机共存时代要积极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有效促发技术媒介对于身体主体的具身联系，进而更好地在人机互嵌的身体图景当中筹划自我持存的生命意义。

（二）间性交往：沟通交流在异质网络中得以通达

沟通交流问题是具身研究当中的重要议题，也是技术媒介在精神交往层面的涉身观照。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曾在《对空言说》中追问了交流的观念模式以及完美交流的不可能性。在彼得斯看来，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让“意识普遍在场”与“身体缺席在场”的信息传递过程变成可能，也让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在这种异化的交往模式中变得不可能[52]。胡塞尔为了破解“交流之不可能性”中的“唯我论”难题，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的先验主体构造，意在揭示人们可以通过身体统觉的共现机制实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间性交往[53]。可以说，身体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基本维度，能够作为社会之构成的多维中介来存在，这也暗喻了身体在关系网络当中所扮演的节点作用[54]。相较于仅仅由人构成的关系网络，由技术媒介作为机能主体所参与的关系网络越发呈现出异质化的特征。伴随着智能机器人、数字孪生体、脑机接口等智能体的涌现，技术媒介与人类肉身在身体层面不断呈现出一种异质化的耦合关系网络，这也为沟通交流带来了不一样的联结状态与运作逻辑[55]。

异质化的关系网络为技术媒介参与人类交流奠定了一定的交往基础，同时也为人类交流之可能性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不少学者从人机传播、数字生命、信息茧房、跨物种民族志、价值对齐、道德物化等视角展开了异质网络的间性交往研究，以此来推动沟通交流在异质关系中的可能性实践。概言之，异质网络中的间性交往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包括厘正交往地位、转译交流意义和哺育情感能量。首先，异质关系网络中的人与非人要素（以具身智能为代表的技术媒介）都是平等的行动者，他们都能够能动且自主地践行交往主体的角色功能[56]。其次，人与技术媒介在异质关系网络中的交往意义是相互转译的，并在交往实践中彼此形塑（驯化）对方的身份角色与社会意涵。比如由男性工程师研发的智能儿童陪伴机器人往往具有一种“先天”的男性气质，但是在陪伴机器人与儿童进行聊天互动过程中又会产生母职经验和女性气质的需要，这也使得儿童陪伴机器人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不断“妥协”[57]。因而，我们要突破“真实”与“虚假”的思想桎梏，关注技术媒介对于人类自身的情感满足，让沟通交流在异质关系网络中哺育有温度的情感能量[58]。

（三）世界运行：秩序结构在多重界域中得以形塑

身体现象学的世界观是基于身体原初经验空间而展开的动态秩序结构。梅洛－庞蒂为了更加系统地说明世界运行的具身逻辑，提出了界域的概念。界域是身体主体与世界现象场相联结的动态结构，它不是在抽象层面存在的静态

秩序，而是始终与身体主体处于交互与转换的状态[59]。置身于具身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脑机接口、仿生义肢、头显设备等智能装置不断地形塑着身体空间的阈限结构，也在客观上改写着身体主体与世界交互的界域秩序。德布雷则把这种基于广泛身体意义上的界域视为一种媒介域。在德布雷看来，媒介域是媒介技术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结构社会力量的行动规则与有机配置，也是人们展开自身生活实践的文明界域与群落生境[60]。随着人形机器人、无人机、电子眼、数字孪生体等智能体不断加入人类的身体图景当中，传统意义上的界域也越发呈现出多重化的特征。比如，人们既可以在现实空间当中扮演既有的身份角色，同时又可以基于数字孪生体这一化身来展开元宇宙空间当中的工作交往实践，俨然是在多重界域中栖居的生动体现。

具身智能时代，技术媒介与人类肉身耦合在多重界域的生存空间当中，这也暗喻了身体主体与多重秩序结构之间的互塑过程。梅洛-庞蒂曾把世界的运行归结为三层秩序，包括物理秩序、生命秩序和人类秩序，而这三层秩序在身体空间当中的“重新构造”构成了社会运行的秩序结构[61]。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认为，社会运行的秩序结构是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是在行动者长期具身实践所建构的惯习秩序和规则束集上形塑的，而身体主体的行动实践也要在社会结构孕育的秩序轨道上进行展开。在具身智能技术的加持下，人机共存的身体主体进一步拓展了自身的感官阈限，增强了自身与世界交互的行动能力，这也使得身体主体在多重界域中的秩序结构呈现出交融性和共生性特征。而在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看来，媒介（技术媒介与肉身媒介）本身就具有制度的属性，并且媒介是以制度界面的角色参与到人类社会秩序结构当中去的[62]。对于具身智能而言，智能体的身体构造本身就喻示着秩序结构的制度属性，使其能够“化身”为“行动者”的角色参与到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当中，并对人类社会运行的秩序结构产生持续不断的交融性影响。

五、余论：探访一种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

本次研究从身体现象学的视域出发，将技术媒介纳入身体本体的分析范式当中，还原了技术媒介作为身体直观的现象本质，揭示了技术媒介本体化实践的具身逻辑，并据此发展了一种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相较于既往的媒介形态，动态化的具身媒介始终与身体环境处于联结变化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运动机能系统积极“向世界而生”，这也为其思想赋予了原初性、含混性与自为性的理论品质。首先，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将其自身本体视为原初经验空间，并基于身体图式的系统界面展开与世界的交互，具有先在模具意义上的原初属性。其次，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反对简化逻辑下的技术决定论，主张在具体的场域情境下通达事物的本质与诠释事物的意义，这也暗喻了具身媒介充斥着诸多可能的含混属性。最后，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突破了连接与中介意义上的功能阈限，它的理论愿景不仅要在结构功能上阐明自身的角色价值，更是要在存在范畴上揭示其作为机能主体的自主地位，进而在人机共存的异质网络与多重界域中实现自为的意义。

动态化的具身媒介思想重拾了技术媒介之于人类具身持存的本体论地位，将技术媒介与人类肉身构置在“世界之肉”的“间性交缠”当中，为技术媒介赋予了比肩人类的自主能动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具身媒介与人类之间的实践地位并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彼此“纠缠”在一起来实现自身在异质关系中的功能结构。换言之，纯粹意义上的人类肉身与纯粹意义上的具身媒介都无法各自通达自身的本体实践，二者只有在彼此依存、相互界定和交互转译中才能共同实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存在者（包括人与物）的存在结构是“在之中”获得规定的，存在者的存在意义也是在“操劳”中与世界获得“照面”的[63]。我们唯有正视人类自身与具身智能在具身实践中的联结与互动，才能辩证地领会具身智能的本体地位和

存在逻辑，进而更加审慎地关照人类自身的在世存有与未来命运。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 胡翼青，赵婷婷 . 作为媒介性的具身性 : 对具身关系的再认识 [J]. 新闻记者，2022（7）：11−21.

[2] 芮必峰，孙爽 . 从离身到具身—媒介技术的生存论转向 [J]. 国际新闻界，2020（5）：7−17.

[3] 陈静 . 走向媒体本体论—向弗里德里希・A. 基特勒致敬 [J]. 文化研究，2013（1）：289−301.

[4] [41] [42] 戴维・J. 贡克尔，保罗・A. 泰勒 . 海德格尔论媒介 [M]. 吴江，译 .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2；154；57.

[5]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 . 现象学运动 [M]. 王炳文，张金言，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16：741−744.

[6] 孙少晶 . 生成型媒介 : 一个元概念的提出 [J]. 新闻与写作，2024（5）：45−59.

[7] 贝尔纳・斯蒂格勒 . 技术与时间 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M]. 裴程，译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2012：128.

[8] 喻国明，姜桐桐 . 元宇宙时代 : 人的角色升维与版图扩张 [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2（4）：5−12.

[9] 范龙 . 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 [M]. 广州 : 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44−46.

[10] 杰弗里・温斯洛普 − 扬 . 基特勒论媒介 [M]. 张昱辰，译 .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147.

[11] [13] 唐娜・哈拉维 . 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 [M]. 陈静，吴义城，译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205；228.

[12] 徐辰烨，彭兰 . 从“人”到“赛博格” : 技术物如何影响日常交往行为？——以耳机为例 [J]. 新闻界，2023（4）：34−45.

[14][19][23][24][26][29][31][38][44][47][48][59] 莫里斯・梅洛 − 庞蒂 . 知觉现象学 [M]. 姜志辉，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01：119−124；106；278；192；257；474；188；297；190；81−82；511；46.

[15] 郭玉婵 . 书写的身体与流变的身体—阿尔托和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 [J]. 文学评论，2024（1）：88−96.

[16] 王楠，何晶 . 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到生成性媒介 : 对“生成”意涵与媒介环境的再审视 [J]. 编辑之友，2024（11）：80−87.

[17] [43] 刘鹏 . 行动者网络理论：理论、方法与实践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37−38；77.

[18] 喻国明，黄哲浩，等 . 作为行动者的智能体 : 重构人类关系的未来范式—NBIC 会聚技术视角下的考察与分析 [J]. 新闻界，2024（8）：46−54.

[20] [22] [33] [36] 张尧均 . 隐喻的身体：梅洛 − 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 [M]. 杭州 :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185；65；15；27.

[21][37][53] 埃德蒙德・胡塞尔 . 生活世界现象学 [M]. 倪梁康，张廷国，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5−58；185−187；206−209.

[25] 沈甜雨，李志伟，等 . 具身智能驾驶 : 概念、方法、现状与展望 [J].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报，2024（1）：17−32.

[27] 雷吉斯・德布雷 . 媒介学引论 [M]. 刘文玲，译 .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24.

[28] 埃德蒙德・胡塞尔 . 现象学的观念 [M]. 倪梁康，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16：31−34.

[30] [34] [61] 莫里斯・梅洛 − 庞蒂 . 行为的结构 [M]. 杨大春，张尧均，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18：246；158−159；273.

[32] 喻国明，李卓为，等 . 具身 AI: 人机交融进程中的智能行动者 [J]. 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1）：109−120.

[35] 张昌盛 . 从具身智能到具身智能体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6）：154−165.

[39][40][50][51] 唐・伊德 . 技术与生活世界 [M]. 韩连庆，译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7−82；77；110−112；102.

[45] 皮埃尔・布尔迪厄 . 实践理论大纲 [M]. 高振华，李思宇，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13−214.

[46] 沈甜雨，李志伟，等 . 具身智能驾驶 : 概念、方法、现状与展望 [J].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报，2024（1）：17−32.

[49] 马丁・海德格尔 . 海德格尔说存在与思 [M]. 颜东升，译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230.

[52] 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 对空言说 [M]. 邓建国，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08−209.

[54] 克里斯・希林 . 身体与社会理论 [M]. 李康，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7.

[55] 刘海龙，谢卓潇，等 . 网络化身体 : 病毒与补丁 [J]. 新闻大学，2021（5）：40−55.

[56] 孙玮 . “异类”的交互与共生 : 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 [J]. 学术研究，2023（10）：58−62.

[57] 朱琳，袁艳 . 为 AI 而生——“智伴爸爸”研发工程师的多元男性气质 [J]. 国际新闻界，2023（4）：50−66.

[58] 曾一果，王可心 . 心“真”是归处 : 一种情感真实主义的人机亲密关系阐释路径 [J]. 现代传播，2024（9）：123−131.

[60] 陈卫星 . 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 [J]. 全球传媒学刊，2015（1）：1−19.

[62] 施蒂格・夏瓦 . 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 [M]. 刘君，李鑫，漆俊邑，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9−41.

[63] 马丁・海德格尔 .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王庆节，译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2014：62−69.

How Does Embodied Intelligence Embody itself: Ontological Practice and Phenomenological Explanation of Technical Media——Exploring a Dynamical Thought of Embodied Media

Lv Qingy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mbodied intelligence enables intelligent agents to enter the human world in a physical manner and also allows the ontological practice of technical media to enter the academic vision. From body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echnical media in embodied practice, restores the phenomenal nature of technical media as a bodily intuition, and reveales the embodied logic of the ontological practice of technical media. As a functional subject that exists among human bodies, the technical media continuously constructs its own body schema through sensory presence, consciousness manifestation and behavioral acquisition, which also makes the ontological practice of the technical media increasingly present the embodied logic of perceptual change, thought translation and habitual orient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evelops a dynamical thought of embodied media, incorporating technical media into th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paradigm of body ontology, endowing it with the theoretical qualities of primitiveness, ambiguity and self-interest, and thus allowing technical media to continuously reach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in the heterogeneous network and multiple boundaries of human-computer coexistence.
Keywords: embodied intelligence; technical media; ontologization; embodied practice; phenomenological explanation
Author: Lv Qingyu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上接第 37 页）

"parallel logic", being both distinct from the "distillation" and "progression" logics of mass media. The study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while we write with WeChat, we are also writing for WeChat. The programming practices of digital covers embody a novel terminal consciousness that transcends the organizational rules of textual code, aiming to develop a "surface-level" media infrastructure.
Keywords: WeChat news; digital cover; media logic; phenomenology of practice
Authors: Luo Shicha,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 Y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职业需求与技术器用的适配和内化：“接触－感知”因素影响下传媒从业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研究 1）

邓秀军　赵悦言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传媒行业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入的影响。合理应对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有利于提升传媒从业者的工作效率。本文在技术接受模型（TAM）的基础上，整合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三个媒介技术接触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媒介技术感知因素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纳意愿模型，探究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生成机制。结果表明：媒介技术接触对媒介技术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介技术感知对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纳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媒介技术感知在媒介技术接触和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纳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传媒从业者；媒介采纳；职业需求；技术器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邓秀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 100089；赵悦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人工智能是指通过一系列计算机算法模拟人的思想和行动的智能，本质特征是“类人大脑的思维性和类人存在实体性的结合”[1]。生成式人工智能改变了人类既有的内容生产方式[2]，其核心内涵是指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自动生成文本、图像、视频或音频内容[3]。由于系统的内容创作能力主要由海量数据和人机互动训练而成，生成式人工智能难免遭遇虚假信息、歧视与偏见、隐私泄露与版权侵害等系统性风险，并会以累积性的方式爆发[4]。如今，以 ChatGPT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应用产品的崛起，前所未有地提升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整体渗透率，冲击以内容原创为主要工作的传媒从业者。是被机器的高效复制所替代，还是合理利用它们的高效内容生产性能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服务？——这是传媒从业者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传媒从业者指在传媒组织（其性质包括：事业单位、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工作的管理者与员工，其主要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新媒体、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话语构建、叙事策略与效果评价研究”（24&ZD214）

影视、报刊广播、出版等[5]。传媒行业从业者的具体工作岗位包括：在传统媒体从事报纸、广播、杂志的编辑出版等工作；在商业性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从事产品内容运营、企业宣传等工作；在公关、广告公司从事活动策划、广告投放、媒体运营等工作；在新媒体平台从事内容生产和信息传播相关工作[6]。

对于传媒从业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能在内容创作、图像生成、数据处理等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成为分担工作和提升效率的工具。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带来披露未许可、虚假不真实、偏见放大、偏差隐藏、被恶意使用等风险问题[7]。更为重要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产领域的整合制作和批量生产，可能会抢夺甚至取代以内容创作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传媒从业者的就业机会。因此，需要探究哪些因素决定和影响了传媒从业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这些影响因素之间又有着怎样的互动机制？本文选择传媒从业者作为调查对象，从技术接触和感知的视角，探究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生成机制。

一、媒介采纳与传媒从业者的媒介采纳文献综述

采纳是指个体或群体接受并开始使用一个新的想法、产品或服务。媒介采纳指个人或群体开始使用新的媒介渠道，如互联网、社交媒体、新闻应用等，关注的重点是媒介技术的社会整合。媒介技术的采纳通常与较高的数字成熟度和身份认同建构密切相关，知识阶层的身份认同和新技术采纳交织互动，形成了带有强烈社会文化色彩的新媒介技术采纳过程[8]。

一般而言，基于技能习得成本和职业岗位丢失风险的考量，传媒从业者不会是新技术的积极采纳者，而是选择和借用已经被其他行业证明行之有效的技术[9]。因此，现有研究大多从创新扩散理论（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和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的角度来展开，如利奈特·霍尔曼（Lynette Holman）等考察了记者对技术的使用，以及他们如何将自己视为创新的接受者[10]。严三九等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探究影响新闻工作者使用 ChatGPT 新闻生产的意愿[11]。翁昌寿呈现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出版业扩散的路径、出版业采纳智能内容科技的实践与布局，由此进一步洞察传媒从业者与人工智能生成所构成的新型人机关系[12]。在人工智能技术协助下传媒从业者可以花更少时间完成工作，有更多自由时间去思考、承担智力性工作，或者娱乐休闲，从而有效降低内容生产和人力资源的维护成本[13]。在信息采集、加工、审核、反馈等环节，生成式人工智能均逐渐辅助或部分替代人力，呈现出由“以人主导”转向“人机协作”的新特征[14]。

如今，在去中心化的内容生产机制下，“人人皆为媒体”成为可能，大量内容生产者依附于平台创作内容，推动了内容数据量的高速增长，为传媒从业者采纳智能推荐算法提供了土壤[15]。创作可能成为个体与算法、数据和机器学习系统紧密交织的产物。传媒从业者既是信息的生产者也是信息本身，他们的传媒实践能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大量的数据支持。

综上所述，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越来越多的传媒从业者所了解。现有关于媒介采纳与传媒从业者媒介采纳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但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已有研究对媒介采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社交媒体[16][17]、人工智能的采纳方面[18][19]，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相对较少。部分学者选择在工作[20]和消费[21]等场景中检验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的采纳意图和行为，少许成果分析了在企业经营、医疗保健以及艺术设计等情境下用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行为[22]。二是目前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和行为的实证量化研究较少，主要探究政府公职人员[23]、出版从业者[24]、科研人员[25]、新闻工作者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出版从业者和新闻工作者也属于传媒从业者的范畴，但未从传媒从业者整个群体的视角进行研究，如广告、影视制作从业者也属于传媒从业者，

已有研究并未对其进行量化研究。虽然传媒从业者本身不是一个同质化很强的群体，但共处一个有着明确边界的行业，以及从事内容生产和信息传播这样的核心工作内容。由于从事工作的属性，他们在面对技术变迁、媒介采纳等问题上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的认知共性。因此，探究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具有突出的理论探索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选择传媒从业者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纳意愿，以期进一步了解和分析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由戴维斯（Fred D. Davis）提出，它建立在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简称 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 TPB）之上，旨在更好地解释信息技术在组织环境中的采纳与使用。在 TAM 中，核心要素包括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26]。感知有用性指的是人们认为使用某一特定系统会提升他们的工作效率，而感知易用性则涉及使用该系统的难易程度。外部因素可以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进而影响用户对技术的态度和使用意愿，最终导致技术使用行为的发生（图 1）。

有学者认为媒介使用能影响用户的认知、情感、心理和行为结果[27]。媒介可以通过对公众主观认知的建构，影响个体的行为决策[28]，并对其左、右意识形态产生显著影响[29]。媒介信息不仅会影响感知，还会通过感知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应对行为。除了媒介接触外，技术接触对感知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用户认为信息技术能够满足完成任务的需求时，就会提高对使用结果的预期，进而产生使用这一技术的意愿[30]。史燕伟等人认为，员工需要适应数字技术催生的新生产方式，正确认识并使用技术处理数字化工作，提高工作绩效[31]。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的变量结构可知，TAM 模型在 TRA 模型基础上发展而来[32]，旨在探索和分析人们接受并使用新技术的动机和因素，以及预测他们的技术使用行为[33]。多数学者认为，TAM 模型舍弃 TRA 模型中的主观规范是一个缺陷，在组织以及社会情境中，用户很容易受到同事、主管以及其他人员的影响[3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TAM 模型是对用户的心理认知行为的概括，却忽略了用户的个体差异以及对任务的认知差异[35]。因此，维斯瓦纳特·文卡特什（Viswanath Venkatesh）和希洛尔·巴拉（Hillol Bala）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了修正，将主观规范纳入数据模型之中[36]。在传媒行业这一高组织协同、高时间压力、高内容风险的职业体系中，主观规范不仅反映了组织文化与行业期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从业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接受态度。

任务技术适配模型（Task-Technology Fit，简称 TTF）是一种用于评估技术与任务之间匹配程度的理论框架，它和 TAM 模型都可以用于研究和解释信息技术采纳与使用。在传媒工作中，只有当技术工具真正贴合任务目标，如辅助写作、快速选题、内容润色，从业者才可能愿意使用。值得注意的是，TTF 模型考虑没有充分考虑用户对信息技术自身的认可情况，显然 TAM 刚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与 TTF 相互补充。故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 TAM 与 TTF 模型整合能更好地解释信息技术的使用行为[37]。所以，除 TRA 模型外，TTF 模型和 TAM 模型二者结合也能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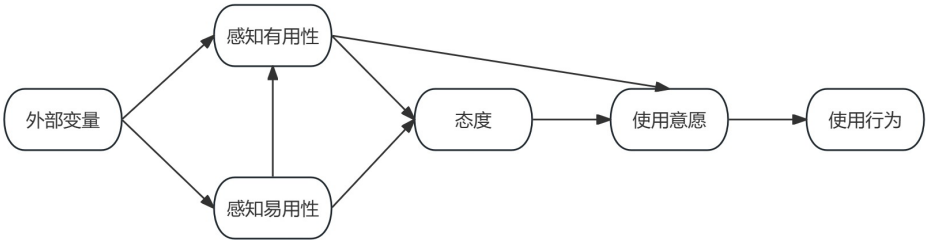

图 1　技术接受模型的变量结构图

力地解释使用者对新技术的采纳意愿和使用行为[38]。

可供性研究则提供了媒介与人类复杂互动的敏锐洞察，从技术特性与关系维度展现了平台和用户之间的感知、行动和交往[39]。对于传媒从业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提供的操作接口、内容生成能力以及可定制化程度，构成了其感知可供性的核心内容。从可供性视角出发，有助于弥补 TAM 与 TTF 模型对社会文化与互动过程关注不足的理论盲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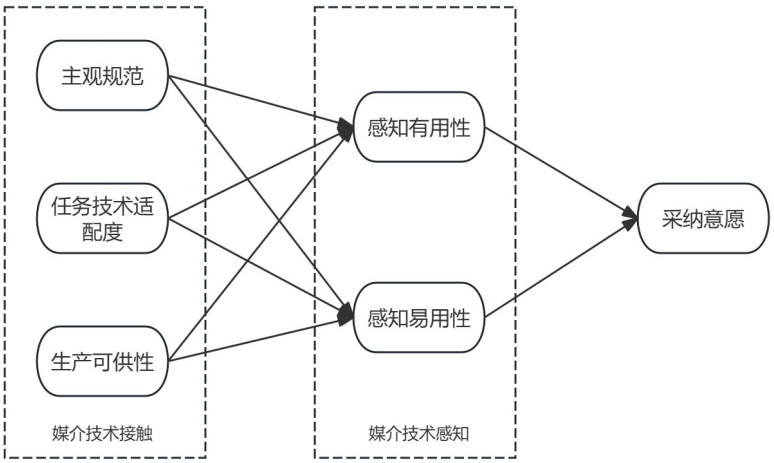

图 2　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研究理论模型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且快速演进的内容生成技术，相较以往的信息技术具有更复杂的感知特性与应用场景。同时，传媒从业者的职业边界正在经历从传统新闻采编岗位向新媒体创作、平台运营等方面延展。相较于新闻工作者，传媒从业者在组织背景、工作任务、技术接触频率等方面呈现出较高的异质性。传统理论模型在解释该群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纳意愿时，可能存在解释维度不足或变量适配度不高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单纯使用技术接受模型来阐释采纳意愿的不足逐渐显现[40]。技术接受模型追求简洁性与易操作性的同时，忽略了个体认知结构和社会环境影响等更加多元的因素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产生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自身对技术使用的影响[41]。

基于此，本文引入更具复合性与适配度的理论组合，将 TRA 模型里的主观规范、TTF 模型里的任务技术适配和可供性理论中的生产可供性概括为媒介技术接触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理论模型，以更好贴合当下传媒生态的复杂多样性。媒介技术接触是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通过物理使用、信息获取或社会互动等方式，对媒介技术产生认知、体验或感知的初步过程。这种接触不仅包括对技术设备本身的操作使用，如登录、试用、浏览等，也涵盖对该技术所承载内容、功能与用途的理解与评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作为媒介技术感知因素，同样会影响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意愿。媒介技术感知因素是个体在媒介技术使用或接触过程中，基于其认知经验、任务情境与社会文化背景，对该技术的功能属性、操作体验与潜在效用所形成的主观评价维度。由于以往文献研究证明，使用态度对用户采纳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42]，一些学者在整合模型时也没有将态度变量纳入其中。本文在构建模型时也舍弃了使用态度变量，整合后的模型包括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采纳意愿 6 个变量（图 2）。其中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为自变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为中介变量，采纳意愿为因变量。为确保整合模型的合理性，本文也将对整合模型进行信效度检验和模型拟合检验，确保模型的适用性和准确性。

（二）研究假设

1. 主观规范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主观规范指同伴或社会压力会作用于个体的使用意愿并影响个体的行为[43]。对于传媒从业者而言，主观规范的压力主要来源于周围同事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情况、领导和机构内部对使用该项技术的态度[44]。泰奥（Timothy Teo）揭示了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5]。姜勤勤等人研究发现

主观规范对人们的感知有正向影响[46]。在传媒行业中，从业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行为往往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判断，而是受到同事、领导、朋友等人的影响。当生成式人工智能逐步被同事广泛应用于选题策划、文案生成、标题优化等日常传媒生产流程中，尚未使用该技术的从业者可能会感觉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而产生采纳动机。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主观规范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主观规范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易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 任务技术适配度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任务与技术适配度出自古德休（Dale L. Goodhue）和汤姆逊（Ronald L. Thompson）提出的任务技术适配模型，用于衡量新技术是否能够支持用户完成任务[47]。任务特征与技术特征的高度匹配对用户使用信息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48]。对于传媒从业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纳并非基于抽象的技术评价，而是根植于实际的内容生产任务，如快速生成新闻稿、辅助撰写短视频脚本、提供选题灵感或图文润色等。若从业者感知到该技术能有效提升写作效率、减轻编辑负担、提高传播成效，即表现出良好的任务技术适配度，那么他们对该技术的有用性与易用性评价也将同步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任务技术适配度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任务技术适配度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易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 生产可供性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可供性概念源于生态心理学，着重关注环境和生物之间的关系。可供性被广泛用于分析媒介技术提供的功能与用户为达成各种目的所需进行的操作之间的互动关系[49]。潘忠党将新媒体的可供性界定为三个层面：信息生产的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即在时空点上的自由度[50]。其中，生产的可供性包含可编辑、可审阅、可复制、可伸缩、可关联[51]。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可供性视角分析影响技术或者媒介采纳意愿的因素和作用机制[52]。在传媒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呈现出的生产可供性，如自动文本生成、语义优化、图文匹配、风格转换等，为传媒从业者提供了丰富的操作可能性与创作路径。这种功能上的可编辑、可扩展、可快速生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容生产门槛，提高了创作效率，能促使从业者更积极地尝试将其嵌入日常工作流程。因此，生产的可供性可能作为自变量，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来影响传媒从业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生产可供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生产可供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易用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采纳意愿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用户行为意向具有重要影响[53]。孙佼佼等人认为，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其采纳意愿[54]。张逾千认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人的使用意愿产生积极影响[55]。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用户在面对新技术时，如果能明确感知其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降低操作难度，便更可能转化为具体的采纳意愿。对于传媒从业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若能在选题构思、文案撰写、素材生成、图文润色等方面展现出实际效能，便更容易被从业者视为有用的工具。同时，若该技术操作简便、界面友好、融入现有工作流程的门槛较低，从业者也将更倾向于认为其易于使用，进而产生采纳意愿。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采纳意愿。

H8：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采纳意愿。

5.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在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与采纳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在 TAM 模型中，感知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

不仅直接影响用户的采纳意愿，还在外部情境因素与采纳行为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卡拉汉娜（Elena Karahanna）等人认为，主观规范对用户的接受意愿有正向影响[56]。赵建民等认为，任务技术适配通过态度（对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感知）会间接影响行为意向[57]。蒋俏蕾等人则从可供性视角出发，强调人与技术的关系是动态的，其本质在于技术特性、使用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构成[58]。在传媒行业，由于信息传播通常需要各个部门或组织合作进行，因此领导、同事等群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容易影响从业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并进而影响其采纳行为。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任务技术适配度越高，从业者越可能感知该技术对工作效率的提升，强化其正向采纳意愿。而生产可供性则可能影响着传媒从业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好不好用”“值不值得用”的认知判断。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9：感知有用性在主观规范和采纳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10：感知有用性在任务技术适配度和采纳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11：感知有用性在生产可供性和采纳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12：感知易用性在主观规范和采纳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13：感知易用性在任务技术适配度和采纳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14：感知易用性在生产可供性和采纳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技术迭代与行业变革拓展了传媒从业者的属性与边界。因此，本文依托上述文献，将传媒从业者界定为在传统媒体（从事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的编辑出版等工作）、商业性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从事产品内容运营、企业宣传等工作）、广告公关公司（从事活动策划、广告投放、媒体运营等工作）、新媒体平台（从事内容生产和信息传播等工作）的从业者。本文选取在该范围内有过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经历的群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影响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的因素。

表 1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媒从业者采纳意愿测量量表

变量	序号	测量题项目
主观规范 Subjective Norms	SN1	对我有影响的人（老师、领导等）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SN2	对我很重要的人（家人、朋友等）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SN3	对我很重要的人（家人、朋友等）推荐我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SN4	周围的人都在使用或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我必须跟上时代
任务技术适配度 Task-Technology Fit	TTF1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我工作所需要的
	TTF2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我的工作要求
	TTF3	我能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找到所需信息
	TTF4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我来说是适用的
生产可供性 Production Availability	PA1	生成式人工智能允许我编辑我想要交流的信息
	PA2	生成式人工智能保留了我可以回去查看的交流记录
	PA3	生成式人工允许我复制我想要的信息
	PA4	生成式人工智能允许我个性化生成我想要的内容
	PA5	生成式人工智能让我可以通过与他人配合创作内容
感知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PU1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让我找到更值得传播的新闻信息
	PU2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的信息可以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PU3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让我获得更丰富的信息和材料
	PU4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更快地获取特定所需的信息
感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1	我很容易就能学会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PEOU2	我觉得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操作清晰易懂
	PEOU3	我觉得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很简单
	PEOU4	我很容易就能熟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采纳意愿 Adoption Intention	AI1	我愿意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2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传媒从业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3	我会推荐其他传媒从业者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一）问卷题项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理论模型中的各因素进行测量，整合后的模型包含 6 个变量。其中，自变量为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等三类媒介技术接触因素；中介变量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类媒介技术感知因素；因变量为采纳意愿。主观规范、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的测量题项改编自刘慧悦等人的研究 [59]；生产可供性的测量题项依据潘忠党的界定改编自陈梦等人的研究 [60]；任务技术适配度、采纳意愿的测量题项改编自徐菲菲等人的研究 [61]。以上题项均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从很不同意（1）到很同意（5）。

（二）预调研

为了提高问卷的信度与效度，保证问卷的可行性，本研究在正式发放问卷之前主要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对传媒从业者进行了小范围预调研，共回收 85 份问卷，有效问卷 8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3%。前测阶段使用 SPSS27.0 对问卷结果做了信效度分析，其中 Cronbach's α 值为 0.948，KMO 值为 0.906，大于 0.7，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在 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主成分因子分析，发现本次问卷中的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4，说明题项基本合理。由于本研究预调查范围有限，且主要目的是确定题项是否合理，故不进行因子模型拟合检验，因子模型拟合检验将在正式问卷发放后进行。

（三）正式调研

正式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线上发放，主要依托以下几种渠道进行：首先，研究者利用现有的传媒行业人脉资源，在传媒从业者微信群、QQ 群发送问卷链接，并请求他们帮助转发；其次，通过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平台发布招募信息，吸引具有传媒背景的用户参与填写；再次，借助微信、QQ 等社交工具进行一对一邀请，以提升回收率与填答质量。问卷发放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12 日至 2024 年 5 月 12 日，历时一个月，最终共回收到 423 份问卷，剔除掉回答时间过短和题项全部选择一致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为 395 份，有效率为 93.4%。

从样本特征分布描述（表 2）可以看出：在性别分布上，总体性别比例较为均衡，其中男性 170 人，女性 225 人，占比分别为 43.0% 和 57.0%；在年龄分布上，集中在 31—40 岁，占比 40.0%，51—60 岁样本数量最少，占比 9.9%；在文化程度分布上，本科 / 专科数量最多，占比 69.9%；在传媒从业者来源分布上，商业性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相关从业者最多，占比 32.4%，

表 2　样本特征分布描述（N = 395）

变量	选项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70	43.00%
	女	225	57.00%
年龄	21—30 岁	80	20.30%
	31—40 岁	158	40.00%
	41—50 岁	118	29.90%
	51—60 岁	39	9.90%
文化程度	本科 / 专科	276	69.90%
	硕士研究生	80	20.30%
	博士研究生	39	9.90%
传媒从业者来源	传统媒体（从事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工作）	62	15.70%
	新媒体平台（从事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等工作）	97	24.60%
	商业性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从事内容运营、企业宣传等工作）	128	32.40%
	广告、公关公司（从事活动策划、广告投放、媒体运营等工作）	108	27.30%
从事传媒工作年限	1—5 年	221	55.90%
	6—10 年	110	27.80%
	11—15 年	52	13.20%
	16—20 年	6	1.50%
	20 年以上	6	1.50%
工作地区	华北地区	73	18.50%
	东北地区	85	21.50%
	华东地区	64	16.20%
	华中地区	31	7.80%
	华南地区	46	11.60%
	西南地区	63	15.90%
	西北地区	33	8.40%

该数据正反映了当前传媒行业向平台化、市场化发展的结构性趋势。互联网平台及商业内容公司凭借技术驱动和用户导向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媒体内容创作者与运营人员，成为新兴传媒生态中的主力军；在从事传媒工作年限分布上，1—5 年和 6—10 年占比较大，分别为 55.9%、27.8%；在工作地区分布上，东北地区占比最多，为21.5%。根据以上样本特征，该调查的样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传媒从业者群体。

（四）差异性分析

为了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传媒从业者来源、从事传媒工作年限和工作地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上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对各个维度进行方差分析，其中性别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而其他变量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根据表3可以发现，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传媒从业者来源、从事传媒工作年限和工作地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上没有明显差异，其显著性均大于 0.05。这一结果表明，传媒从业者的基本人口属性对其是否愿意采纳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并未构成决定性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兴技术，目前仍处于快速传播与探索应用阶段，因此不同传媒从业者群体之间的差异可能尚未显著显现；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通常具备低门槛、高易用性的特点，使得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背景的传媒从业者在接触与理解层面具有相对均衡的起点，从而降低了因个体背景异质性带来的差异。

四、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信效度检验

为了检测理论模型，必须确定信度和效度。

表 3　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差异性分析

变量	选项	频率	M ± SD	F/t	p
性别	男	170	3.206 ± 1.101	−1.861	0.064
	女	225	3.406 ± 1.025		
年龄	21—30 岁	80	3.363 ± 1.101	0.223	0.881
	31—40 岁	158	3.344 ± 1.105		
	41—50 岁	118	3.294 ± 1.026		
	51—60 岁	39	3.214 ± 0.922		
文化程度	本科 / 专科	276	3.318 ± 1.058	0.543	0.581
	硕士研究生	80	3.254 ± 1.077		
	博士研究生	39	3.470 ± 1.064		
传媒从业者来源	传统媒体（从事报纸、广播、杂志等工作）	62	3.419 ± 0.997	0.224	0.88
	新媒体平台（从事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等工作）	97	3.309 ± 1.017		
	商业性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从事内容运营、企业宣传等工作）	128	3.307 ± 1.140		
	公关、广告公司（从事活动策划、广告投放、媒体运营等工作）	108	3.287 ± 1.050		
从事传媒工作年限	1—5 年	221	3.308 ± 1.072	1.01	0.402
	6—10 年	110	3.436 ± 1.082		
	11—15 年	52	3.103 ± 0.989		
	16—20 年	6	3.611 ± 1.042		
	20 年以上	6	3.222 ± 0.834		
工作地区	华北地区	73	3.466 ± 1.055	1.239	0.285
	东北地区	85	3.251 ± 1.036		
	华东地区	64	3.177 ± 1.080		
	华中地区	31	2.989 ± 1.066		
	华南地区	46	3.471 ± 0.975		
	西南地区	63	3.413 ± 1.100		
	西北地区	33	3.374 ± 1.111		

本研究中的6个变量，即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采纳意愿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59、0.858、0.893、0.860、0.867、0.843，量表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均大于0.7，表明量表信度较高。运用SPSS27.0软件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KMO指数为0.923，Bartlett球体检验中的显著度Sig.= 0.000（p<0.05），说明量表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接着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统计标准，最终得到6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1.582%，大于50%，且6个变量涉及的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4，满足因子载荷要求，未发现横跨因子现象。用AMOS26.0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量表进行模型适配度检验，得出χ^2/df=0.993（<3），RMSEA=0（<0.05），CFI=1（>0.9），TLI=1（>0.9），说明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量表CFA模型具有良好适配度的前提条件下，将进一步检验量表各个维度的收敛效度（AVE）和组合信度（CR）。本文计算出的组合信度（CR）均大于0.7，收敛效度（AVE）均大于0.5，达到标准（表4），说明模型的收敛效度较好。

在区分效度校验中，各个维度两两之间的标准化相关系数均小于各个变量的AVE的平方根（表5左上角连接右下角的对角线上的粗体数字），因此说明各个维度之间均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假设检验

1. 相关性检验

本研究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探究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采纳意愿之间的相关关系。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维度均具有相关性（表6）。

2. 结构方程模型检测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简称SEM）是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本研究使用AMOS26.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以上提出的研究假设。

通过检测，结构方程模型的模拟拟合系数分别为：χ^2/DF=1.115（<3）、RMSEA=0.017（<0.05）、GFI=0.951（>0.9）、IFI=0.995（>0.9）、NFI=0.951（>0.9）、CFI=0.995（>0.9）均达到标准要求。从假设检验结果来看（图3和表

表4　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量表各个维度收敛效度和组合信度检验

路径			标准化系数	AVE	CR
SN1	<---	主观规范	0.786	0.604	0.859
SN2	<---	主观规范	0.771		
SN3	<---	主观规范	0.763		
SN4	<---	主观规范	0.789		
TTF1	<---	任务技术适配度	0.794	0.602	0.858
TTF2	<---	任务技术适配度	0.763		
TTF3	<---	任务技术适配度	0.775		
TTF4	<---	任务技术适配度	0.770		
PA1	<---	生产可供性	0.760	0.626	0.893
PA2	<---	生产可供性	0.786		
PA3	<---	生产可供性	0.804		
PA4	<---	生产可供性	0.803		
PA5	<---	生产可供性	0.801		
PU1	<---	感知有用性	0.790	0.606	0.86
PU2	<---	感知有用性	0.758		
PU3	<---	感知有用性	0.814		
PU4	<---	感知有用性	0.751		
PEOU1	<---	感知易用性	0.811	0.62	0.867
PEOU2	<---	感知易用性	0.748		
PEOU3	<---	感知易用性	0.787		
PEOU4	<---	感知易用性	0.801		
AI1	<---	采纳意愿	0.797	0.643	0.844
AI2	<---	采纳意愿	0.818		
AI3	<---	采纳意愿	0.790		

7），主观规范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β=0.173，P < 0.05）、感知易用性（β=0.275，P < 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任务技术适配度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β=0.263，P < 0.05）、感知易用性（β=0.177，P < 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产可供性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β=0.309，P < 0.05）、感知易用性（β=0.353，P < 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采纳意愿（β=0.162，P < 0.05；β=0.198，P < 0.05），假设 H1 到 H8 成立（表 7）。

表 5　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量表各个维度区分效度检验

变量	主观规范	任务技术适配度	生产可供性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采纳意愿
主观规范	**0.777**					
任务技术适配度	0.493	**0.776**				
生产可供性	0.432	0.463	**0.791**			
感知有用性	0.423	0.481	0.486	**0.730**		
感知易用性	0.504	0.462	0.529	0.533	**0.787**	
采纳意愿	0.479	0.494	0.478	0.489	0.523	**0.802**

注：对角线上的数字为 AVE 的平方根。

表 6　各个维度之间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维度	主观规范	任务技术适配度	生产可供性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采纳意愿
主观规范	1					
任务技术适配度	.424**	1				
生产可供性	.380**	.404**	1			
感知有用性	.361**	.415**	.428**	1		
感知易用性	.436**	.398**	.463**	.464**	1	
采纳意愿	.405**	.421**	.417**	.421**	.447**	1

注：**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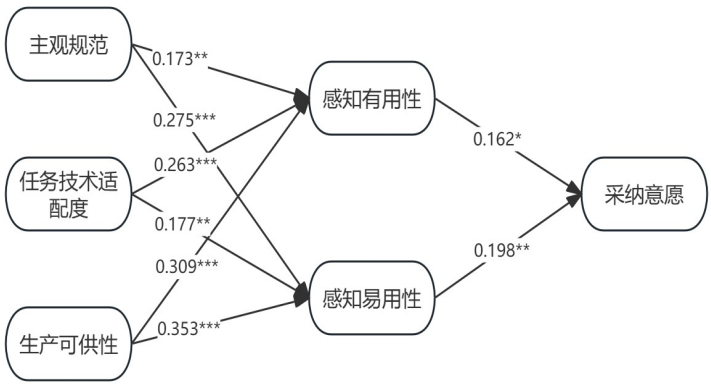

图 3　模型检验结果

3.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媒介技术感知（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在媒介技术接触（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和生产可供性）与采纳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SPSS 的 Process 插件，使用 Bootstrapping 方法来分析中介效应，进行了 5000 次重复样本抽取，设定置信区间为 95%。

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在各个模型中，预测变量均显著影响结果变量（表 8），且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括 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表 9）。因此，假设 H9 到 H14 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研究整合创建了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研究的理论模型，选择了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和生产可供性三个媒介技术接触因素作为自变量，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两个媒介技术感知因素作为中介变量，生成式人工智

表 7　假设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系数	S.E.	C.R.	P
感知有用性	<---	主观规范	0.173	0.061	2.773	0.006
感知易用性	<---	主观规范	0.275	0.063	4.484	***
感知有用性	<---	任务技术适配度	0.263	0.067	4.055	***
感知易用性	<---	任务技术适配度	0.177	0.066	2.871	0.004
感知有用性	<---	生产可供性	0.309	0.058	5.033	***
感知易用性	<---	生产可供性	0.353	0.059	5.913	***
采纳意愿	<---	感知有用性	0.162	0.070	2.509	0.012
采纳意愿	<---	感知易用性	0.198	0.070	2.893	0.004

注：*p<0.05，**p<0.01，***p<0.001。

表 8　中介模型检验结果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t	R^2	F
感知有用性	主观规范	0.359	7.671***	0.130	58.850***
采纳意愿	主观规范	0.318	6.205***	0.251	65.692***
	感知有用性	0.348	6.749***		
采纳意愿	主观规范	0.443	8.780***	0.164	77.093***
感知有用性	任务技术适配度	0.414	9.047***	0.172	81.854***
采纳意愿	任务技术适配度	0.326	6.175***	0.254	65.741***
	感知有用性	0.328	6.200***		
采纳意愿	任务技术适配度	0.462	9.190***	0.177	84.450***
感知有用性	生产可供性	0.425	9.379***	0.183	87.972***
采纳意愿	生产可供性	0.317	5.972***	0.246	63.969***
	感知有用性	0.327	6.129***		
采纳意愿	生产可供性	0.456	9.093***	0.174	82.675***
感知易用性	主观规范	0.549	9.600***	0.190	92.152***
采纳意愿	主观规范	0.284	5.354***	0.254	66.836***
	感知易用性	0.347	6.889***		
采纳意愿	主观规范	0.443	8.780***	0.164	77.093***
感知易用性	任务技术适配度	0.420	8.591***	0.158	73.813***
采纳意愿	任务技术适配度	0.317	6.132***	0.270	72.421***
	感知易用性	0.345	7.063***		
采纳意愿	任务技术适配度	0.462	9.190***	0.177	84.450***
感知易用性	生产可供性	0.488	10.349***	0.214	107.108***
采纳意愿	生产可供性	0.293	5.439***	0.256	67.408***
	感知易用性	0.336	6.577***		
采纳意愿	生产可供性	0.456	9.093***	0.174	82.675***

能的采纳意愿作为因变量，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检验和分析了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的影响因素。研究揭示，媒介技术接触正向影响媒介技术感知，并通过媒介技术感知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传媒从业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

1. 生产可供性作为影响最大的媒介技术接触因素

媒介技术接触因素三个变量中，生产可供性对媒介技术感知（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最大，且是显著的正向影响（β 均大于 0.3）。研究结果表明，组织或个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能够获取和控制的资源限制和影响。可供性本身指向了技术驱动的需求因素，包含了技术、使用者和用户等多重维度的连接[62]。斯蒂菲·西格特（Steffi Siegert）认为要理解社交媒体的可供性，就必须考虑媒体及其所创造的情境[63]。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中，当传媒从业者感知到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持时，他们更有可能认为该媒介有用。并且生产可供性还关联着传媒从业者对媒介的依赖程度，良好的信息支持系统能够增强其对媒介的信任感和依赖性，是推动媒介接受和持续使用的关键因素。杨雅等人认为，可供性可以直接预测感知价值，进而正向影响其持续使用意愿[64]。陈梦等人则认为，社交媒体使用动机与可供性之间存在差异，人格在塑造个体的使用动机和可供性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供性作为对环境与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新兴阐释力，在实践应用中被不断开拓出新的解释路径，进

表 9 总效应、直接效应及中介效应分解表

路径	效应	非标准化系数	SE	Bootstrap95%CI		占总效应比率	中介作用
				LLCI	ULCI		
SN-PU-AI	总效应	0.443	0.050	0.344	0.542		部分中介
	直接效应	0.318	0.051	0.217	0.419	71.78%	
	间接效应	0.125	0.025	0.080	0.177	28.22%	
TTF-PU-AI	总效应	0.462	0.050	0.323	0.560		部分中介
	直接效应	0.326	0.053	0.222	0.430	70.56%	
	间接效应	0.136	0.027	0.086	0.189	29.44%	
PA-PU-AI	总效应	0.456	0.050	0.358	0.555		部分中介
	直接效应	0.317	0.053	0.213	0.421	69.52%	
	间接效应	0.139	0.028	0.090	0.198	30.48%	
SN-PEOU-AI	总效应	0.443	0.050	0.344	0.542		部分中介
	直接效应	0.284	0.053	0.180	0.388	64.11%	
	间接效应	0.159	0.027	0.108	0.213	35.89%	
TTF-PEOU-AI	总效应	0.462	0.050	0.363	0.560		部分中介
	直接效应	0.317	0.052	0.215	0.148	68.61%	
	间接效应	0.145	0.025	0.097	0.197	31.39%	
PA-PEOU-AI	总效应	0.456	0.050	0.358	0.555		部分中介
	直接效应	0.292	0.054	0.187	0.398	64.04%	
	间接效应	0.164	0.029	0.110	0.222	35.96%	

行理论完善和发展[65]。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可以支持传媒从业者完成具体任务和目标时，传媒从业者的感知有用性会显著增强。同样，当生成式人工智能易于访问和使用时，感知易用性也会提高，传媒从业者能够不费力地掌握和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由生产可供性直接带来的功能性和易用性，在形成传媒从业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整体评价和采纳意愿中，往往比主观规范和任务技术适配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其在媒介技术接触因素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

2. 主观规范影响最大的媒介技术感知因素是感知易用性

主观规范通过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间接影响行为意向[66]。与媒介技术感知中的感知有用性的影响（β=0.173）相比，主观规范对感知易用性的影响更大（β=0.275）。这一结果与姚兴安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他认为主观规范对老人采用智慧养老服务的感知易用性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在 1% 较强的统计学水平下显著，而对于感知有用性则起到了 5% 的正向显著性促进作用[67]。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学者并未将媒介技术感知同主观规范相勾接，而是将二者作为独立路径去分别探讨各自对行为意愿的影响。里德霍·伊赫桑（Ridho B. Ikhsan）等人认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会影响态度和行为意愿，而主观规范会影响行为意愿和延续意图[68]。唐俊玥等人认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主观规范对行为意愿有影响，且主观规范的影响最大[69]。

本研究揭示：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往往会受到社会环境中重要他人或群体标准的影响。当团体内的意见领袖或多数成员认可并使用特定的媒介时，能够显著提高其他成员对该媒介技术的感知，并相信该媒介能够带来群体认同和社会效益。而且当某项媒介被周围人广泛采用时，其易用性的感知也会因可获得的支持和资源而增强。如果传媒行业普遍认同并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那么即使某些传媒从业者初次接触感觉难以操作，他们也可能在心理上倾向于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易用的。社会认同感不仅减轻了个体对技术难度的感知，也激励他们克服使用上的挑战。

3. 任务技术适配度影响最大的媒介技术感知因素是感知有用性

对媒介技术感知影响第三大的媒介技术接触因素是任务技术适配度，与主观规范的影响方式不同，任务技术适配度对感知有用性的影

响更大（β=0.263）。权国龙等人发现，任务相关性通过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学习者使用图示工具的意向[70]。陈鹤阳也认为，任务技术适配度对于用户的感知有用性有重要影响，能够进一步影响用户的采纳意愿[71]。萨利赫·阿尔卡坦（Saleh Alqatan）等人的研究表明，感知有用性受任务技术适配度的显著影响[72]。

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与传媒从业者的具体任务需求高度匹配时，传媒从业者更可能感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和易用性。和主观规范相比，任务技术适配度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更为直观，即使社会规范或同事的推荐对个体采纳新技术有一定影响，所采用的技术如果与实际工作任务不符，用户感知到的有用性也会相应减少。因此，任务技术适配度是影响感知有用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影响力超过了主观规范。

4. 对采纳意愿影响最大的媒介技术感知因素是感知易用性

媒介技术感知显著正向影响采纳意愿，其中，媒介技术感知中的感知易用性比感知有用性对采纳意愿影响更大（β=0.198）。这与胡潜等人发现的感知易用性通过影响感知有用性进而影响接纳意愿有一定的相关[73]。洪巍等人也证明了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均对用户接受意愿有影响[74]。然而，严三九等人却在研究老年人移动支付采纳意愿时发现，相比于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对采纳意愿的影响更大[75]，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相反。

由此可见，采纳意愿通常会受到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响，但与之前出现的新媒介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采纳对用户的言语组织能力和机器对话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再加上部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内未完全开放使用，因此感知易用性成为影响采纳意愿的关键。对于传媒从业者来说，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两个媒介技术感知因素是预测和解释传媒从业者接受和使用新技术的核心变量。当传媒从业者觉得生成式人工智能既有实用价值又容易操作时，他们更有可能形成强烈的采纳意愿。创新扩散理论也指出，技术的相对优势和兼容性是影响其扩散速度和广度的关键因素。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上得到用户的积极评价时，将显著推动技术的接受和普及，从而正向影响用户的采纳意愿。

（二）讨论

通过以上对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的生成机制分析，可以发现，传媒从业者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的生成主要从横向的适配调试和纵向的认知内化两个向度来展开，传媒从业者一方面要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性能，另一方面还要考量自己所在媒体机构的职业需求。

1. 职业需求与技术器用的适配深刻影响着传媒从业者对媒介有用性的感知

研究结果揭示，在三个媒介技术接触因素中，相比于主观规范（β=0.173），任务技术适配度（β=0.263）和生产可供性（β=0.309）对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有用性影响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当从业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匹配其工作任务的需求时，更容易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实际效能的技术工具，从而提升对其有用性的感知。同样地，当技术本身具备良好的内容生成能力、可编辑性与高扩展性等生产可供性特征的时候，不仅能够满足不同新闻写作、视频制作或传播运营任务的多样化要求，也更容易激发从业者对该技术的使用兴趣与价值判断。相比之下，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相对较弱，说明在传媒从业者采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形成过程中，外部社会压力虽有影响，但不如任务匹配与工具性能本身来得直接与关键。这反映出传媒行业的技术接受更具有任务驱动性与实践导向性的特点。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媒行业的媒体机构多种多样，从业人员也因岗位和工作状态的差异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着截然不同的需求。对于传媒行业某些从事专业化、个性化内容生产的从业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但不是一种改善工作状态的利器，反而是影响事业发展和

剥夺就业机会的致命补刀。对于那些可以或需要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媒从业者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并不是包治百病、药到病除的良药，无论这个工具的功能多么多样和强大，是否适配自己的工作并有效提升工作的效率，才是感知这个工具是否有用最需要考量的因素。

2. 接触内化而成的易用性感知是生成采纳意愿的重要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检验显示，感知有用性在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生产可供性与采纳意愿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28.22%、29.44%、30.48%，而对应的感知易用性的间接效应为 35.89%、31.39%、35.96%，可见感知易用性相比感知有用性是较为重要的中介链接。从这样的结果可以推导出，当传媒从业者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接触后，容易通过其易用程度来决定是否使用。也就是说，即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功能强大且极大可能适配某位传媒从业者，该技术应用的便捷获取和方便使用才是吸引和推动传媒从业者真正使用的主要影响因素。

通常情况下，传媒从业者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易于掌握和操作时，他们更可能愿意采纳和利用这种技术，因为低门槛的技术使用体验减少了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使从业者能够快速获得技术的效益。相比之下，感知有用性虽然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但如果技术难以掌握，即使其潜在的有用性很高，也可能因为使用上的困难而阻碍从业者的接受意愿。因此，传媒从业者接触媒介技术后有关易用性的直接体验往往比对技术效能的预期更能影响从业者对新兴技术的采纳态度，尤其是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快速上手和应用新工具时。这种对易用性的重视反映了传媒从业者在面对新技术时的实用主义倾向，即优先考虑能否无障碍地融入现有工作流程。

3. 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

本研究为传播学的媒介采纳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并扩展了其应用范围，具体理论意义包括：第一，拓展了媒介采纳理论的应用场景。通过将媒介采纳理论应用于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并把调查对象锁定为传媒从业者，敏锐地聚焦到了传媒从业者创意生产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机械复制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激发的学术张力，刷新了对新技术条件下媒介采纳行为的认知和理解。第二，吸纳、整合了媒介技术感知的多个影响因素。梳理了主观规范、任务技术适配度与生产可供性等多个变量对媒介采纳的影响，细致入微地发掘了传媒从业者工作需要与媒介技术功能之间的博弈这一耦合关键点，增加了对媒介采纳复杂性的认识，有助于构建更为全面的理论模型。第三，细化了媒介技术感知的中介变量作用。本文强调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在媒介采纳过程中的中介角色，不仅验证了 TAM 模型中的核心构想，也揭示了特定情境下，感知易用性的突出作用，凸显了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的个性和特性。第四，促进了跨学科的理论融合。将传播学的媒介采纳理论与信息系统（任务技术适配度）、心理学（可供性）中的相关理论进行融合，展示跨学科视角下理论创新的可能性，这对于理解复杂的技术社会现象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和分析工具。总之，本研究不仅加深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如何被传媒从业者采纳的理解，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

本研究目前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只能捕捉到特定时间点的数据，难以分析变量间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关系。第二，样本代表性仍存在一定局限。本研究虽覆盖不同来源的传媒从业者，但仍可能偏重于特定区域或平台类型，影响研究结论的外推性。第三，难以全面探讨影响传媒从业者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纳意愿的所有影响因素，比如传媒从业者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个性化程度，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传媒从业者的感知和接受度有很大影响。第四，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可能会忽略传媒从业者对该媒介技术的个人化体验和复杂化感受，当然这些媒介技术持续使用和深度体验的感受也不是本研究的关注焦点。

基于上述局限，未来研究可引入纵向或混合设计以增强时间维度的解释力、在样本获取

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分层控制与跨平台比较、在变量体系上纳入个体层面的心理与能力因素、在方法论路径上融合定量与定性研究，为理论提供更丰富的实证支撑，以构建更具解释力、适应性与情境穿透力的媒介采纳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李韵奕）

参考文献

[1] 葛许越 . 写作机器人“作者”主体地位辨析 [J]. 探索与争鸣 , 2019 (8): 192−196+200.

[2] 陈慧敏 , 陈祉伊 , 吴宜檬 , 等 .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下国家形象的视觉框架及其效果——基于推特社交媒体平台中国图像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当代传播 ,2025(3):41−48.

[3] 陈积银 , 胡睿心 . 大数据的可视化生成论：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的语图关系新探 [J]. 新闻界 ,2025(8):46−59.

[4] 卢家银 . 美德与规范的内在主义协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传播伦理进路 [J]. 新闻界 ,2024,(08):15−23.

[5] 张锐 , 张美伦 . 智能媒体创新感知与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基于 187 位传媒从业者样本的实证研究 [J].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 ,2022,(02):83−102.

[6] 戴依婷 .AIGC 对传媒职业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D]. 湖南理工学院 ,2024.

[7] 谢梅 , 王世龙 .ChatGPT 出圈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风险类型及其治理 [J]. 新闻界 ,2023(8):51−60.

[8] 强月新 , 胡青山 . 电子革命神话与身份认同下的新技术采纳——基于扎根理论的 ChatGPT 使用者研究 [J]. 新闻大学 , 2023 (4): 59−74+121.

[9] 白红义 . 点击改变新闻业 ?——受众分析技术的采纳、使用与意涵 [J]. 南京社会科学 , 2019(6): 99−108.

[10] Holman L, Perreault G P.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in digital journalism: Technology, roles, and gender in modern newsrooms[J]. *Journalism*, 2023, 24(5): 938−957.

[11] 严三九 , 陶冠男 . 长三角新闻工作者 ChatGPT 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创新扩散理论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4, 46 (3): 13−22.

[12] 翁昌寿 . 人工智能与人类创意：AIGC 创新扩散中——基于出版上市公司 2023 半年度报告及 2022 年度报告的分析 [J]. 中国出版 ,2023(18):16−24.

[13] 张洪忠 , 石韦颖 , 刘力铭 . 如何从技术逻辑认识人工智能对传媒业的影响 [J]. 新闻界 ,2018(2):17−22.

[14] 张勇军 , 李济东 . 价值链视域下人工智能赋能传媒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9):136−146+187−188.

[15] 赖青 . 短视频智能算法推荐的特性与新旧媒体的再融合 [J]. 中国编辑 ,2021(9):17−22+33.

[16] Dwivedi Y K, Ismagilova E, Rana N P, et al. Social media adoption, usage and impact in business−to−business (B2B) context: A state−of−the−art literature review[J].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2023: 1−23.

[17] Al−Qaysi N, Granić A, Al−Emran M, et al. Social media adoption in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isciplines, application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3(73): 102249.

[18] 费建翔 , 刘丙利 , 党同桐 . 何以拥抱：高校教师教学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研究 [J]. 现代教育技术 ,2025,35(5):32−41.

[19] 毛太田 , 汤淦 , 马家伟 , 等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用户采纳意愿影响因素识别研究——以 ChatGPT 为例 [J]. 情报科学 ,2024,42(7):126−136.

[20] Jo H. Understanding AI tool engagement: A study of ChatGPT usage and word−of−mouth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office workers[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23(85): 102067.

[21] Kim J H, Kim J, Kim S, et al. Effects of AI ChatGPT on travelers’ travel decision−making[J]. Tourism Review, 2024, 79(5): 1038−1057.

[22] 代宝 , 杨利英 , 郑怡晴 . 生成式 AI 用户采纳行为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J]. 情报探索 ,2025(3):46−52.

[23] 孙宗锋 , 常远 , 王天琪 . 监管模式何以影响公务员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意愿？——来自调查实验的证据 [J]. 电子政务 ,2025(5):42−56.

[24] 郑汉 , 肖谦 , 贺晨 . 出版从业人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 [J]. 出版科学 ,2025,33(2):57−71.

[25] 郭顺利 , 张雪宁 , 苏新宁 . 科研场景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用户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组态效应分析 [J]. 现代情报 ,2025,45(4):74−86.

[26] Lai P C.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echnology adoption models and theories for the novelty technology[J]. *JISTEM−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7, 14(1): 21−38.

[27] 罗忠勇 , 龙国贻 , 吴拥政 , 等 . 后疫情时代创业者的媒介信息接触与心理健康——基于湖南省 1040 位个体私营企业主的调查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 2023, 30 (10): 73−92+127−128.

[28] 杜智涛 , 罗湘莹 , 苏林森 . 社会期待下的集体行动：媒介接触对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认知建构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 2022, 44 (4): 53−77.

[29] 马得勇 , 陆屹洲 . 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4 (3): 180−192+197.

[30] 闫薇宇 , 吴建华 , 袁勤俭 . 任务技术匹配理论及其在信息系统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展望 [J]. 现代情报 , 2024, 44 (7): 147−154.

[31] 史燕伟 , 谢菊兰 , 王雅妮 , 等 . 数字化工作重塑及其对工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基于人 − 任务 − 技术匹配视角 [J]. 心理科学进展 , 2023, 31 (7): 1133−1145.

[32] 边鹏 . 技术接受模型研究综述 [J]. 图书馆学研究 ,2012(1):2−6+10.

[33] Davis F D, Bagozzi R P, Warshaw P R.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J]. *Management Science*, 1989, 35(8): 982−1003.

[34] 孙建军 , 成颖 , 柯青 . TAM 与 TRA 以及 TPB 的整合研

究 [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 2007 (8): 40-43.
[35] 孙建军 . 网络信息资源利用研究 [D]. 武汉大学 ,2010.
[36] Venkatesh V, Bala H.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3 and a research agenda on interventions[J]. *Decision Sciences*, 2008, 39(2): 273-315.
[37] 赵喜梅 . 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用户信息搜索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TAM 与 TTF 整合模型 [J].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 ,2017,7(2):50-58.
[38] 李雷 , 杨怀珍 , 谭阳波 , 等 . 任务技术匹配理论研究现状述评与趋势展望 [J]. 外国经济与管理 , 2016, 38 (1): 29-41.
[39] 王溥 , 黄丽坤 . 可供性视角下的文化生产平台化：动因、机制与未来 [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38 (1): 146-151.
[40] 吕澄欣 , 吴飞 . 技术何以应用：新闻从业者算法使用意愿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的实证检验 [J]. 传媒观察 ,2025(6):75-87.
[41] 匡文波，吕聪聪，张晗煜 . 新媒体研究的 STIP 模型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34（4）：125-134.
[42] Wu J H, Wang S C. What drives mobile commerce?: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vis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5, 42(5): 719-729.
[43]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44] 宋来慧 . 浙江新闻从业者 AI 技术使用行为研究 [D]. 浙江传媒学院 ,2025.
[45] Teo T.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norm and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on pre-service teachers' attitude toward computer use: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of an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2009, 40(1): 89-109.
[46] 姜勤勤 , 张泽洪 , 熊晶晶 , 等 .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互联网 + 护理服务”患者采纳意愿研究 [J]. 解放军护理杂志 , 2022, 39 (2): 42-45+50.
[47] Goodhue D L, Thompson R L. Task-technology fit and individual performance[J]. *MIS Quarterly*, 1995: 213-236.
[48] 许民利 , 赵亚南 , 简惠云 . 基于任务技术匹配的“互联网 + 回收”价值共创行为研究 [J]. 技术经济 , 2020, 39 (9): 22-30.
[49] Hutchby I. Communicative affordances and participation frameworks in mediated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4(72): 86-89.
[50] 邓秀军 , 关越 . 可供、可见与可接纳：移动短视频用户的旅游意向生成机制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 (12): 136-145.
[51] 潘忠党 , 刘于思 . 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 2017 (1): 2-19.
[52] Mao C M, Hovick S R. Adding affordances and communication efficacy to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o study the messaging features of online patient portals among young adults[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2, 37(3): 307-315.
[53] 刘婷艳 , 王晰巍 , 张雨 . 基于 TAM 模型的直播带货用户信息交互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J]. 现代情报 , 2022, 42 (11): 27-39.
[54] 孙佼佼 , 郭英之 . 文化遗产数字化对国民遗产责任的影响研究——基于 TTF 和 TAM 的模型构建 [J]. 旅游科学 , 2023, 37 (3): 71-85.
[55] 张逾千 . 科研人员 ChatGPT 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D]. 吉林大学 ,2024.
[56] Karahanna E, Straub D W, Chervany N 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cross time: A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 of pre-adoption and post-adoption beliefs[J]. *MIS Quarterly*, 1999: 183-213.
[57] 赵建民 , 张玲玉 . 高校教师对混合式教学接受度的实证研究——基于 DTPB 与 TTF 整合的视角 [J]. 现代教育技术 , 2017, 27 (10): 67-73.
[58] 蒋俏蕾 , 陈宗海 , 张雅迪 . 可供性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J]. 青年记者 ,2023(20):84-86.
[59] 刘慧悦 , 阎敏君 . 移动短视频使用对旅游者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 [J]. 旅游学刊 , 2021, 36 (10): 62-73.
[60] Chen M, Peng A Y. Why do people choose differen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Linking use motives with social media affordances and personalities[J].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023, 41(2): 330-352.
[61] 徐菲菲 , 黄磊 . 景区智慧旅游系统使用意愿研究——基于整合 TAM 及 TTF 模型 [J]. 旅游学刊 , 2018, 33 (8): 108-117.
[62] 喻国明 , 赵睿 . 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 [J]. 学术界 , 2019 (7): 37-44.
[63] Siegert S, Holmgren Caicedo M, Mårtensson Hansson M. Boundaryless twitter use: On the affordances of social media[J]. *Social Sciences*, 2020, 9(11): 201.
[64] 杨雅 , 张晨跃 . 弱连接社交媒体可供性与青年群体的持续使用意愿——线上社会资本与感知价值的链式中介效应 [J]. 学术探索 ,2023(7):49-57.
[65] 杨霞 . 数字时代学习场域“身体—技术”的可供性生产与响应式协商——基于技术可供性视角 [J]. 电化教育研究 , 2024, 45 (6): 34-40.
[66] 严海 , 李为康 , 郝明阳 . 改进计划行为理论下的电单车通勤意向 [J]. 长安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3, 43 (6): 116-128.
[67] 姚兴安 , 苏群 , 朱萌君 . 智慧养老服务采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湖北社会科学 , 2021 (8): 41-53.
[68] Ikhsan R B, Fernando Y, Prabowo H,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banking sector of Indonesia by extending the TAM model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trust[J]. *Digital Business*, 2025, 5(1): 100103.
[69] 唐俊玥 , 韩少华 , 张慧仪 , 等 . 基于 C-TAM-TPB 模型的老年人新能源车消费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J]. 包装工程 ,2025,46(10):120-127+207.
[70] 权国龙 , 王华文 , 顾小清 . 图示工具在协作学习中的影响——基于协作学习项目的调查 [J]. 远程教育杂志 , 2015, 33 (4): 59-66.
[71] 陈鹤阳 . TAM 和 TTF 视角下移动图书馆利用效率研究 [J]. 新世纪图书馆 , 2017 (7): 58-63.
[72] Alqatan S, Noor N M M, Man M, et al.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acceptance of m-commerce among SMTEs by integrating TTF with TA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2017, 26(1): 66-111.
[73] 胡潜，陈钰玮，曹高辉．用户交互信息接收中的感知因素及其影响——基于 TAM 模型的分析 [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5 (2): 36-42.
[74] 洪巍，杜忠莲，吴祐昕．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媒体信息的接受意愿——基于 TRUST&TAM 综合模型 [J]. 系统工程，2016, 34 (3): 142-148.
[75] 严三九，郑彤彤．老年人移动支付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老年人为例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44 (10): 15-26.

Adaptation and Internalisation of Occupational Needs and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tion: A Study of Media Practitioners' Adoption Inten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tact-Perception" Factor

Deng Xiujun，Zhao Yueyan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had a wide an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edia industry. Reasonable response and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help improve the work efficiency of media practitioners.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his paper integrates three media technology contact factors, namely subjective norms, task-technology fit, and production affordance,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wo media technology perception factors, namely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ease of use, as mediating variables,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media practitioners' adoption inten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media practitioners' adoption inten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media technology contac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edia technology perception; media technology percep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media practitioners' adoption inten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edia technology percep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edia technology contact and media practitioners' adoption inten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dia practitioners; media adoption; occupational needs; technological instrumentation
Authors: Deng Xiu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Zhao Yuey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新闻界》ISSN 1007-2438 2025 年第 10 期

尽报界天职：中国首批外派记者与思想界的除旧布新

张振亭　蔡宜静

摘要　外来思想与本土语境的激荡是近代中国思想变革和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方兴未艾的报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新旧过渡和选择性迷茫的 1920 年，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外派一批记者远赴欧美与苏俄，快速传递了一战后世界尤其是苏俄的第一手信息，并以亲身在场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与可接受性。由于兼具记者和学者身份，他们的报道在呈现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剖析和思想甄选，有利于实现从信息接受、认知重构到思想转型的深层转化。上述转变经迅速扩散后，得到全国性回应。外派记者行动不仅营造了求新求变的社会语境，而且提供了撬动思想变革的文本，还产生了意义和象征，为思想界的除旧布新尽到了报界天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早期中国化。新闻界表现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对突破当下“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藩篱，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依然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　外派记者；思想启蒙；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张振亭，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江西南昌 330031；蔡宜静，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西南昌 330031

引言：开启“新纪元”

1920 年 11 月，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发布启事，并在显著位置刊登十九天，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员在外。探取各国舆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隔阂淡漠。此诚我报界之一大缺点也”。有感于此，两报合派记者分赴欧美，承担“调查通讯事宜”，意在“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①。

若论外派记者担任通讯事宜，此次行动显然称不上“新纪元”。创办仅四年的《申报》就曾约请赴美的李圭撰写旅外通讯，“藉以历览其境”以备将来向国内呈献切实信息[1]。民元之后，《申报》《大公报》等亦有外派记者，但多属偶一为之，内容以游记见闻为主。1919 年胡政之以专职记者身份亲临巴黎和会，是为外派专业记者的起点[2]。几乎同一时间，周恩来在法勤工俭学期间作为特约记者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海外通讯。相较之下，两报此次

① 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共同启事 [N]. 晨报 , 1920-11-27(2). 11-28 至 12-14 为头版头条 , 15 日未刊登 , 16 日继续在头版头条刊登。

外派记者达十六人，目的性、组织性强，堪称史无前例的职业化、规模化外派记者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称“新纪元”未尝不可。这一“破天荒”举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动因？两家分处南北、遥距千里的报馆缘何“出钱又出力”？所谓尽报界之“天职”所指为何？他们发回的调查通讯是否达到了助益国人研究世界大势的目的，破除了与世界的“隔阂淡漠”？

上述问题根植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民初的危机使国人“亡国灭种”的焦灼感陡增，除旧布新成为时代命题。正如时人所疾呼：“诸位，旧思想的末日到了，人类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学识，那么现在二十世纪上就要天演淘汰了。”[3]吸收世界新知首先要有新信息，而彼时的传播格局极不利于真确信息的获取。“欧美情势及外交消息，类皆取材外电，彼多为己国之利害计，含宣传煽惑之作用，故常有颠倒是非变乱真伪之举。”[4]其“扰乱我舆论，为祸之烈，过于炮火”[5]，国人深受其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诸般思想虽大肆流行却真伪难辨，是否适合中国更难以把握，国人遂陷入“选择性迷茫”。因此，建立直接、快速且不经“他者”影响的信息渠道尤为迫切。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1895 至 1920 年是中国近代思想转型时代，报刊大量涌现，并逐渐演化为嵌入社会建构的“制度性传播媒介”[6]。其不唯介绍新知、激发意识，更联通中国与世界，生成一种嵌入本土社会语境的“世界知识”体系[7]。这当然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点有关，即非单纯由内生力量主导，而是受到外部因素影响，通过模仿、借鉴与调适的方式逐步展开。外部因素常常构成中国制度变迁的原初动因，但何时变以及怎样变却又常常取决于内部因素的作用[8]。另外，变迁往往在关键事件与核心行动者的交互作用中展开[9]。其中，世界知识在此过程中经由报刊介入社会语境，改变了原有的知识系统，进而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转型[10]。不言而喻，记者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不仅是信息最主要的供给者，而且是“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11]。

综上，1920 年这次外派记者行动颇值得关注和研究。梳理相关文献，多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分析，派遣情况、记者特征、通讯特征、意义和影响等亦有初步展开[12]，其中对瞿秋白个人的研究最为充分①，而从新闻实践史视角对其如何撬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促动社会变革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尝试考察此次行动（事件）的发生、结果和影响，具体问题包括：两报联合外派记者的动因与使命是什么？外派记者在西方现场的观察和报道焦点有哪些？以及此次行动对中国思想界的变革有何影响？若上述问题能够得到解答，可揭橥外派记者对于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作用，并为探讨新闻实践如何参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提供典型个案。

一、两报联合外派记者的动因与使命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徘徊于旧秩序瓦解与新思想来袭的历史过渡期，思想界在启蒙与保守、外来与本土的张力中持续拉锯，虽论辩纷呈，却迟迟未能形成主潮，这构成了两报外派记者的基本社会背景。

（一）梁启超及“研究系”的思想文化转向

后袁世凯的中国政局引起梁启超等人的强烈不满。1917 年 7 月，在反复辟通电中他表达了遗憾、无奈与失望，遂于 11 月辞去财政总长职务。1918 年初，梁启超萌生赴欧考察之念，10 月，他明确表示中止政治生涯，将重心转向思想文化领域。欧游前，他与张东荪、黄溯初等相约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13]。12 月，他率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启程前往欧洲，遍历法、英、德等国。1920 年春归国后，他将所见所感同步发表于《晨报》和《时事新报》。两报为之特设《欧游通信》专栏，以大篇幅分百

① 蓝鸿文关于“瞿秋白赴苏俄采访”的系列研究，于 1989 年 6 月至 1990 年 8 月分七次载于《新闻界》杂志。

余次连载，历时近五个月。《时事新报》尤为重视，多将其置于第一版显要位置，蔚为壮观。但他坦言此行“为时短而历地多，故观察亦不甚清切，所带来之土产固不甚多”[14]，颇觉遗憾。

欧游期间，梁启超注意到社会主义的兴起，肯定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地位，认为其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15]，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16]。然而彼时“社会主义”一词涵盖极广，并置了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多重形态，界限模糊，主张纷杂[17]。知识界一时陷入社会主义的亢奋之中，但又难以厘清其思想分野。其中，可以确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并非时人追求的时髦哲学，相反，它是违背北洋军阀意志的“异端”，被顽固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厘清各“主义”间的差异，不仅是思想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梁启超本人的困惑。

转向思想文化领域的梁启超意识到“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改造中国社会唯有促成“全人格的觉悟”[18]。于是，他着手创设月报与印刷所、策划派遣留学生等，并以实业支撑文化事业。在梁启超的众多活动中，成立共学社尤其值得关注。该社为民间组织，核心人物是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和张东荪，发起人有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骞、胡汝麟、张元济、丁文江、张嘉璈、梁善济等，评议员包括徐新六、舒新城、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莘等，均为各界精英和社会名流，穆藕初、聂云台等大实业家参与捐款，经费充足[19]。这从侧面证实了梁启超强大的“文化权势”。该社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宗旨，以“西洋的文化源源本本的介绍”为鹄的，使文化运动如“泉水源源不绝，滚滚长流”[20]，曾组织编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这与梁启超主张“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21]是一致的。

除共学社外，梁启超还办有讲学社，邀请国外哲学家、思想家来华演讲，有计划地输入西方文化，没承想却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导火索是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华演讲中提出“保持国粹”的主张，与当时高涨的反传统潮流产生了剧烈冲突，舆论哗然。陪同罗素的张东荪声称“开发实业”才是中国出路，断言“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22]，更激起知识界的反弹。梁启超本人亦对“主义本身之何去何从”“久在彷徨闷索之中”，希望能透过实地观察与准确消息回应公众的疑虑[23]。

亲历战后欧洲、身处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梁启超，意识到国内获取原原本本世界知识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当久怀出国采访志愿的俞颂华前来拜会，并提出两报联合外派记者之议，梁启超欣然引荐其与《晨报》总编辑陈溥贤（渊泉）①洽谈，并许可聘请帮他翻译的人员同去[24]。这时，俞已诸事俱备，只欠翻译人员。

（二）知识分子不满于思想的紊乱

五四运动后，中国政治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给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扮演主要角色创造了机会[25]。思想界风气宽松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26]。西方哲学、政治与社会学说的译介热潮是知识分子探索世界强烈追求和努力的鲜明体现。俞颂华和瞿秋白是其中的典型。

俞颂华早年留学日本时就倾心于社会主义，故他一入职《时事新报》，即向主编张东荪提出要赴俄采访。而早已认定“除从事于改善国人思潮外，固别无天职”[27]的张东荪，对十月革命带来的“过激主义”虽有所警惕，但认为这是世界各国应当直面的问题，压抑是无效的，应“采纳其主义中之含有至理者”[28]，而如何寻得调和之策，令其颇费思量，所以愿意促成访俄一事。但因俞不谙俄语，且一报之力难以承担，未能即刻成行。1920 年夏，在张的帮助下，俞通过梁启超结识了《晨报》总编辑陈溥

① 陈溥贤，字博生，笔名渊泉，本文统一使用了其外派名单中的用名陈溥贤。

贤，两报联合派遣采访记者的行动终有了眉目，障碍只剩找到通晓俄语的同行者。

彼时俞颂华兼任《解放与改造》及《学灯》主编，频频刊载瞿秋白的译作，往来之间二人渐生情谊。此时的瞿秋白亦在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的困境，“只知道社会中了无名毒症，不知道怎么样医治”[29]。巧合的是，他也将苏俄视为新的社会理想，并认为“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30]。

此行的关键推手李续忠（又名仲武、宗武），与瞿秋白同岁，皆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他与梁启超还有姻亲关系，是梁夫人李蕙仙之侄，自幼受梁家抚育[31]。1920年夏，李续忠毕业在即，《晨报》又欲选派一名记者常驻莫斯科。李对该职深感兴趣，但知己既无新闻经验，又欠写作之长，于是提议与才具更胜一筹的瞿秋白结伴同行。为此，他专程面见姑父梁启超。梁欣然首肯，盛赞瞿秋白不仅俄语能力很强，且颇有中国古典文学修养[32]。此时的俞颂华已是一名资深报人，瞿秋白和李继忠二人虽乏办报经验，但在俄文素养与社会理想上不遑多让，共同的信念使他们踏上了前往“赤都”的征程。

除上述赴俄的三人外，外派记者还有陈筑山（美国）、陈溥贤与刘秉麟（英国）、刘延陵（法国）、吴统续（德国），另聘罗家伦、傅於、张若名、张崧年、郭虞裳、周太玄等任“特约通讯员”。赴苏俄采访记者的人数最多，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对“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充满好奇与憧憬。从身份背景看，这些外派记者大都长期活跃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圈子，且多是五四浪潮中成长的一代，处于一个通过有形和无形组织联结紧密的思想共同体之中，有着大致相同的理念和目标。

（三）报界对国际报道的加强

一战后，国内民众了解国际社会的意愿明显增强，报刊无疑成了最便捷有效的渠道，报界亦有回应。1920年5月，全国报界联合会在广州开会，“派员考察劳农政府内情案”“组织国际通信社案”“加入国际新闻协会案”被列为重要议案，主要目的是“不至为外电所左右”[33]。这当然不是庸人自扰。十月革命后，“报纸杂志和书籍，记俄国的事情的虽然不少，但是可靠的材料却不多见”[34]。对于俄国情形“报纸所载，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这种靠不住的消息，不但不能考见俄国的真相，并且令阅报的人生厌了”[35]。这一情状为中国报界派员赴俄采访提供了契机。

同时，民初报业竞争加剧，各报纷纷寻求革新之道，尤以加强国际报道为迫切。尽管早在1912年《申报》即设特约路透电，1914年又增东方通讯社电，但所载内容宛如外报外电的拼盘，琐碎凌乱、真假难辨，且立场偏颇，影响有限，并不受读者欢迎。这些消息多来自外人撰写，非中国人亲身采访所得，“然别国人之眼光固与我国人有别”[36]。1919年巴黎和会后，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失败令国内舆论大哗，中国社会认识到失语的危机与自我表达的重要性，“始唤起中国报界对外之舆论；而驻外特派员，乃渐萌芽”[37]。

《时事新报》《晨报》虽分处南北，但同以梁启超主导的“研究系”为政治背景，舆论上桴鼓相应。梁转向思想文化后，两报相继启动改革，“竭力跟着新潮流走”[38]。进入20世纪20年代，国际冲突连起，国内政局动荡，读者对第一手国际资讯的需求猛增。新文化运动催生的诸种西方思潮，存在“只要欧美的便是好的”等错误认知和盲从现象，甚至“把欧美已为人唾弃的设论，当作现代的金科玉律”[39]，招致诸多批评，思想界亟须对此有所真切认知与理性判断。此外，政府当局开始增加外交投入，增设使领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未如此紧密。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在山东问题上对日妥协的消息由梁启超率先传回国内，刊于1919年5月2日《晨报》《紧要新闻》栏目[40]，两日后五四运动爆发。《晨报》日销数由平时的一万份猛增至两万份[41]。来自国外的现场报道成为中国社会瞩目的焦点，报馆尝到了刊发“原创”国际报道的“甜头”，“一二良好特约通讯，即可增高其报纸之身价”[42]，这构成了两报外派记者的经济动力。两报为此专辟《特派员通信》

《特约通信》栏目。记者发回的通讯，《晨报》多刊于第三版和第六版，纳入“要闻”类。《时事新报》则基本固定刊于第五版。通讯常以连载形式呈现，篇幅占整版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不等。

综上，《时事新报》与《晨报》联合外派记者，是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政治活动转向思想界的诸多行动之一，也是困惑迷茫的思想界主动探寻出路的使命担当，而报界对国际报道的重视则将上述设想转化为行动。

二、明察旧知：外派记者与“战后欧洲”的祛魅

巴黎和会前威尔逊被誉为“拯救中国的伟大救世主”，其“十四点计划”一度被看作重塑国际秩序的道义基石[43]。然而，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处理彻底击碎了这一美好想象，威尔逊跌落神坛，中国社会再度陷入道路选择的迷惘。正是在旧理想崩塌而新思想未明之际，外派记者怀揣着“未竟之问”踏上了探访之途。

（一）以在场观察校正幻象

初次踏足西方的外派记者，接触到的社会文化、制度观念与先前依赖外媒外电所建构的想象大异其趣。在法国，刘秉麟以“照镜子”的方式描摹欧洲社会的阶层分化，称“高大洋房门口所在居民”属于掠夺者，“背煤的人拖东洋车的人”为被掠夺者，指出“欧化”表象下是资本积累的不均；自由贸易与保护政策的本质是以商业自由之名，行扩张与掠夺之实，国家权力为资本服务[44]。另一方面，他高度评价法国学院、商业高等学府及图书馆系统的开放[45]。在英国伦敦，刘秉麟坦言起居饮食易改而思想难变，这与原环境有很大关系。在反思自身“平日一知半解之误”的同时，他意识到中国思想界长期以来“新旧两面之意见”交织于公众思想之深，且“悬而不绝”[46]。

同处伦敦的傅於目睹了失业者聚集打玻璃、闹街市等现象，天天听到的是“一杀人，二放火，三捉去没下落”[47]。更令他震惊的是市民的冷漠，“就好比听说书的说奇案一样”。他以“麻木”形容市民的钝化，指出英国政治运行的悖论是“说大话，做小事，以义名始，以利实终”[48]。

身处美国的陈筑山每逢礼拜日必到教堂观察。他注意到美国社会普遍重视公共教育，尤其注重“演讲”，以“演讲为中枢”覆盖政治、社会、家庭问题等，“听演讲，勤工作，已成美人之癖好”。反观国内，民众稍有时间“则红中白板不离手者”，“终日营营逐逐，直无受教育感化之地”[49]。他由此反思中国社会公共精神的贫弱，认为这是社会发展迟滞的关键因素。与陈关注社会风尚不同，罗家伦抵美后侧重观察其政治制度与国际战略，特别是大选与美日关系。在一篇关于美日海军力量比较的报道中，他指出“水上飞行事业不强固，是我们海军最不便利的事”[50]。细致的观察描述和针对性分析，增强了报道的可信性。

“舆论之发生，根于事实之判断。而事实之判断，则系报馆之探报。”[51]作为在场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外派记者如实呈现所见所闻，并结合国内的情况与自己的理解进行比较、反思，通过报道呈现一个真实的西方世界。他们的现场观察和记录并无刻板成见，而是有贬有褒地客观记述，进而反思内外之别。这些文字描述和评论因“在场”而真实，因真实而充满力量，成为思想界“判断事实、引发舆论”的重要资源。

（二）从制度层面解构西方范式

随着观察的深入，报道的内容逐渐由初到的惊异深入制度辨析。“山东问题”外交失败后，国内知识界对西方制度文明产生了罅隙，原有的制度信仰经历剧烈重估。然而，在信息不对称与国际经验缺失的语境下，输入的思想往往被误读。外派记者的报道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华的信息垄断，并形成了中国视角的认知。

陈溥贤曾将“一线之希望”寄托于威尔逊的公理正义[52]，亲自考察英国后感叹“想靠这种政治家来帮忙，真是缘木求鱼”[53]。他揭露了英日暗中谋划“平分南北，均衡势力”的密约，指出“门户开放”实为新殖民秩序[54]，并借爱尔兰议题剖析英国在人权与民主外衣下的殖民逻辑，直言“中国人脑里总以为英国人是很重人道，讲公理的国民，其实大谬不然”，

英国是打着议会民主旗号推行殖民统治的“伪君子国”[55]。他继而指出，日本对华政策表面宣扬“共荣”，实质是确保“移民之安全，与原料之供给”，并直陈“日本对华之野心，跃跃纸上，吾人尚不知急谋自处之道耶？”[56]

对西方制度的观察是外派记者报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张若名揭示了战后欧洲国家在和平旗帜下维持既有秩序的制度伪饰，指出各国虽表面上呼应劳动界对失业救济和维持工资的呼声，实则以“恢复战前商业状态”为名降低劳动者工资，转而将国内问题外化为德国赔款议题，无异于“剜他人的肉补自己的疮”，“滑头的政治家”已无真正重建社会的意志[57]。刘秉麟注意到现代工业虽可以增加国富，却造成大量农民失业，强调“国富与人民幸福，是两件事”，资本主义造成大量农民失业，其“远因则由于资本主义，近因则由于大战”。他将资本主义的社会裂缝描摹得入木三分：失业者沿街抢劫、工人与警察激烈冲突[58]。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对西方“富强幸福”的理想化想象形成强烈反差。

与早期旅外者着眼高楼大厦、煤气灯、电梯等物质奇观，而“对于政治制度只是一笔带过”[59]的倾向不同，这批外派记者的报道除传递事实外，还包括对西方制度的批判与解构，展现资本主义的内在抵牾，从而具有了思想意涵，使原本满心期望通过模仿西方来改造中国之士开始动摇。在此过程中，报纸逐步成为思想发酵的场域，见证并推动着中国思想的转型。正如戈公振所评，“去真正醒觉之期不远矣”[60]。

（三）以舆论唤醒国民意识

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力图借助国际舆论争取国家主权，却屡遭冷遇。在此外交困境中，外派记者的特有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彰显。会议期间，“凡与华会有关系之公共机关，无不有新闻记者之足迹”[61]。他们密集向国内传播现场一手资讯，联通舆论感知与国际现实。外派记者关于世界局势的报道适时为国内社会提供了可资凭借的资源。

从罗家伦关于华盛顿会议的连续报道不难看出其对国家命运的反思。他认为，中国外交的失败根本在于“无眼光，认不清重大问题；无魄力，负不起重大责任”，并指明中国并非因弱小无外交而是因腐败无外交。因此，国民觉悟应建立于“深沉的决心、实行的能力”之上，重在“根本解决国内政治”。他主张将外交挫败真相公之于众，让有判断力的国民自己去审察[62]。中国提出的“十项原则”在国际上遭到冷遇，国内媒体却将之夸饰为“惊人”之举，颇令罗家伦痛心[63]，这也表明中国社会对国际局势认知的断裂，以及因无知而形成的虚妄。罗家伦将华盛顿会议定义为“国民意志全未表现”，外交困境是国内制度性弊病的外在表现，国内政治不根本改造，则绝无外交可言[64]。

此外，吴统续从国际法角度对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的失利进行剖析，批判当时国内知识界盛行的“大同主义”，指出中国应摒弃托庇于他人之幻想，建立“保持独立”的外交原则[65]——此可谓一支“清醒剂”。

“近代中国关于世界的话语，其实就是关于中国的再定位，所以近代话语中的世界背面，其实就是中国。”[66]中国在确认了“欧美”“苏俄”后，更能认清、定位自己。这些国际通讯成为国内舆论中的强音，有助于唤醒沉溺于“象征性胜利”幻象中的公众，进而反思中国制度的弊病，推动民族主义向制度理性转化。

三、择道新知：外派记者与“以俄为师”思想的形成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虽形式上摆脱了帝制桎梏，思想上却未真正解放，因此，要改造社会必先进行思想革命。十月革命的爆发无疑成为一个历史机遇，它被视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思想界“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67]。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苏维埃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方案，各国“新闻家橐笔入俄，以求窥得真相”[68]。

（一）以信息直通破除对俄认知障碍

十月革命后，世界各国对俄国的真实状况普遍缺乏了解。中俄虽一衣带水，但内情封锁严密，交通阻隔，导致国人对苏俄知之甚少。有限的了

解多依赖外媒二手报道，而外媒却极尽丑化之能事，如《字林西报》称“苦难、恐怖与无尽的荒凉”笼罩俄国[69]，路透社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苏俄“饥寒交迫，疾病、痛苦与死亡肆虐”的惨状[70]，苏俄曾被误作“饿乡”。这当然全是帝国主义所为，“而非中国人自出之批评也”[71]，但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对“红色威胁”的恐惧，以至于带有“社会”二字者均被当局视为“过激派”。其结果，中国民众“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72]。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外派至苏俄考察的记者虽以记者身份出现，却怀着政治家的目的，可谓双重使命。考察苏俄真实情况，为中国寻求一种可资借鉴的制度方案，成为外派记者的主要目的之一。

上述意图在他们的采访和报道中显露无遗。1920 年底三位外派记者赴俄途中，与中东路工党首领会面交谈，发现中俄邦交存在障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民众不了解苏俄实况[73]。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Yason）坦言，“协约国封锁以来，谣言四布”，中国人对俄或多误会，因此竭诚欢迎记者们“为正直的中国人民一开耳目，为中俄互相了解的先声”[74]。在此情况下，实地观察显得格外重要，如李仲武所言，“不能不把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以及我这两月内所见所闻的，报告诸君……可以知道外间所传谣言的不确”[75]。瞿秋白、李继忠、俞颂华三人公开致信俄国工人与记者称，将向中国人民如实传达俄国情况，可以让“中国人民不再受那些有关俄国情况的虚伪报道的欺骗”，“以便日益加深和巩固两国友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76]。

在彼得格勒，瞿秋白着手调查俄国华侨的实际状况，试图厘清传言与实情的差异。他发现，苏俄施优待华工之策，但因经济凋敝生活依然困苦。瞿指出，中俄外交僵局的根由在于两国政府互不承认，苏俄有改善之意，中方却“茫漠不定”[77]。相关报道指出，中俄间的误解若不及时澄清必贻误大局。而国民的意向和政府的企图，都映射到各国代表性报纸上，报纸言论牵动着国家外交[78]。也就是说，此时报刊的舆论立场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在列强环伺、割地赔款的现实面前，“外国佬都是强盗”一度成为中国民间的普遍情绪[79]。而苏俄政府发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加拉罕宣言》，展现了西方国家从未有过的善意，知识界、舆论界“没有不无限欢喜无限感激的”[80]。这恰与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背信弃义形成巨大反差，苏俄以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及其展现出的对华友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好奇和好感。对此，中国人急欲有所了解，但中俄间信息阻滞严重。外派记者亲往苏俄，建立了信息直通渠道，且通过实地观察与理性评述，丰富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必能去掉世人诸多误解”[81]。这些报道不仅传播信息，还构成了思想启蒙与话语建构的资源，为“以俄为师”观念转向提供了舆论基础，为国人正确了解和准确认识苏俄扫清了障碍。

（二）阐释“以俄为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面对“是否走俄国之路”的问题，记者们的考察不仅从制度维度起底，更扩展至其所处国际秩序，提供了全球参照。瞿秋白指出，俄国实行社会主义后被全世界视为怪物，但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真正接触后，发现意识形态并非不可调和[82]，如苏德两国曾表示相互扶持以复兴社会[83]。相反，协约国在对德赔款问题上的态度则“欲求鸡生蛋，时时以杀鸡为目的”[84]。通过比较，苏俄作为更友好的“另一种可能”逐渐浮现。

对中国而言，“以俄为师”并非盲目仿效，而是出于摆脱列强控制、探索出路的现实考量和自主行为。瞿秋白提醒，虽不能断定布尔什维克最后必然成功，但其“实行自己的理想，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85]。他还指出，苏俄拒绝参与资本主义世界以“争市场”为本质的战争，而是通过维持体制独立避免沦为新殖民体系的附庸[86]，这一经验具有警示意义，即中国要避免重蹈附庸与被瓜分的覆辙，须探索独立发展的政治道路。瞿秋白曾多次现场聆听列宁的演讲，称“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87]，工人群众

的眼光“都注射在列宁身上”[88]，体现了民众对列宁的认可，有力反驳了西方媒体对列宁的“妖魔化”。他还回应了“如何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与建设”的现实难题，揭示了苏俄在困境中的制度调适，指出共产主义不应只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面对国内的质疑与观望，他称三年前谁都不相信苏俄能支撑至今，但事实证明了一切。因此，“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89]。

实地观察报道及臧否旋即在国内思想界引发广泛关注。作为同样饱受封建专制与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中国人从苏俄的政治实践中瞥见民族自强的可能。思想的传播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关乎接受者的生命体验、想象力与现实感召力[90]。相较于学理争鸣，外派记者采写的报道直接面向大众，专注“如何扩散、如何下渗，或思想与日常生活如何发生关联”等问题[91]。“布尔什维克”等不再只是陌生的政治名词，而是一种可以想象和讨论的社会实践，且与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相关联。在俞颂华的笔下，苏俄革命并非单纯的暴力，而是以全面改造社会为目标，力图消灭一切人类不平等，并联合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霸权[92]。俞还关注苏俄外交与民族政策，强调其对中国表现出“毫无恶心，毫无野心”的善意[93]。瞿秋白关注苏俄从革命战争向经济建设的转型，强调制度调适与治理能力的现代意义。

在中国对苏俄的认知尚处于摇摆分裂之际，他们通过连续而深入的报道，将“走俄国之路”由理念升格为可感知、可参照的方法论。瞿秋白援引列宁的话强调：“社会主义的胜利，不过是迟早及进行过程形式之不同的问题罢了”[94]，以此消解外界对布尔什维克就是暴政的成见。俞颂华亦指出：“各方面的改革都应该趁早注射社会主义的血清”，但“无论哪一种主义，绝不是包医百病的药”；中国必须根据“国情和民族性先从自己方面做起”[95]。在他们笔下，苏俄并非一个理想乌托邦，而是正在探索自身出路的“先行者”，其可借鉴性正来自其可试错与可修正。由此可见，“以俄为师”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从一开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

四、结语

梁启超从“直接政治”转向“间接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是此次外派记者赴欧美采访的直接动因。他或为弥补自己欧游时间太短的遗憾，延续《欧游心影录》的舆论影响，却未必料及“以俄为师”思想转向会如此之快。历史往往如此：个人意志与时代大势的结合，总有出人意料的结果。从“西学东渐”到“以俄为师”的背后正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大势，但促成这一大势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相互作用的机制及过程是繁复的。

揆诸史实，不难发现在推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众多因素中，报刊的特殊作用不可忽视。美联社总裁诺伊斯（F. B. Noyes）曾提出，“报纸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公众舆论将成为国家发展的最大推动力”[96]。中国报人张季鸾也认为，“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97]。20 世纪 20 年代无疑是中国“改革过渡时代”，也是迷茫的时代。在此背景下，两报联合外派记者赴欧美采访，充当了思想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先导。

第一，从时间上看，外派记者快速传递了第一手信息。在条件受限的 20 世纪初，国外信息主要经由日本传入国内，基本载体是日译书籍和外文报刊，需经历多重异地辗转和语言转译，又多有误差。这次外派行动，记者现场采访，用中文撰稿，以通讯或专电传回国内，发表在每日出版的报纸上，不再需要转译，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了快速高效。如瞿秋白撰写的《旅俄华侨问题》一文 13 天后即刊于《晨报》。《欧游心影录》在报刊上刊出不久，河南开封第一师范学校的课堂上已有“先生正在那里讲欧游心影录哩”[98]。时间差就是信息差，信息差攸关认知差，这在急遽变革的 20 世纪 20 年代，意义不言而喻。

第二，从空间上看，“中国人在场”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和可接受性。如上所述，关于世界大势的信息尽操于外媒之手，是他者立场、视角、观念下的产物，不仅无法令国人信服，而且夹杂意识形态偏差，甚至不乏刻意造谣诬蔑。外派记者深入欧美，亲临重大事件现场，站在中国的立场，以自己的眼光去观察、记录和思考，本身就传递了一种意义，增强了所发回信息的可信度与可接受性。如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一些在场记者还“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99]，将外交议题转化为具有民族情感与启蒙意味的公众话题。这表明，外派记者的身份及其国民代表角色扮演，使其观察和报道基于中国立场与国民视角，具有更高的认同度、可接受度。

第三，从身份上看，他们不仅是记者，还是学者，可以实现“信息接受－认知重构－思想转变”的有效转化。如前所述，这批外派记者大都是受过近代思想洗礼又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书写超越了事实铺陈，迈向实践总结、制度分析和思想探寻层面。如陈溥贤所言，新闻不应止于事实陈列，而应具备“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从现在的小现象之中看出将来的大趋势”[100]，这显然并非一般记者所能做到的。记者往往停留于事实的呈现，深度欠缺；书斋里的学者可以供给思想，但不易被受众接受。二者兼具则可以实现从传播事实、观点呈现，到信息接受、观念转变的有效转化，促动思想转型。

第四，从传播效果看，“报纸影响力的强大在于人们想象它强大。不管报纸上写了什么，这种影响力都在那里；它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信报纸”[101]。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阅报蔚为风尚，甚至发生因“争阅报竟致起打”[102]的事件。因为有利可图，报刊也乐意刊载新内容，“趋新”成为报界风尚。趋新的社会叠加趋新的报界，报纸的影响力自然强大。另外，新闻媒体作为文化行动者，是意义、象征和信息的生产者和信使，其所创造的是一种语境[103]。两报外派记者采写发回了大量现场新闻，并予以分析评判，经过报馆的编排与呈现，以近似“日更”的节奏，长时段连载，构成了一种颇具实质内容与结构形式的文本集合，成为意义、象征与信息的装置，进而营造了求新求变的公共语境。报界语境与中国思想界探寻出路、寻求新思想的现实语境彼此交光互影，报界则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尽到了“报界之天职”。

在 20 世纪 20 年代西方话语垄断的格局下，报界发挥自身能动性，外派记者深入实地观察报道，打破了信息壁垒，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世界、重构国家认知的框架。他们以理性客观的报道为国人超越盲从与误判提供了事实依据，进而在理解他国的同时确立自己立场，做出制度选择。这种积极性、能动性、自主性对当下我国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藩篱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徐秋染）

参考文献

[1] 东行日记 [N]. 申报 , 1876-06-07(3).
[2] 王咏梅 . 胡政之与巴黎和会 [J]. 国际新闻界 , 2007(8): 69-73.
[3] 浙江之文化运动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19-10-27(2).
[4][33][37][60] 戈公振 . 中国报学史 [M].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1: 236;261-262;181;185.
[5] 日本在华之新闻政策 [N]. 晨报 , 1919-06-23(2).
[6] 张灏 . 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张灏自选集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 151.
[7] 潘光哲 . 创造近代中国的“世界知识”[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9: 247.
[8] 朱英 . 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 [J]. 社会科学研究 , 2016(4): 192-196.
[9] 严飞 . 历史图景的过程事件分析 [J]. 社会学评论 , 2021(4): 120-137.
[10] 黄旦 . 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 [J]. 中国社会科学 , 2019(1): 137-158.
[11] 许纪霖 . 中国知识分子十论 [M].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03: 4.
[12] 蒋芸芬 . 民国时期驻外记者的缘起和发展 [D]. 华东师范大学 , 2018.
[13] 梁启超 . 欧游心影录 (廿四)[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0-03-30(1).
[14] 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 [N]. 申报 , 1920-03-14(10).
[15] 梁启超 . 欧游心影录 (五)[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0-03-07(2).
[16] 梁启超 . 欧游心影录 (十一)[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0-03-13(1).

[17][90] 邓军 . 青年的选择：在传播与接受之间 [M].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5: 39；229.
[18] 梁启超 . 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 [G]// 申报馆 , 最近之五十季 (1872−1922)(第二编), 上海：申报馆 , 1923: 3−4.
[19] 吴炳守 . 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及其基础 [J]. 史林 , 2002(1): 73−82.
[20] 共学社广告征稿启事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0−07−28(1).
[21] 子冶 . 梁启超和商务印书馆 [G]// 商务印书馆 .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 (1897−1987),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7: 504.
[22] 东荪 . 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0−11−06(5).
[23] 梁启超 . 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J]. 改造 , 1921, 3(6): 17.
[24] 钱梅先 . 纪念颂华 [G]// 葛思思 , 俞湘文 , 编 . 俞颂华文集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1: 8−9.
[25] 王笛 . 五卅运动前后的中国青年——从美国媒体的视角来观察 [J]. 探索与争鸣 , 2022(11): 101−113.
[26] 蒋梦麟 .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 : 蒋梦麟社会文谈 [M]. 上海 : 学林出版社 , 1997: 78.
[27] 东荪 . 答姚荐楠君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18−01−19(6).
[28] 东荪 . 世界公同之一问题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19−01(2).
[29][30][72][74] 瞿秋白 . 新俄国游记 [M].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22: 29;34;30;121−122.
[31] 梁启超 . 饮冰室合集 (5) 文集之四十四 (上)[M]. 北京 : 中华书局，1989: 25.
[32] 彭述之 . 彭述之回忆录 (上卷) [M]. 香港 :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 2016: 267−268.
[34][35] 兰姆塞 . 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 [M]. 兼生 , 译 . 北京 : 晨报社 , 1920: 叙言一 ; 叙言二 .
[36] 上海报界欢迎本报记者胡政之君 [N]. 大公报 (天津), 1920−05−30(3).
[38] 无射 . 真觉悟吗？ [N]. 民国日报 (上海). 1919−08−13(3).
[39] 张原絜 . 今日文化运动的三大危险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0−08−18(14).
[40] 山东竟如是断送耶 [N]. 晨报 , 1919−05−02(2).
[41] 方汉奇 , 主编 .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 2 卷)[M].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996: 85.
[42] 赵君豪 . 中国近代之报业 [M]. 香港 : 申报馆 , 1938: 25.
[43] 马建标 . 塑造救世主 :“一战”后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J]. 学术月刊 , 2017, 49(6): 164−172.
[44] 南陔 . 欧游通信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1−05−29(3).
[45] 南陔 . 欧人生活状态及法国学制 (续)[N]. 晨报 , 1921−06−05(6).
[46] 南陔 . 对德赔偿问题之解剖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1−09−10(2).
[47] 於 . 爱尔兰乱事之扩张 [N]. 晨报 , 1921−01−19(6).
[48] 於 . 片时间的一个感想 [N]. 晨报 , 1920−12−17(6).
[49] 陈筑山 . 呵伯伦 oberlir 印象记 [N]. 晨报 , 1921−01−09(6).
[50] 志希 . 月从海上苍云里 窥见天涯未洗兵 [N]. 晨报 , 1921−03−15(6).
[51] 王瑾 , 胡玫 , 编 . 胡政之文集 (下)[M].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7: 1166.
[52] 陈溥贤 . 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之真相 (六续)[N]. 晨报 , 1921−10−21(6).
[53] 陈溥贤 . 呜呼爱尔兰人 正义人道上底大问题 (续)[N]. 晨报 , 1921−07−15(3).
[54] 陈溥贤 . 华盛顿会议之成败 [N]. 晨报 , 1921−11−02(3).
[55] 陈溥贤 . 呜呼爱尔兰人 [N]. 晨报 , 1921−07−14(6).
[56] 陈溥贤 . 日英续盟与中国之运命 [N]. 晨报 , 1921−06−12(3).
[57] V 女士 . 欧洲劳动问题与其救济策 [N]. 晨报 , 1921−03−31(6).
[58] 南陔 . 伦敦视察记 [N]. 时事新报 (上海), 1921−12−15(5).
[59] 费正清 , 刘广京 , 编 . 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 下卷 [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 译 .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3: 90.
[61] 伯衡 . 太平洋会议之真相 [N]. 申报星期增刊，1921−02−26(2).
[62] 罗家伦 . 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 [N]. 晨报 , 1922−02−07(7).
[63] 罗家伦 . 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 [N]. 晨报 , 1922−02−08(7).
[64] 罗家伦 . 我对于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之观察 [N]. 晨报 , 1922−02−10(7).
[65] 吴品今 . 呜呼交外主义之外交 [N]. 晨报 , 1921−10−23(6).
[66] 葛兆光 . 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13: 404.
[67] 胡适 . 纪念“五四”[J]. 独立评论 , 1935(149): 5.
[68] 罗罗 . 劳农俄罗斯之改造状况 [J]. 东方杂志 , 1920, 17(14): 27−28.
[69] THROUGH RED RUSSIA[J].*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0,CII(17105): 5.
[70] HARROWING STORY OF RUSSIA[J].*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1921,CV(17627): 13.
[71] 曹谷冰 . 苏俄视察记 [N]. 天津 : 天津大公报馆 , 1931: 序一 .
[73] 澹 , 秋白 . 中东路工党首领之谈话 (续)[N]. 晨报 , 1920−12−02(6).
[75] 李仲武 . 墨斯科二月见闻录 [N]. 晨报 , 1921−06−24(7).
[76] 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 嘉兴学院红船精神研究中心 ,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编 . 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料长编 (1917−1927) 上卷 [M]. 武汉 :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19: 472.
[77] 秋白 . 欧俄归客谈 (续)[N]. 晨报 , 1920−12−21(6).
[78] 任白涛 . 综合新闻学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41: 145.
[79] 倪延年 . 中国近代新闻国际交流史 [M].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21: 111.
[80] 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 [J]. 新青年 , 1920, 7(6):

附录 14.
[81] 陈独秀 . 致胡适 (1922 年 4 月 7 日)[G]//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 胡适来往书信选 (上).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3: 107.
[82] 瞿秋白 .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 [N]. 晨报 , 1921-07-07(3)
[83][87][88] 瞿秋白 . 赤都心史 [M].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 1924: 27;53;103.
[84] 南陔 . 对德赔偿问题之解剖 [N]. 时事新报 , 1921-09-10(2).
[85] 瞿秋白 .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 (续)[N]. 晨报 , 1921-06-29(3).
[86] 瞿秋白 .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 (续)[N]. 晨报 , 1921-07-09(3).
[89] 瞿秋白 . 共产主义之人间化 (续)[N]. 晨报 , 1921-09-23(6).
[91] 王汎森 .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8: 4.
[92] 俞颂华 . 劳农俄国之观察 [N]. 晨报 , 1921-10-04(3).
[93] 俞颂华 . 劳农俄国之观察 [N]. 晨报 , 1921-10-06(6).
[94] 瞿秋白 . 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 [N]. 晨报 , 1922-08-19(6).
[95] 俞澹庐 . 俄国之新经济政策 (续)[N]. 晨报 , 1922-07-29(6).
[96] GREETING TO MR. NOYES BY CHINESE PRESS[J].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1922,CVII(17942): 7.
[97] 张季鸾 . 本报一万号纪念辞 [N]. 大公报 , 1931-05-22(1).
[98] PBT. 游汴杂记 (三)[N]. 晨报 , 1920-06-11(6).
[99] 马建标 . 精英、舆论与外交 : 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 [J]. 安徽史学 , 2012(4): 29-35.
[100] 陈博生 . 做新闻记者的几个原则 [M]// 王文彬 , 编 . 报人之路 . 上海 : 三江书店 , 1938: 15.
[101] 梅嘉乐 . 报为中用？：上海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定位与变革：1872-1912[M]. 季凌霄 , 译 .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25: 265.
[102] 争阅报竟致起打 [N]. 益世报 (北京), 1922-06-12(7).
[103] Michael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8.

Fulfilling the Mission of the Press: China's First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nd the Intellectual Renewal of the 1920s

Zhang Zhenting, Cai Yijing

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oreign ideologies and local contexts was a major driving force in the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ition of modern China, with the emerging press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1920s, amidst a period of ideological uncertainty and transitional flux, The Morning Post (Beijing) and The Current Events New Post (Shanghai) jointly dispatched a group of correspondents t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Russia. These journalists promptly transmitted firsthand accounts of the postwar world—particularly of Soviet Russia—and enhanced the credibility and public receptivity of such information through their physical presence on the ground. Holding hybrid identities as journalists,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they not only presented facts but also engaged i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ideological selection, thereby fostering a deeper progression from information reception to cognitive re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ir reports catalyzed widespread public response and shaped a nationwide intellectual climate favoring innovation and reform.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ce initiative thus not only constructed a transformative discursive environment but also provided a textual foundation for ideological renewal. In doing so, the press fulfilled its historical vocation, contributing meaningfully to the introduction and earl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proactive role and discursive autonomy exhibited by the Chinese press during this period continue to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transcending contemporary Western-centric narrative frameworks and adv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Keywords: foreign correspondents;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earl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uthors: Zhang Zhent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Cai Yij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弗卢塞尔论媒介：一种媒介批判路径

李慧敏

摘要 “手段－目的”构成了理解媒介理论发展的重要线索，然其在媒介工具论与媒介中心主义的对立中陷入僵局。弗卢塞尔为此提供了创造性的超越路径。他立足于传播中物质与符号的辩证统一，将媒介界定为具有结构能动性的符码运作场域，媒介并非纯粹被动的手段，而是内嵌了特定规则的结构性条件，蕴含自身的潜在目的。通过区分话语型与对话型媒介，弗卢塞尔阐明了媒介在信息保存与传递功能中保留的手段性，及其在信息创造功能中彰显的能动性。他所提出的“媒介柔性”，成为扭转目的与手段的关键枢纽，使得手段与目的在媒介实践场域中流变。弗卢塞尔进一步从哲学层面推导出媒介辩证法，揭示出手段与目的在媒介内部的同一。以“后历史意识”视域，他彻底跃出“手段－目的”这一历史性框架，指出一种超越目的论的、人媒博弈共生关系。最终，他确立了一种辩证的媒介批判路径，其核心在于将“人－媒复合体”视为一个动态的张力场域，通过解码其中既协作又对抗的实践关系，揭示人类与技术相抗共生的存在境况。

关键词 媒介；手段；目的；柔性；辩证法；后历史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李慧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 610207

作为横跨多学科的关键范畴，“媒介”的意涵远非自明，不同媒介概念折射出的正是人类对自身与媒介关系的深层追问。媒介意涵的演变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媒介究竟是服务于人类意图的“手段”，还是传播活动乃至宏大历史活动的“目的”？“手段－目的”的框架构成了理解媒介理论发展的重要线索。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媒介意涵的历史梳理，清晰地展现出其从“手段”向“目的”的转变。据威廉斯的考证，媒介的早期含义被界定为“中介体或中间物”，例如光、空气之于视觉，词语之于思想。此时，媒介作为一种理想的手段，其目的是促成人类感知或意义传递。转折点是媒介获得了“有意识的技术意涵”，亦即随着技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从技术维度对媒介进行分区，承认媒介“具有自身特性与决定性属性”[1]。媒介意涵的这种转变使得焦点从“通过媒介传播了什么”转向“媒介自身传播了什么”，媒介开始从工具性角色中独立出来，其自身的特性成为传播活动的某种目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是该转折的代表人物，其“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2]的理论觉察，正是将媒介视为传播活动或其自身之目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本体论”[3]则将媒介彻底视为历史活动的最终目的。他宣称，

随着媒介的自主演替，“控制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电脑或者与之类似的信号处理机”[4]，“在不涉及个体或人类的情况下，传播技术将相互革新，直至最终某种人工智能着手拦截太空中可能存在的智能体”[5]。在基特勒“宏大叙事的尽头是人类的淘汰”[6]，人类沦为媒介自我完善的手段。基特勒彻底颠倒了人类与媒介、目的与手段的传统关系。

将媒介仅仅视为手段，而将人视为终极目的，极易导向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媒介工具论，从而遮蔽媒介自身具有的能动结构与生成性力量；反之，若将媒介视作自主目的，而将人贬低为其功能实现的环节，则易激进地滑向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决定论，从而消解人类在技术情境中的能动性与伦理意义。在“手段”与“目的”的分野与论争中，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的媒介思想提供了挣脱僵局的创造性路径。首先，他从传播过程中物质性与符号性要素辩证统一的立场出发，建构了一种辩证的媒介观，既揭示出媒介作为目的与手段的双重维度，又展现出手段与目的在媒介实践场域中的流变。其次，他取径哲学推导出媒介运作的内在辩证法则，揭示出手段与目的在媒介内部的同一。再次，他以“后历史意识”彻底超越了“手段－目的”的二元框架，指出这种二元论是“历史意识”的一种体现，而在后历史意识中，人与媒介，皆既非目的，也非手段，二者是一种博弈共生的关系。最终，弗卢塞尔确立了一种辩证的媒介批判路径，既不预设纯粹的人类主体，也不崇拜自律的媒介技术，而是持续追踪人与媒介在相互构成、彼此制约中所展开的自由－异化双重游戏，从而在技术自主性与人类主体性之间，开辟出一条持续求索动态平衡之道。

一、弗卢塞尔辩证的媒介观及“手段”“目的”在媒介实践场域中的流变

媒介与人类的传播活动深刻关联，为廓清媒介何为，弗卢塞尔从传播过程的电话模型出发，犀利指出其机械分类方式对媒介真正意涵的掩盖。电话模型将传播过程刻板地划分为硬件层面——发送者（麦克风）、接收者（听筒）、信道（连接线缆），以及符号层面——符码（通话使用的语言）、信息（所说的内容）、噪音（干扰信息传递的因素）等。这类硬件与符码的二元区分虽然在分析上具有启发性、可操作性，但容易引发认识论上的混乱，尤其是在探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媒介何为时，往往会陷入物质实体与符号系统的虚假对立，将媒介仅仅视为输送符码的通道。

弗卢塞尔贯彻其传播理论的核心理念，即传播符码与传播结构相互耦合共同决定了传播现状，强调在实际传播过程中物质维度与符码维度始终处于相互嵌入、不可分割的状态。如其所言：“硬件层面虽被设计为实现符码的功能（电话机服务于口语），但符码必须以某种方式适应这种硬件（人们无法以唱歌方式实现通话）。”[7]因而，尽管媒介具有物质层面，但其本质不可被视作冰冷的物质工具。例如，电话不仅是电缆和电子元件，而且是使口语符码以线性、实时方式运作的结构；正如纸质书籍不仅是纸张和油墨，而且是使文字符码以线性、可反复阅读的方式运作的结构。硬件设施本身蕴含着特定的符码运作逻辑，符码也必须依赖于特定的物质结构才能实现传播，因此，硬件与符码并非独立运作的两个层面。正如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赫普（Andreas Hepp）所说：“作为正确地分析媒介和传播对于建构社会世界的作用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将物质与符号对立起来，而是要把握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8]弗卢塞尔实则揭示出传播过程中物质性与符号性要素辩证统一的耦合关系，而媒介便是这一耦合之物。

从符码运作机制出发，弗卢塞尔重新界定了媒介概念：“媒介是符码得以运作的结构（无论物质或非物质、技术或非技术）。依此界定，电话和教室、身体和足球都是媒介：每种媒介皆以其特定的方式使符码得以运作。”[9]这一界定既超越了传统媒介观的实体论倾向，又超越了当代媒介理论中技术至上的倾向，从而将媒介理解为具有结构能动性的符码运作场域。此

外，这种媒介认知还具有双重理论意义：一方面，它否定了将媒介简单归为信息载具的工具性观点，即媒介并非单纯的手段，并强调媒介结构对符号意义生产的建构性影响；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将媒介完全等同于符码的符号还原论，因为同一符码系统可以在不同媒介结构中实现差异化运作，从而明晰了媒介与符码间的辩证关系，防止将媒介视为符码意义的唯一决定因素。

依据媒介结构对传受双方间的符码流动所施加的动力学影响，弗卢塞尔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媒介分析框架，其核心标准在于考察媒介如何调节符号信息在发送者与接收者记忆系统之间的流动方式以及因之产生的功能效果。据此，弗卢塞尔划分出两大媒介基本类型："话语型媒介"（diskursive Medien ①）——"符码化信息从发送者记忆流向接收者记忆的媒介"；"对话型媒介"（dialogische Medien）——"不同记忆系统间交换符码化信息的媒介"[10]。具体而言，话语型媒介的主要功能在于保存与传递既存信息，其运作逻辑体现为发送者对接收者的信息支配。依据信息分发的空间结构可以区分出话语型媒介的四种亚型：（1）金字塔型媒介（pyramidale Medien）：通过阶梯式层级性逐步分发信息的媒介，典型案例包括教会制度与商业组织；（2）树状媒介（baumartige Medien）：将信息沿分叉式路径区块化传播，各分支间相对独立，代表为科研机构；（3）剧场型媒介（theatralische Medien）：信息向半圆形分布的接收群体集中分发，发送者处于焦点位置，国民基础教育体系与电影院即属此类；（4）圆形剧场型媒介（amphitheatralische Medien）：信息以发送者为中心向全周界辐射，接收者呈环绕式分布，古罗马竞技场与广播电视系统为其代表[11]。与话语型媒介不同，对话型媒介的主要功能在于生产与创造新信息，其符码流动呈现多向交互性。对话型媒介也具有两种亚类型：（1）圆形结构（Kreisstruktur），参与者围绕共同议题形成对话圈，信息在循环交换中不断重构，拒绝单一中心权威；（2）网状结构（Netzstruktur），其中符码流动呈现去中心化与涌现性的特征[12]。

"媒介"被弗卢塞尔建构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传播结构"，二者的功能属性完全重叠，皆包含信息储存、信息传递与信息生产，分类标准皆以动力学为标准，从对话与话语结构衍生出六种亚型结构。在信息储存的意义上，媒介乃是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汇聚之地；在信息传递的意义上，媒介作为符码流动的渠道，塑造了社会交往的时空结构；在信息生产的意义上，媒介作为意义生成的场域，推动了社会知识的革新。媒介功能多元，并非局限于信息传递这一基础性功能，更在信息创造与记忆形塑等深层维度展现出显著的能动作用。弗卢塞尔进一步揭示，媒介功能的差异化运作对社会系统的稳定性与革新性趋势产生了结构性影响，从而塑造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如他所言："话语型媒介是信息的保存者（Informationskonserven），而主要由话语型媒介所滋养的大众文化则构成了一个保守型（konservative）社会。"[13] 与此相反，对话型媒介作为信息的生产者，在信息不断革新的意义上，其所造就的社会将是变动不已的社会。

综合来看，弗卢塞尔通过媒介功能揭示了媒介的双重属性，其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在信息传递与信息储存的层面，媒介作为外部手段，服务于人类交往、文化传承与社会维系等既定目的；而在信息生产与创造的层面，媒介则是具备自为能力的目的本身，它作为新意义生成的母体，不断催生出超越人类原初意图的新型意图与结构力量，从而展现出一种内在的、自我指涉的目的性。由此，媒介既是传播之器，亦是传播活动所服务的自主性力量。

更进一步，弗卢塞尔提出了媒介的柔性特质（die Schmiegsamkeit der Medien），它既是媒介功能转换的枢纽，也是媒介在手段与目的之间动态切换的关键。媒介柔性指涉媒介"能

① 为忠实于弗卢塞尔的原文并避免转译中的意义损益，本文在关键术语处，均直接标注德语原词，而非英译。

够以相对容易的方式转向完全不同于已知功能的事实”[14]。举例来说，市集广场作为一种交往媒介，既可以作为平等沟通的对话型媒介，也可以改造为单向宣讲的话语型媒介。媒介的结构柔性及其功能转换从根本上解构了媒介的本质主义预设，揭示出媒介功能并非由技术或物质维度单向决定，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生成与演变。媒介柔性意味着，媒介并非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手段，它完全可以借助于社会实践的场域挣脱出预设的初始目的，转向其他功能与目的。换言之，就媒介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开放的“目的域”，即一种充满可能性的潜能场域。在此场域中，探索“媒介本身可以做什么”即构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驱动力。当工程师与艺术家以发掘媒介潜能为直接目标时，媒介成为意义创造与可能性探索的自为场域，从实现外在目的之手段，转变为其自身即构成目的之存在。而当媒介的柔性特质被权力与资本所征用时，它既可能将人贬抑为手段，也可能将自身异化为某种专横的装置性目的。

弗卢塞尔在肯定技术发明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更加强调社会使用对技术潜能的规训作用。这一理论立场可以通过多种媒介技术在传播史中的关键转折点得到验证：在谷登堡印刷术发明后的三个世纪里，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推动机制，其影响力始终局限于精英阶层，而随着 19 世纪欧洲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印刷媒介才真正成为大众媒介。无线电媒介诞生之初本是一种开放的对话型媒介，早期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常借此相互传递个人信息，然而在社会使用过程中，它逐渐重构为单向度、中心化的话语型大众媒介。电视技术的发生史亦具有启示性，尽管电视的原型设计（作为可视电话被构想）蕴含着双向互动的技术潜能，但在社会建制化过程中，最终定型为单向传播的话语机器。正如弗卢塞尔所言：“符码功能并不取决于媒介的形而上学理念（如麦克卢汉所倾向认为的那样），而取决于媒介的使用方式。”[15]

媒介功能的实现不仅受到技术可能性的制约，更深刻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逻辑之中。在弗卢塞尔看来，技术参数仅构成媒介发展的可能性条件，为媒介作品提供了潜在的多义性，而主体通过社会使用所建构的媒介惯习，才是固化对象某一意义的决定性力量。举例而言，同样一张登月照片，当其置于艺术画廊展出时，则被视为艺术作品；当其出现在天文实验室时，则被视为科学成果；若被悬挂于美国领事馆，则具有政治意涵；此照片的意义既不关乎制作者是人还是机器，也不关乎制作设备的型号，等等。媒介的使用方式，即媒介所处的社会化实践网络，决定了媒介内容的意义。此观点对当代数字媒介批判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在算法社会语境下，技术装置的柔性特征可能正在以更为隐蔽的方式被资本与权力所征用，通过解构这一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并重新构想技术的社会使用路径，或能开辟更具解放潜力的技术治理方案。

从弗卢塞尔对媒介的界定、分类、功能与特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实质上建构了一种辩证的媒介观。在他那里，媒介既非纯粹被动受控的“手段”，也非全然反客为主的“目的”，而是“目的”与“手段”在其实践场域中持续流变。具体而言，在界定上，媒介作为符码运作的结构，其本身已不再是中立的工具（手段），而是内嵌了特定规则与可能性的结构性条件（媒介自身的潜在目的）。人使用媒介这一手段时，也同时进入该媒介结构所预设的目的轨道。在功能上，媒介的保存与传递功能体现了其作为手段的维度，即服务于人类记忆、沟通意图与社会维系等；而其创造功能，则暴露出媒介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准主体”，能够生成超越使用者原初意图的新信息，在此意义上，媒介的运作本身成了目的。在特性上，媒介的柔性特质成为扭转“目的－手段”的核心枢纽。它意味着，媒介既可以被权力与资本征用，将其预设的目的（如资本增值、装置控制）强加于人，使人沦为手段；同时，使用者亦能通过创造性的使用策略，反抗这些预设，将媒介重新手段化，转而服务于自身解放与交流的目的。弗卢塞尔的深刻启示在于，人类与媒介的关系，并非一场目的与手段的静态抉择，而是一场在媒介结

构所设定的场域中，不断通过实践去争夺手段主动权的动态博弈。

二、媒介 / 中介辩证法及“手段”“目的”在媒介内部之同一

除了从结构维度来分析社会实践中的媒介，弗卢塞尔更是汲取哲学资源来考察媒介在人类存在中的位置，揭示媒介如何更为根本地参与人类的在世存有。弗卢塞尔提出，媒介的运作逻辑遵循着辩证法则，它同时实现着联结与区隔的双重功能——“每种媒介在传播方面都有其自身的辩证关系，它既联系着通过媒介进行传播的人，也分离着通过媒介进行传播的人……这种辩证关系正是‘媒介’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16] 这意味着媒介既是连接的桥梁，又是阻隔的高墙，亦即媒介同时发挥着肯定与否定的力量。弗卢塞尔进一步指出，媒介之所以可以同时产生这种双重作用，源于“‘媒介’，即中介关系”[17]。媒介辩证法源于中介辩证法：“所有中介都蕴含着一种所谓的内在辩证法……当某物呈现（vorstellen）他物时，那么它也将自身放置于（stellen）该物之前（vor）。”[18] 换言之，媒介 / 中介是一种既表现事物（联结）又遮挡事物（区隔）之物。

弗卢塞尔将中介关系视为人类意识与世界的根本性关系，其媒介 / 中介辩证法扎根于黑格尔的中介辩证法，我们可以借助后者以理解前者。黑格尔中介辩证法的核心在于，中介乃是对“直接性开端”的否定，而作为肯定性的真理恰恰在中介的否定性运动中得以生成。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强调的，“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换句话说，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的环节，纯粹的否定性……正是这个反映，使真理成为发展出来的结果，而同时却又将结果与其形成过程之间的对立予以扬弃”[19]。这种作为纯粹否定的中介最终通过自我扬弃返回自身，实现为积极的肯定性存在，从而展现出“以否定的形式呈现的肯定”[20]。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黑格尔的中介辩证法所呈现的是一个流动的世界：现实不再是现成的”，而是依据中介运动不断生成的[21]。弗卢塞尔择取了黑格尔中介辩证法中否定性与肯定性同一的框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分析人类意识与世界的中介关系：

> 人类一旦感到自身位于世界之中，便不再“直接”位于世界之中，并将世界置于引号内（将其纳入括号并悬置起来）。作为对世界的否定，意识试图以图像形式克服矛盾。由此催生新矛盾：图像与意识的对立。在此矛盾中，图像对意识的功能发生逆转：图像非但未能中介，反而将自己置于世界之前并遮蔽了世界。意识转而否定图像世界，并试图以文本形式克服这一矛盾。这又导致第三个矛盾：文本与意识之间的对立。在此矛盾中，文本对意识的功能也发生逆转：文本非但未能中介，反而如墙壁般横亘于意识与图像世界之间，变得“不可想象”。被文本编程的意识再也无法穿透图书馆的围墙进入世界图像（Weltbild），更遑论重返“失落的世界”。意识遂成为镜像，成为对自身文本的否定。此即当下境况：作为否定的意识，正试图通过投射技术图像——这些图像应中介与文本的矛盾——以转变位置[22]。

弗卢塞尔从历史哲学视角指示出人类意识与世界之间如何产生了中介，以及中介作为手段与目的之同一。当意识获得“在世界之中”的自觉时，人类便与世界产生了存在上的距离，这既是人类对世界直接性的否定，也是人类与世界中介关系的开始。在传统图像阶段，意识为了重返原初的统一性，以传统图像为中介手段来理解与把握世界，但这些图像同时立于世界之前并遮蔽了世界，从手段逆转为需要被意识理解和面对的目的本身；在文本阶段，文本一方面作为中介手段解释了图像，使之变得清晰明了，另一方面也横亘于意识与图像世界之间，从手段转变成意识需要直面的目的本身。技术图像作为中介的新形式，既试图解决文本与意识之间的矛盾，又可能制造新的数字间隔，同样面临着再度的认知遮蔽，成为人类意识需要把握的目的。每一个阶段，意识为了解决上一个矛盾而创造的中介“手段”，由于其固有

的辩证法特性——既呈现又遮蔽，既连接又区隔，总会成为意识活动的“目的”，亦即意识必须克服与突破之物。从时间上来看，作为手段的中介 / 媒介不断被目的化，而抽出这种时间性，手段与目的同时寓于中介 / 媒介自身，这种同一性本身便是由媒介 / 中介的辩证法所造成的。

中介化的世界展现出悖反的双重性：“不仅为生存于其中的人提供了空间，使他们不顾对死亡的认知，渴望获得有意义的人生，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宛如监狱般的空间。”[23] 这正呼应了海德格尔所言的“中间”之境，它既意味着“区分”与“分离”，也意味着“非融合的亲密”[24]。“融合”意即人类重回世界的直接性中，实现与世界的整一，“非融合”意味着人类并没有真正返回原初世界的怀抱，因为中介始终提示着某种“分离”。然而，人类又无时无刻不在中介化的世界中体验原初世界的存在，在其中努力追寻原初的整一，因而与原初世界保持一种“非融合的亲密”。一言以蔽之，人类无法重返前中介的融合状态，却在中介化的世界中不断追寻那种原初的整一。正是这种永恒的张力，构成了人类在中介化世界中的基本处境：人类既依赖中介去开启世界、建构意义，又因为中介而永远与原初存在隔阂。中介 / 媒介既是可能性条件，也是限制性结构；既建构亲密，也维系距离。

弗卢塞尔进一步揭示，媒介辩证性所固有的矛盾特质恰恰成为其自我否定与自我演进的动力机制。当既有媒介的遮蔽效应与区隔功能达到其历史阈值时，便会催生新型媒介形态以重建中介效能。表面观之，这一理论取向与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媒介进化论”及“补救性媒介”概念存在某种相似性——后者主张“整个媒介演化进程都可以看成补救措施”[25]，新媒介始终是对旧媒介缺陷的技术性补偿，且媒介发展呈现出线性的进步轨迹，“随着媒介变得越来越先进，它们所传递的信息需要感知者进行越来越少的解码”[26]。然而，弗卢塞尔的“媒介辩证法”最终走向了与进化论截然不同的方向，其所揭示的并非媒介的渐进式发展，而是媒介在遮蔽与解蔽之间的永恒振荡。媒介始终作为不可消解的中介，作为不可化约的手段与目的之同一，横亘于人类与世界之间，并且技术进步非但未能消解这种中介性，反而使其中介机制日趋抽象化。技术图像作为当代媒介形态的典型代表，其解码复杂度已远远超越传统图像与线性文本所建构的认知模式，它标志着人类正步入一个中介性更为隐蔽而复杂的时代。

综而言之，为确立自身，意识成为对世界的否定；为避免分裂，意识催生了对整一性的永恒追寻；而传统图像、线性文本、技术图像便是这种追寻过程中所造就的产物，它们在人类与世界之间发挥着各自的中介力量，避免人类陷入因意识的自我异化而产生的分裂。然而，由于中介 / 媒介的辩证法则——它们既指示意义，又遮蔽意义，既连接，又分离，这些手段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其功能的逆转，从旨在桥接的手段，转化为横亘在意识与世界之间的高墙。意识创造出来的中介“手段”，本身便是意识需要面对和栖居的“目的”。因此，弗卢塞尔的中介 / 媒介辩证法所揭示的，是一个以“手段”与“目的”之同一为动力的永恒进程：意识不断借助中介手段回归原初的直接性，其结果都是更深地嵌入并依赖由手段所构成的目的性世界之中。人类的命运，或许正是在这种自我否定的循环中，持续地将通往世界的手段塑造成为我们最终必须栖居的目的。

三、后历史意识视域下的媒介与人：既无“目的”也无“手段”的博弈共生

从传播过程中物质性与符号性要素辩证统一的立场出发，弗卢塞尔所提出的媒介认知揭示出，媒介不仅是达成目的之手段，其自身即构成一个目的场域，手段与目的在媒介实践中发生着流变。取径哲学，弗卢塞尔的媒介辩证法又彰显出，目的与手段同一于媒介自身。综合来看，二者共同提示，弗卢塞尔既将媒介视为手段，又视作目的。但是，弗卢塞尔并未止于此。他的深刻洞见在于：“手段 – 目的”的二元框架实则内含于“历史意识”之内，随着“历史意识”本身遭遇危机，“手段 – 目的”的框架也会失去其解释效力，无论是将媒介降格为纯粹工具（将人依旧

视为最终目的），还是将媒介升华为终极目的（将人视为手段），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理论困境，而以“后历史意识”观之，人类对媒介及其与自身的认知将超越“手段－目的”的二元对立框架。

“历史意识”是一种线性的、过程性的意识，它“是文字的产物”[27]。“后历史意识”则诞生于以技术图像为代表的媒介当中，它打破了线性的历史时间，剪切、拼贴与“游戏历史”[28]，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再具有固定的时序，而是可以随时调用、随机组合、拼贴并置。如果说历史呈现了线性的事件，那么后历史则“把事件转换为程序”[29]，以装置程序来操纵事件。正如弗卢塞尔所言，装置“吞噬历史并吐出后历史”[30]。当线性文本被纳入装置的编码系统，黑箱操作机制将其解构为去时序化的技术图像，这些图像通过大众媒体或数字网络媒体广泛撒播，建构出去历史化的、永恒循环的集体记忆。在此过程中，人类行动的历史性维度被彻底悬置，此即后历史氛围。

在历史意识的认知范式下，手段与目的构成了既相互依存又具有层级性的关系：手段始终作为实现目的之工具性存在，目的则反过来为手段的运用提供价值合法性，而人非手段，乃是目的。在历史意识主宰的文化阶段，媒介仅被视为透明的传输工具，其自身并不具备独立的文化价值。弗卢塞尔诙谐地举例道，人们只会关注《神曲》内容与思想上所达成的伟大成就，而不会在意但丁书写时使用的鹅毛小笔[31]。然而，随着媒介文化（Medienkultur）的兴起，人与媒介的传统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媒介不再仅仅是工具性的手段，而转变为自主性的目的，甚至使原本的目的——人本身——变得冗余。这种手段的目的化过程意味着媒介从附属地位跃升至文化生产的核心要素。研究者可以继续沿着历史意识进行批判，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技术意识形态化、符号消费文化，等等，以便揭示媒介异化的原因，重拾人作为目的之尊严。然而，若想超越“手段－目的”的二元框架则需要从历史意识迈向后历史意识。

在后历史意识的认知范式下，线性的目的并不存在，这同时意味着依存于目的之手段也不复存在，手段与目的在历史之中的对立消解于后历史的多维度可能性之中。正如弗卢塞尔精辟指出的：“只有历史意识才有目标（它是线性的）……目标可以在历史中追求，但不能在神话中追求，也不能在新事物中追求。”[32]在弗卢塞尔看来，新兴的装置文化展现出了后历史意识之基调——既无目的，也无手段，一切皆沦为游戏。装置输出之物实为可能性空间中诸多力量博弈生成的偶然性集合，作为偶然之物，它们缺乏意图的特定性。现代媒介已然演变为偶然事件的发生器，当代媒介事件本质上则是程序对现实的重构物，呈现为特定时空节点突现的偶然性表象。此类程序事件给予当代生活如此一种信念：“相信永恒轮回，相信每次行动都无关紧要。”[33]换言之，在后历史意识中，目的论链条的断裂致使行动的意义被消解，一切皆被视为游戏。甚至连传统形而上学的造物主假设，也被重新诠释为偶然性游戏的表征。“高高在上的造物主不再是某种必定或未必的假设，而是被世界斥为一种关于偶然性的游戏。”[34]

后历史对历史的所谓“超越”，实质是程序化事件在控制论框架下的功能主义超越[35]。这种表面上自由的游戏形态深嵌于控制系统的约束之中。程序性思维从连续递推的线性结构，跃迁至多种可能世界的量子化认知架构，传统历史意识的单一线性结构，最终被吸纳进这个多维度的世界之中，消融于后历史意识之内。以后历史意识审视当代媒介文化，其所具有的美学维度置换了历史的厚重性，仿佛回到康德意义上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36]，媒介似乎演变为纯粹形式的自由游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弗卢塞尔尖锐地指出，当前所谓的媒介艺术已不再具备传统审美的“孤绝与纯净”[37]，而传统哲学的三重范畴——认识论（真）、伦理学（善）、美学（美）——在新媒介环境中已然失效。弗卢塞尔以摄影为例进行了分析：“摄影以科学为基础，是生产审美现象的技术姿势。只要科学是真实的，它就是真实的；只要照相机工作得好，它就是好的；只要传播照片的媒体允许照片模拟

观察者的经验，它就是美的。照片与石器时代的小刀有一个共同点：在摄影中，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参数在经历了现代性的致命分裂后融合在了一起。”[38] 当代媒介文化所蕴含的双重倾向在此得到昭示：要么在一切标准失效后走向媒介装置的自主性神话，媒介本身则将成为自我指涉的封闭系统；要么实现认识、伦理与审美参数在技术实践中的重新统一，人类复归存在的整一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图景源于后工业社会中人与媒介关系的根本性重构。

弗卢塞尔指出技术演进与人类主体存在三个变迁阶段：在前工业社会阶段，“工具”作为人类身体功能的延伸而存在，体现着主体之于客体的绝对性；在工业社会阶段，人类已逆转为“机器”的功能组件，发生了人类主体地位的第一次倒置[39]；而在后工业语境下，这种关系进一步演变为人与“装置”（Apparat）互嵌的结构，形成了互为功能、相互服务的“装置-操作者复合体”（Komplex Apparat-Operator）[40]。这种演进导致传统的主客二分范式、目的与手段框架在后工业社会中彻底消解，代之以人与装置的动态博弈共生关系。这种博弈共生关系呈现出双重面向：一方面，媒介装置保留着作为人类游戏对象的玩具属性，这种玩具属性维系着人类作为自由游戏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装置程序所固有的自动化逻辑通过自我指涉的反馈机制不断强化自身的自主性，将人类降格为系统功能的执行者，陷入持续消耗程序可能性的无限游戏之中。

综上所述，在后历史意识视域下，人与媒介，皆既非目的，也非手段，二者紧密结合为“人-媒复合体”，相互成为对方游戏之物，保持一种博弈共生的张力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导向装置极权社会，也可以导向自由游戏的远程通信社会。弗卢塞尔的深刻性在于，他始终关注着媒介装置的自主运作逻辑，以此来解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认知，并重新评估生活世界中人类意向行为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又警惕过度的自动主义诠释所导致的技术决定论，在自动主义诠释与人文主义关怀之间保持着必要张力。正如他所言：“技术与使用技术的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反馈关系。发生改变的意识引发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技术又会改变意识。”[41] 这种辩证的理论立场使他揭示出后工业社会的矛盾性对抗：人类试图通过决策性的输入与输出来维持对装置的控制权，“但又因为装置内在的不透明性而被装置支配”[42]。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后历史境况下媒介文化中的人类困境，同时也孕育着重构新型主体的可能。如其所言：“自由就是与装置的博弈。”[43] 这种博弈关系既解构了传统的主体概念，又为新型主体的生成提供了场域。

四、结论

在方法论层面，弗卢塞尔开创性地展现出一种辩证的媒介批判路径，其核心在于将“人-媒复合体”视为一个动态的张力场域。媒介批判的任务并非简单地站在人类或者媒介一端，而是解码二者相互交织、相互抗衡、彼此塑造的意图与逻辑，使之从自然化的操作背景中显现出来。而当人类操作者与媒介装置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作为一种事实被呈现之际，媒介的辩证性也将变得可见。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完成了一次关键的理论综合，他既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过度关注于文化工业背后的某种隐蔽力量，而忽视了媒介装置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逻辑与自动化特征[44]；又修正了麦克卢汉过度诠释媒介自身的力量，而淡忘了人类使用、社会实践对媒介柔性的改造力量[45]。

弗卢塞尔媒介理论的价值在于，他最终超越“手段-目的”“主体-客体”的二元框架，在技术自主性与人类主体性之间，开辟出一条辩证之道。他所描绘的图景是，人与媒介既在共同异化，亦在共同进化。而人之为人的卓越性与悲剧性，正绽放在这复杂繁芜的媒介丛林中，“即人不仅是一种能生产工具的存在，也是一种能为逃避工具所产生的矛盾而生产工具的存在”[46]。这一论断将其辩证性、批判性的媒介认知路径提升至存在论的高度，即人类作为工具制造者，无可避免地推进着技术异化与

自我异化；同时，人类作为意义寻求者，又永不停歇地创造着新的解放可能。这种双重性揭示了人作为存在者的终极悖论——面对技术支配的可能性，人类通过永恒的抵抗实践确证自由；面对死亡的必然性，人类借由意义的创造实现超越。人，正是在这无可逃脱的媒介化生存中，荒诞而真实地成就其自身。

（责任编辑：徐秋染）

参考文献

[1] Williams R.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Revised edi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03–204.

[2] 马歇尔·麦克卢汉 . 理解媒介 : 论人的延伸 [M]. 何道宽 , 译 . 南京 : 译林出版社 , 2019: 17–18.

[3]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 走向媒介本体论 [J]. 胡菊兰 , 译 . 江西社会科学 , 2010(4): 249–254.

[4]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 实体之夜 :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论文选辑 [M]. 李双志 , 译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2019: 3.

[5] Kittler F.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Media[J]. *Ctheory*, 1996, 07, 30.
https://journals.uvic.ca/index.php/ctheory/article/view/14325.

[6] 杰弗里·温斯洛普 – 扬 . 基特勒论媒介 [M]. 张昱辰 , 译 . 北京 :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 2019: 92.

[7][9][10][11][12][13][14][15][22][40] Flusser V. *Kommunikologie*[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7: 270; 271; 272; 274–275; 287–288; 274; 227; 272; 107–108; 150–151.

[8] 尼克·库尔德利 , 安德烈亚斯·赫普 . 现实的中介化建构 [M]. 刘泱育 , 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23: 6–7.

[16] 威廉·弗卢塞尔 . 姿态 : 一种现象学实践 [M]. 钱婕 , 周海宁 , 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24: 163.

[17][45] Flusser V. *Medienkultur*[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8: 30; 103–104.

[18][27] Flusser V. *Kommunikologie weiter denken: Die Bochumer Vorlesungen*.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Verlag GmbH, 2008: 31; 102.

[19] 黑格尔 . 精神现象学 (上卷)[M]. 贺麟 , 王玖兴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62: 14.

[20] 李春敏 . 论马克思辩证法中的“中介”——兼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异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2022(5): 80–88.

[21] 潘裕文 . 感性直观与中介之间的意识形态批判——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与黑格尔的跨越性批判 [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 2022(3): 218–236.

[23] 威廉·弗卢塞尔 . 传播学 : 历史、理论与哲学 [M]. 周海宁 , 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22: 169.

[24] 海德格尔 .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M]. 孙周兴 , 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5: 16.

[25] 保罗·莱文森 . 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 [M]. 何道宽 , 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1: 255.

[26] 保罗·莱文森 . 人类历程回放 : 媒介进化论 [M]. 邬建中 , 译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6: 9.

[28][29][30][35][37][46] 威廉·弗卢塞尔 . 后历史 : 二十篇短文与一种使用方法 [M]. 李一君 , 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23: 77; 43; 72; 78; 109; 99.

[31][32][33][41] 威廉·弗卢塞尔 . 书写还有未来吗？ [M]. 朱恬骅 , 译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 2024: 151–152; 184; 156; 19.

[34] 威廉·弗卢塞尔 . 技术图像的宇宙 [M]. 李一君 , 译 . 上海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21: 62.

[36] 康德 . 判断力批判 [M]. 邓晓芒 , 译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17: 48.

[38] Flusser V. *Writing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45.

[39][42][43][44] 威廉·弗卢塞尔 . 摄影哲学的思考 [M]. 毛卫东 , 丁君君 , 译 .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 2017: 23–27; 26–27; 70; 54.

Vilém Flusser on Media: An Approach to Media Critique

Li Huimin

Abstract: The “means-ends” schema constitutes a crucial thread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a theory, but it has reached an impasse in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media instrumentalism and media-centrism. Vilém Flusser offers a creative path for transcending this dilemma. Grounded i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material and the symbolic in communication, he defines media as operational fields of codes endowed with structural agency. Media are not purely passive means, but structural conditions embedded with specific rules and inherent potential end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iscursive and dialogic media, Flusser elucidates how media retain their instrumental nature in the function of preserving and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while demonstrating its agency in the function of creating information. His concept of “flexibility of media” (die Schmiegsamkeit der Medien) becomes the pivotal hinge for reconfiguring ends and means, allowing them to flow and transform within the field of media practice. Furthermore, Flusser derives dialectics of media at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revealing the identity of means and ends within media themsel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e leaps entirely beyond

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means-ends”, pointing toward a relationship of gameplay and symbiosis between humans and media that transcends teleology. Ultimately, he establishes a dialectical path for media critique, whose core lies in treating the “human-media complex” as a dynamic field of tension. By decoding the practical relationships of both collaboration and antagonism within it, this critique reveals the existential condition of humanity resisting and coexisting with technology.
Keywords: media; means; ends; flexibility; dialectics; post-history
Author: Li Huim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上接第 47 页）

From Symbiosis to Evolution: The Asymmetric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Culture

Zhan Di，Fang Jieyu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novation of media landscape continue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human senses and narrative imagination, pushing the digital ecology towards deep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media ecology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ary path of technology-culture relationship from “symbiosis” to “evolu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echnologically autonomous systems and human cognitive needs form a recursive and mutual-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that is limited by the boundaries of biological adaptation and rooted in the material foundation of technology. Through autonomous content generation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structs a new cultural meme production logic: technology enhances its own efficacy and adaptability through modular restructuring; neural interventions shake up the 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human perception; and algorithmic hegemony drives the line of cultural evolution through the closed loop of data capture and behavioral modelling. The three evolutionary forces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implicit norms and explicit governance of the human value system. 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s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an asymmetrical evolutionary mechanism, an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the emergence of a “post-human” landscap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cal autonomy; techno-cultural symbiosis theory; techno-cultural evolution theory
Authors: Zhan Di,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Fang Jieyun,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公益广告

四川省生态环境
宣传教育中心

新闻界　宣

欢迎订阅

新闻界

- CSSCI 来源期刊
- 中国新闻核心期刊
- 中国人文社科综合评价 (AMI) 核心期刊

思想影响传播
媒介推动文明

征订方式：

1. 通过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62-334。

2. 通过《新闻界》发行部订阅（一年起订）：

《新闻界》为月刊，每期 20 元，订阅费：336 元 / 年（含杂志费 240 元 / 年，邮费 96 元 / 年）。

开户名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银行账号：51001890836051508414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

【注】：转账时请务必注明“《新闻界》订阅 × 年 × 月——× 年 × 月”字样，转账后请尽快将您的汇款凭证、收刊人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等详细信息发送至《新闻界》微信公众号后台，以便您及时收到期刊。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微信号：ixinwenjie

主管主办单位：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发行部电话：（028）86969774 （028）86968876